THE HERO IN HISTORY

SIDNEY HOOK

历史中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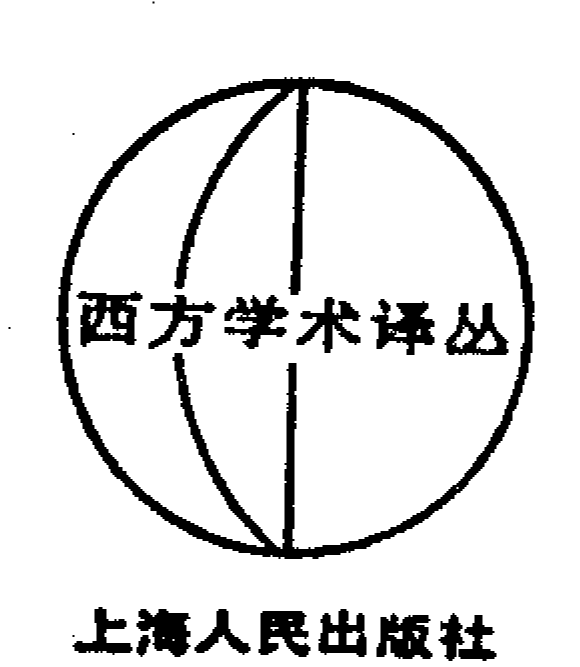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XIFANG XUESHU YICONG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IDNEY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43

本书根据紐約約翰·戴伊公司 1943 年英文版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西方学术译丛·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58,000

1964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3,501—35,500

书号 2074·287　定价 1.35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即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西方学术译丛"近期即出品种

《历史研究》(上、中、下)

〔英〕汤因比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

《人本主义研究》

〔英〕F.C.S.席勒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

《社会改造原理》

〔英〕柏特兰·罗素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奥〕欧特尔·霍利切尔

《指号、语言和行为》

〔美〕C. W. 莫里斯

《确定性的寻求》

〔美〕约翰·杜威

《彻底的经验主义》

〔美〕威廉·詹姆士

《开放的自我》

〔美〕C. W. 莫里斯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美〕悉尼·胡克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比〕亨利·皮朗

目　录

导　言

本书的书名說明了它的主題，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把它叫做《历史中英雄的局限》，或許同样适当。这个书名也能說明本书的內容，不过还不是我們关于历史英雄的想法。我們的想法，书里作了詳細的叙述。請讀者不要单从书名上去推測。

历史是由男男女女造成的，这一点，除了某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誰都不再否认了。即使是那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們，也不得不間接承认这个平凡的眞理，因为他們把历史人物說成是天意、正义、理性、辯証法、Zeitgeist①，或者时代精神的“工具”。在历史上使用“工具”的后果，人們比較容易同意；至于“工具”果眞为什么样的最后目的服务，被认为决定“工具”的原因又是什么，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后果是难以确定的；人們的意图尤其难以确定。不过，只要我們想認識眞理，有关我們的意图問題，我們原則上总能明智地解答。但是关于抽象概念的意图，关于那些起因的决定作用，我們就无法取得科学性的一致意见了，因为关于它們的意义、証据和眞相，我們无法做同样的臆測。

我們知道，阿提拉（Attila）②的破坏行为加速了罗馬帝国的灭亡。我們不能象某些受害的教徒們，断定他是“上帝的鞭子”；也不能象某些现代学者，完全相信他是一連串原因的后果，而这原因的鏈条的第一个环节，是在中国气候的变化中鑄成的。

---

① 德文，即时代精神。——譯者

② 侵入罗馬帝国的匈奴首領。——譯者

我們知道，希特勒发出了信号，把全世界六大洲都投入了战争。我們怀疑，象一位自命发现上帝秘密的人最近所說的，希特勒和其他暴君們都是“天意的工具，是在懲罰离开正道的民族，”或者，象其他一些人所說，希特勒只不过是当代基本矛盾的結果，即社会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这个譬喻有意思，那就让人們充当工具吧。不过也要記住，工具可以用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有时是全然不同的目的。人也是一种工具，他对于这些目的应該是什么，会有些話要說。他所服务的那个目的，是可以从他自己规定下的、他自己理解的那些目的里面推測出来的。人們只有在抱着某些目的的时候，才能創造历史。

不管人們創造什么，一支枪或一本书，一次战爭或革命，另外一个社会或另外一个人，他們的創造总是要受一定条件支配的。就連人們所設想的那些神，大都也是在当时存在的物质条件限制之下，进行創造的。任何別的創造，对于輕信的人来說，都是一种奥秘，而对于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說，就是支离破碎的神話了。

凡是承认人們确实能够創造自己的历史的历史哲学，也都得把它本身跟当时的各种条件联系起来。它要广泛地估計到，某一时期，人們进行活动的各种条件的比重，他們的思想、計划和目的的比重。这些思想、計划、目的扎根在复杂的各种条件之中，但是它們从已經提了出来的改造条件，使其更符合人类愿望的計划中，取得意义。科学的历史家的专門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問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如何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要予以圓滿解释，就得在人們所扮演的角色和提供材料、有时又提供規律，但絕不提供人类历史戏剧細节的起决定条件作用的背景之間，結算出一笔似乎可信的双方比較的清賬，不然就有困难。对于这个問題，哲学家們从大处着手，历史学家們则从小处着手。前者通常为行动的綱領或得救的希望，提出全盘的解决办法。后者避开了大规模的概括，小心地逐項研究。对于历史上“伟人”或“英雄”的作用，这种方法显然也是适用的。

以后各章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給这个迷惑人的問題构成一个

有成果的系統提法。我們要努力概括出各种类型的情境和条件，以便正确地承认或否认杰出人物对那些情境和条件的随时的影响。我們提供的不是一种历史理論，而是对历史理論的一点貢献。要給人类历史作出适当的解釋，这一点貢献是应該受到注意的。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問題的英雄

尽管我們的年龄已过了崇拜英雄的青年期，我們对于英雄还是始終感兴趣。这种兴趣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但是它們的强度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各有不同。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人們对杰出人物的言行感到的兴趣高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所以热烈关切当代无冕英雄的思想和事业，它的特殊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战爭和革命的时期中，各国人民的命运好象显然系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决定。不錯，这些特殊原因反映了战爭中間戏剧性的紧急問題，但是在不太动乱的年代里，也还有其他一些根源起着作用。这两方面我們都要加以討論。

1．給这种英雄兴趣提供材料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重要的社会組織形式中，都不能沒有領导。控制領导的方法，公开的或隐蔽的，各个社会，各不相同，但是領导人时刻都在眼前，不仅是国家的明显象征，并且是責任、决策和行动的中心。这样，就有一种自然傾向，要把領导人跟在他領导之下所取得的成果，联系起来，尽管那些或好或坏的成果，毋宁是不顾他的領导而产生，而并不是由于他的領导而产生的。既然許多因素都在起着作用，那种“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謬誤論断，对于头脑单純、不善于鉴别的群众以及沒有耐心的行动中的人，就注定是有道理的。人們会要胡佛对于某次的經济萧条負責，其实那次經济萧条的种子，在他上台以前，早就种下了。如果在鮑尔温(Baldwin)执政期間，社会上沒有发生过大灾难，人們就会认为他稳健可靠，尽管他已經給欧洲火药庫点上了一根慢慢燃烧着的导火綫。

当前，領导对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是用不着再推脱的。

这种影响，不論好坏，是公开宣布了的，集中組織起来的，并且不断增长着。世界上主要国家中，中央集权政府之下的各种組合經济发展到了这么一种地步，我們可以毫不夸张地說，少数几个人，竟能对那么多的不同領域，同时发生影响，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济、外交、陆海軍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济事业方面，还有——除英、美外——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方面的主要决定，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領袖作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个人作出的，他的判断和嗜好，就成为国家的絕对法律。交通工具的大发展能够把种种决定象光一样快地传到各个角落去，保証一种空前的有效控制。

一个愷撒、一个克伦威尔、一个拿破仑确实能够向許多部門发号施令。但是那些部門，在行政和职能上，不象今天結合得那么严密。他們无法强迫人們普遍遵守他們的法令，甚至也无法压制批評。有些漏洞永远堵塞不了。有些精神避难所也不是他們的执法吏所能接近的。过去专制統治者在位期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哲学上，都有各种矛盾的傾向，这就証明了他們无法把文化限制在他們的教条和法令里面。他們的失敗并不是因为缺少尝試。

今天，世界的面貌大不相同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斯大林、一个墨索里尼确实能够向各个方面，从軍事組織直到抽象的艺术与音乐，发号施令；这些独裁者百分之百地貫彻他們的法令。他們的决定不仅影响到謀生的可能性——这在集权国家，并不是稀罕事——并且影响所有的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影响到他們国家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內容与方向。当然，在他們控制的部門中，不可能靠一道命令，搞出一批天才来，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毁灭一切和他們不相一致的才能。通过各級学校（因为知識是一种武器），通过无綫电（如果声音够响的話，誰也逃避不了），通过书报和电影（人們自然而然地想从里面得到消息和消遣），他們把他們的教育灌輸到人民的“下意識”里去。

沉默寡言和隐姓埋名也不再保险了。精神上的一切避难所都被

消灭。蒙田(Montaigne)① 对那些想逃避当时政治风暴的人們提出过的明哲保身和不关心世事的劝告，也就是一百年前引起圣貝夫(Saint-Beuve)② 共鳴的那种劝告，今天肯定地会引起秘密警察的疑心。这种情况不仅标明欧洲从昨天的专制主义走过来，走了多远；同时也是一种标志，那就是說，除了領袖和他的左右，每个人旣沒有得到一种公共的生活，却連私生活也丧失了。

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其所以民主，那是因为領导大体上仍向代議团体負責而且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批評——行政当局的权限也大大地扩充了。这，一部份是由于它們的經济有走向国家資本主义的趋势；一部份由于在反对集权国家的侵略、爭取生存的斗爭中，必須进行总体防禦。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确是如此，而且越来越清楚了。最近几年，美国总統和英国閣員們的自由行动的权力，超过了他們前輩所能梦想的范围，除了外交政策方面可能还有例外。

旣然那么少的几个人，显然能决定那么多的事情，那末对于杰出人物的历史意义感到强烈的兴趣，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不需要高明的理論就可以知道，不管现有的領导如何，每个人跟它都有最具体的实际利害关系。最高政治指揮部里的个人意见和品质也許会給大家招致灾难，也許会給大家造福。老百姓先生③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們所作的道德評价——只要他能把他的評价保持在街談巷議的水平之上——至少，有一次，是跟历史有联系，而且是合理的。

形势的基本邏輯（这一点对于我們目前感到兴趣的問題很有启发，我們以后还要常常提到）是这样：要么历史行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实是无可逃避的，要么不是。如果是无可逃避的，现有的任何領导，在决定今天和明天的主要历史型式上，就完全成为一个次要

① 法国著名散文家。——譯者

② 法国文艺批評家。——譯者

③ 老百姓先生是十五世紀道德剧的主角。——譯者

因素。如果不是，那就要問：某一个領导的性格，对于我們历史地位和前途，在因果关系上究竟应該負責到什么程度，而且既然牵涉到人，又在道义上，应該負責到什么程度？象我們将看到的，那些大談特定的历史前途不可避免性的人們，要么用行动和另外一些言論表明他們的話是假的，要么就把两种信念混淆起来，一种是对无可逃避的前途的信念，另一种是对特定領导（通常也就是他們自己的領导）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这个領导会引导我們走向这种前途。有时候他們两件事都干。我們还会看到，否认历史行动的主要路綫的不可避免性，并不一定就等于說，历史的前途总是取决于領导的个性。历史上有比"定命律"和"伟人"更多的花样。就領导的历史作用来說，这是程度和各种类型的形势問題。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約略指明，到什么程度、在哪一类的形势里，才应該說領导确实改变了当时的历史方向，又在哪一种形势里，才应該說它沒有改变。

2. 对英雄感到兴趣的另一根源，要从教育青年的过程中所养成的态度里去寻找。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用伟大人物——神話上的人物或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的勛績，向青年表现出来的。在某些古代文化里，人們推崇英雄为民族之父，象以色列人对亚伯拉罕那样，或者推崇英雄为国家的締造者，象罗馬人对罗馬勒斯那样。在现代文化中，初年級历史教育的英雄內容并沒有因为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受到什么影响。这或許由于故事形式的戏剧效果，这种形式是在人們把历史作为連續不断的个人遭遇来处理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或者也許反映了伦理学者理解儿童心理的一种最簡单的入門方法。再加上民間故事和传說的影响，这种五花八門的早年教育，在青年人的易于塑造的思想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从个别的人物上升到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就是从图画似的、具体的东西走向抽象。沒有經过适当的訓练，这个轉变是不容易得到的。許多人总想把"社会力量"、"經济法則"和"文化风格"人格化，其原因无疑就在这里。这些抽象概念，几乎象古代英雄那样，强迫着、命令着、統治着，并且面对着和克服着困难。在許多正統的馬克思主义的作品里，在这种譬

喻后面，你几乎能够看见資本和利潤已經給“生产力”套上了鐐銬，“生产力”正在拚命掙扎，而沒有加入这一场拉鋸战的人們屏住气，看它們打出个分曉来。

就是在更高的教学水平上，“英雄”史观的方法也沒有放弃。結集在杰姆士·哈尔威·罗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新史学»杂志周围的美国历史学派，曾給过去的美国作过动人的现实主义的解释。不过如果他們以为，他們已經撇开了英雄和伟人，走上了經济和社会“力量”的明确道路，他們就是在欺騙自己了。他們从神龕里挪去了国王、政治家和將軍，又在原位上放上了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哲学和科学界的大思想家。这种更换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它的含意跟他們有計划地貶低个别人物意义的历史方法論却不一致。聰明的学生常常从他們的著作中，得到这种印象，例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高尔德(Gould)和摩根(Morgan)是这个时代的眞正伟人；如果把他們的才能利用到政治方面来，事情就会多么不同啊！”①

今天，对待英雄和領袖的这种态度，不单是历史教育的偶然的副产品。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集权国家里，他們千方百計地向儿童、学生和成年人宣扬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进步的交通技术，灌輸信仰的新的心理学方法更能鼓起群众热情和領袖崇拜，这种热情和崇拜在拜占庭也不多见。现代独裁者們可以在一个罗馬皇帝替他自己建立的一座雕象的地方，貼出一百万张石印像来。每一种工具都被用来增加他們的威信。他們把历史改写过，叫人毫不怀疑，历史要么就是英雄們、亦即領导者的前輩們的业績，要么就是恶棍們、亦即領导者的敌人的事迹。从領导者当权的那一天起，他就公开鼓吹他的活动，把它說成是每一桩成就的直接原因。如果收成好，他的功劳比气候的功劳还要大。同样，在他上台以前的历史局面就被說成是坏人阴謀破坏的結果，而不是社会原因和經济原因的結果。

① 引自一个学生的論文。

今天，跟过去更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誰控制扩音器和印刷机，誰就能在一天晚上造成或打消信仰。如果象某些輕率的作者所說，伟大这个字可以用群众的拥护来說明，那么，伟大是可以加在现代独裁者的身上的。即使沒有加在他的身上，他也很容易搞到手。然而，要认为某一个人能影响历史——就是說，对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起了协助作用——一定要得到人們的信仰或拥护，作为他的历史力量的一个条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彼得大帝和腓特烈二世都不曾得到过群众的拥护。只有在现代，人民有了知識，甚至在民主政治形式受到嘲弄的国家里，也在到处宣扬忠于民主精神的口头禅，这时，領袖才一定要人們信仰他，以便加强他的权力。还要注意，现代的領袖或独裁者是从一个群众运动的时代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一定要有一个支持他和信仰他的群众基础，好来对抗其他的群众运动。在他当政以前，群众信仰他，是出于生活的沒有出路，是由于漫无限制的諾言的誘惑。一旦独裁者掌握政权，他需要一些群众的支持来巩固他的权力。过此以后，他就可以随意制造公意，使大家相信他的使命是天授的或历史决定的了。

群众的拥护在过去并不是造成領袖发揮效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目前也不是构成历史发揮效力的一个充分条件。一个傀儡元首，象意大利的国王，或者风流君主，象爱德华八世，也許在群众中很有名气，但是他什么事都决定不了。对于我們的目的来說，只有这样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尊崇才是有关系的，即：这种尊崇使他得以做出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出名或沒有得到群众拥护的話，这些事情本来可能就会做不成的。

3. 誰救了我們，誰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們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們。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銳危机，必須有所行动，而且必須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不管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如何，总希望解决危机和希望有个强有力的英明領导，来克服困难和避免危险，这两种希望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危机越严重，希望有适当的人，来控制局势的愿望就越强烈；

不管表达这种愿望的形式是默默的祈祷还是公开的鼓吹。至于把这个人叫做什么，"救星"、"馬背上的战士"、"先知"、"社会工程师"、"敬爱的信徒"、还是"有科学头脑的革命家"，那就得看是要用什么教派或党派的詞汇了。綱領固然也重要，但是在极端紧张的阶段里，当人們感到一筹莫展或大祸临头的时候，綱領是容易被忘記的。而且，綱領只不过是意图和諾言的公告罢了。作为公告来看，在那些意图实现以前，它們只有具体而微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力的領导。作为諾言来看，它是可以违反或破坏的，得看是誰許下的諾言，又是由誰来履行的。

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論者，尽管在理論上說，个別的人，不論其地位若何，在历史浪潮里无足輕重，他們写起历史来，却不能不承认，至少某些人，在某些重要关头，在改变历史潮流的方向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恩格斯讲到馬克思，托洛茨基讲到列宁，俄国官方讲到斯大林的时候，他們的态度跟他們所承认的意識形态就完全不一致了。就連神学的决定論者，象历代的教皇們，他們认为一切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上帝的指示，可是他們讲起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文化来，就好象西方文化也是由躲在上帝背后的路德和加尔文創造出来似的。用来掩飾这些矛盾的紆回曲折的手法，我們以后还要加以考察。事实是尽管决定論者們大談其"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可避免的"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絕不向它妥协。他們自己和别人都看得出来，他們的言論跟行动是抵触的。观其行而不听其言，我們終久会认出他們的眞面目。

人事危机的广度和强度各不相同。但是，由各国人民（关于他們，我們有比較完整的紀录的）的历史来判断，从来沒有哪一个时代，不曾被当时的某些人当作危机时代的。历史本身被描述为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条件总在起着作用，不管起作用的是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条件，而它們也总是永远在起作用的，只要采取行动的途径是打开着可供选擇，甚至被认为打开着的，人們就会感到需要一个英雄出来推动、組織和領导。这种需要往往是感觉到了比清清楚楚地說出来了的时候多；也往往是說

出了比得到满足了的时候多。事实上要求历史救星或英明領导的呼声越頻繁、越响亮，就越积起了一种表面的証据，証明竞争这个显要职位的候选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个民主的社会也有它的“英雄”和“伟人”。民主的社会和其他社会差不多，也免不了会发生尖銳的政治危机，也不缺少想当英雄的人。不过，它根据它自己的标准来选擇他們。如果一个民主制度是明智的話，它就会全心全意地跟它的領导者合作，同时又得提防他們滥用权力，这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但是，如果不让民主制度，象过去常有的那样，成为一个培养暴君的学校，这个問題就总得解决才行。

4. 历史上伟人的作用不仅是个实际問題，而且是个最迷惑人的历史分析的理論問題。自从一百年前，卡萊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宣布說，“世界史，人类在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作为的伟人的历史”，这个問題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們的兴趣。可惜，人們对这本书的估价不大实事求是，这个小册子对当时来說充满了激昂慷慨的精神力量，到处閃耀着精辟见解的光芒，但是它是矛盾的、夸张的、印象主义的。它被人們当作了一个义正辞严的辯护状，替“历史上的所有因素，除伟人外，都是不重要的”这个論点作了辯护。实在說起来，卡萊尔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意见，显然是錯誤的，纵使不錯誤的地方，也是含糊的、神秘的。論客們可以利用他說的某些話，以及推想他能够說的一些話，替任何一位集权主义的領袖作辯护，为那位領袖的专制行为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外衣，只要那些行为是够凶的，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凡是向一个国王或一位独裁者开枪，而又沒有失手的人，都可以引用卡萊尔歌頌革命的話，来証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

斯宾塞派、黑格尔派和各种改良派的馬克思主义者——只提那些思考过这个問題的重要思想流派——都跟卡萊尔的論点交过鋒。这些評論家駁斥了他的浮夸之处，却代之以另一种学說。这种学說虽然是用枯燥无味的語言說出来的，却同样浮夸。它把伟人們解释为社会进化的曲綫上，彼此毫无联系的許多有色的小点点。更

重要的是，他們忽視了一个可能有的論点，这个論点介于过份簡单化而又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間。不但如此，它还想把达尔文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变异”，运用到这个問題上来。按照这个看法，伟人們是在自然变异的过程中，由“时机”推上历史舞台的，社会环境則起了选擇的作用，給他們提供了完成工作的机会。

有过那么一种意见，由于受到科学的社会进化論高級宣传員的批評，在历史学家当中和讀书界里已不时行了。出来替这种意见作辯护的是美国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他热心辯論，再加上他对經济和历史因果关系上的某些特殊問題不感兴趣，这就使他过份强調了个人的作用。但是他的提法摆脫了卡萊尔式的空想——就是产生伟人和使他能发揮效力的那些条件要由伟人自己負責。詹姆士的論点听来頗为偏激；然而他强調指出，在伟大成为事实以前，必須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这种能接受性把一个利昂納德·納尔逊(Leonard Nelson)变得默默无聞，而把一个希特勒带到权力的极峰——，强調了这一点，他就把問題的严重性大大減輕了。他承认在自然、社会和个人性格这几个領域之內都有相对的自主性，再加上他相信历史原因是多元的，这就使他接触到了問題的核心。而这一点，并不因下面所說的事实而受影响，即：这些观点是从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更广的哲学态度引伸出来，而不是从特殊历史問題的研究中得来的。

尽管如此，詹姆士的論点，象他留下来的那样，是过于簡单而又站不住的。他告訴我們，“各种社会一代一代的演变，主要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于个别人物的行为或榜样，他們的天才和时代的能接受性配合得那么好，他們偶尔取得的权威地位又那么险要，于是他們就成为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先例或风气的开創者、腐化的中心，或者另外一些天才的摧残者，如果任令那些天才自由发展，社会就会被引向另一方向。”①

① «伟大人物和他們的环境»，«哲学論文选»，大众出版社英文版，第174頁。

詹姆士說的是：沒有伟人們的工作，就不会发生有意义的社会变革，而使得那种工作成为可能的今天的"能接受性"，又都是昨天的杰出人物的行为或榜样的結果。这种說法看来适宜于說明在我們眼前展开的大变化，乃是列宁按照新的社会路綫努力改造世界的結果。这种說法也許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努力从另一方向作了新的解释，他們努力征服和奴役欧洲，不单是为了防止列宁的計划得以实现，并且是为了防止欧洲社会的民主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給列宁造成机会的俄国的經济崩潰，当然都不是任何伟大人物的行为或榜样的結果。1914年爆发的社会冲突——政治的、經济的、伦理的冲突——其大多数的先决条件也不能归因于个人的行为或榜样。

如果沒有某些人的活动或榜样，資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野蛮民族的西进、文艺复兴，这一切，当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指明哪些特殊的个人跟这些运动有关，都不能証明，他們是必不可少的，都不意味着：沒有他們，这些运动就不会出现。

要是有一个"伟人"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絕对不会发生，这种輕率的議論是不能由任何已知的經驗加以証实的。这个人得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伟人"，那就是說，在相似的情况之下从来沒有出现过的一种人。强調伟人的影响，认为如果只要有了他，他就会起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类的議論往往在原則上是不能証实的①。这就是說，那个假定的，能够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伟人，不是由于某些独立的特性，而是由于他的假定的成功，才得到証实的。这就等于提供了一个定义，說明在这些条件之下能构成一个伟人的是什么。我們的論点并不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过去的伟人名单上，添上一个"伟人"，大概不会把事情改变到那里去。另外有些事件可以把事情改动一下，甚至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这些事件我們也用不着到自然灾害的領域里去找。比如，要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行了巴塞尔会議上所作的保証，即使宣战了，仗也打不起来。但是就具体

① 这一点并不对一切"如果"問題都适用。参閱本书第七章。

問題来說，在1914年，不管由誰来当欧洲各国的总理，历史性的商业竞爭的結果、德国对英国海軍力量的挑战、西欧的沙文主义的仇恨、巴尔干的层出不穷的阴謀，等等，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两样。

近百年来，各种解释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中間传来传去。一方面，我們有横扫一切的社会决定論，按照这种理論，伟人就是历史规律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一个表现、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后果。不錯，一个伟人和其他人等之間的特征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但是象这一派的一位权威作家所說，"一个人的'特征'只不过更高一級的社会发展规律留下的几条个别的痕迹罢了。"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看法即：革新者們可能不断地改造历史，他們的存在、战略性地位以及他們对群众的有力影响是不能从当时的成群社会力量里推究出来的。介乎二者之間的意见也不是沒有。那些意见表示的不过是折衷的想法，就是控制历史变化的方向的，有时是伟人，有时是环境的力量。但是它們并不对这些因素取得决定意义的一般条件，逐項作特殊的研究。

一旦牢牢地掌握住这个理論問題，想理解历史的人就不能不提出某种答案来。对于这个問題采取各种各样态度的历史学家們，几乎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时代或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采取过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紀絕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有意无意都受到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决定論的束縛。这并沒有妨碍他們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們对历代社会生活的結构有所闡明，对逐渐积累起来的在革命时期突然爆发的社会紧张关系也有所闡明。我們不否认他們的发现有其确实的根据；他們对世界史上重要时代領袖人物的思想根源，也許发掘得很深，但是我們怀疑，他們对那些人物的活动是不是作了公平的評价。許許多多的历史人物都受到文学家和职业传記家的摆布，这些作家們选材时，一只眼老老实实盯住他們的早期画象，另一只眼則带着幻想看着好莱塢。

5. 对伟人发生兴趣的心理根源，也許应該当作某些手段来看，伟人就是用它們来影响他們的群众的。这些根源簡略地說就是：a.心理安全的需要，b. 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傾向，c. 逃避責任，这

有时候表现在掌握简单的解决办法上，有时候表现在把政治利益交到职业政客的手里。这些根源显然是互有联系的，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分开来談。

a. 伟人或領袖往往认为他自己是他的国家、党或事业的“父亲”，更往往被他的左右认为是他們的“父亲”。这个事实似乎为佛洛伊德的观点增了光。佛洛伊德认为，大多数的人經常在寻找父亲（或者母亲），因为在他們的幼年时代，父亲提供了安全感和情緒上的稳定性。这里表现了某种深刻的见解，这种见解，正如从佛洛伊德和他的学派那里流露出来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一样，一点都不夹杂佛洛伊德体系里那些荒唐无稽的神話。有很多人永远离不开他們的父母、老师，或者在他們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供应他們的需要、解除他們的恐惧、解答他們的問題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人。結果，信仰与服从以至初期行为的調节都成为一套既定的程式，这一套程式就在領导者的身上体现出来，他說起話来，做起事来，儼然象个家长，同时要求在社会之中，起一种类似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

时代越混乱，教育越因循从俗，依賴性越强，領导者越容易上台。至于一开头他是否以他的工作証明他的才干，那倒是一件次要的事。引用桑塔亚納的一句話：“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本质，就成为沒有见到的东西的証据了。”当然，碰上不可抗拒的灾祸，領导者也不能幸免，但是他用不着加强他的信徒們的物质安全感，因为信仰本身一开头就已減輕了他們的恐惧，增加了他們的信心。

应該注意，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并不常常有，也不常常是很强烈的。有那种需要的时候，决定要找什么精神庇护的是社会关系和压力，而不是天生的、本能的冲动。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們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的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在另外的历史情况下，如果那时沒有伟大的領袖和人物，象教会和党这样的机构就成为主要的权威角色。

b. 領袖对他的群众有一种号召力，这种号召力的一个更重要的

根源，也許就在于他能以他的被认为具有的特点和成就来代替满足他們的渴望。群众在想象中分沾了領袖的光彩、权力和热情。于是，那些精神生活貧乏的人們有了新的生活意义。由于注意力的集中，社会生活中經常感受到的歧視和不平，个人生活中有时感受到的貧困和无能为力都消失了。不費一点力，不花一个錢，自我就膨胀起来。特别是在目前民族主义时代，对待国家和民族这一类抽象概念的态度，已經成为一种偶象崇拜的时候，高明的領导者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領导者把他的爭取权力的斗爭和这些抽象概念合而为一，就把群众原来对待历史传統、制度、象征和意識形态的感情轉移到他自己身上。这时，他就可以凭借旧有的、旣定的事物的名义，来改变旧有的、旣定的事物。

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較幸运的人們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这种傾向也許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甚至可以解释人們所崇拜的神的性格——象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巧妙地論証了的。但是应該看到，被挑选出来作为同一体的那些人和特性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一般說来，可以反映出一种需要的，至少有两种可能有的理想。一个穷人也許会崇拜一个財神或者一个凶神；一个受到欺凌的民族也許会崇奉一位正直的統治者，但是也許会因为他們的暴君比其他一切暴君都更暴虐而自豪。为什么有些人以希特勒的武功为荣，而不以歌德的智慧为荣，以斯大林的残酷为荣，而不以托尔斯泰的善良为荣，不是用弥补局限以求满足，这么一种簡单說法就可以解释的。他們追求的那种满足是从他們的文化价值中引伸出来的。

c. 要是每一个人，或者很多人都想当政治領导，社会生活就会更混乱。我們不必害怕这种混乱，如果选举的技术有了进步，就会給我們选出最能胜任的領导人，負責满足有知識的、政治上积极的全体选民的需要和愿望。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我們现在討論的是已有的和目前的問題。检查一下政治史，我們就知道，愿意作政治領导的人，在每一个团体里，比較地說，总是少数。实际的情况似乎是，絕

大多数的人都不想担任有权有責的职务。①

政治領导的条件，自然会变的，但是当作一种专业的政治向来是，而且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有时候，人們对于作政治領导，很有反感，象在希腊城邦里那样，甚至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就是在现代，也常常从农村里、或車間里、或机关里“抽調”一些人去担任职务。問題倒不在于，愿意和急于担任領导的人，为数实在不多，而是在于，除非只有少数几个人对于竞爭領导职位感到兴趣，他們就不可能从容自若地取得和保持权力，也不可能用各种方法扩大本来付托給他們的权力。只要允許他們发牢騷，大多数人都甘心情愿，找个什么人来替他們作杂事，不管是家庭杂事还是政治杂事。政治是件肮脏事，而人生又是短促的。我們容忍許多罪恶，就是因为要消除它們，就不免引起麻煩。

这种感情纵使不是明智的，却是自然的。政治領导，是个全部时間都得奉公的职业，既沒有休息的余暇，也沒有培养其他兴趣的机会。掌过大权的聪明人，回想起来，沒有不感到得不償失的。据柏拉图的一个神話故事說，聪明能干的政治家奥德賽（Odysseus）第二次投生到世界上的时候，替他自己选擇的是离开政治漩渦、隐居在偏僻角落里的卑微生活。对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来說，事情是这样，对他的对手来說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野党进行的严肃政治活动同样是一种須得付出全部精力的活儿。所以，在政治斗爭中，具有多方面兴趣，而又不愿意把兴趣放在齷齪的政治祭坛上作牺牲的人，总处于不利的地位。敏感而清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如此，他怕承担严重的責任，不敢切切实实决定别人的命运，他怕作道义上的妥协，怕采取临时性的毒辣手腕，哪怕是高明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那种手腕。再說，政治問題是很麻煩的。我們接受許許多多的决定，正是因为我們不敢确信自己知道哪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我們的确知道有些决

① 参閱罗伯特·米雪尔斯（Robert Michels）的《政党》，1915年紐約版英譯本，第49頁。

定是必要的。

然而，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当我們不愿意因为投入政治漩渦，打乱我們的“正常生活”，而把权力付托給别人的时候，我們有一天会发现，受我們之托的那些人，正在那里破坏我們深怕遭到干扰的“正常生活”。这不但是个老故事，而且是一个經常重演的故事。它会一直演下去，直到大家都认識到：政治决定无論如何非作不可；責任不是用消极和逃避的办法可以躲开的，因为消极和逃避都会产生后果：政治上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和麻煩，即使从最起碼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一种社会保险的形式。

如果这些基本眞理的知識普及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照着实行，那末，在这个程度之內，对政治領导的兴趣就会成为批判性的了。那时，跟政治領导的一体化就成为一种自觉过程，而再也不是去寻求什么“父亲的替身”了。这时，我們就有权利为政治領导的成就而感到光荣，假使那种成就是我們父亲的劳績，我們就会沒有資格去承受那份光荣，因为我們是不能替他們負責的。反之，如果这些基本眞理受到忽視，每一个想当領导的，就連想作独裁者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群众对于政治的漠不关心。等他成功之后，他們就会尊敬他。不管他們是否尊敬他，如果他愿意得到尊敬，他现在就有办法强迫他們向他致敬。

我們已經簡略地考察了对“伟人”的事业发生兴趣的几种根源。别的根源当然还有。我們所强調的，只是能够說明伟人的影响和局限的一般問題及其时代重要性的那些根源。在上文里，“英雄”和“伟人”这两个名詞，一直是按照俗話所說的广泛意义来使用的。我們会发现这两个名詞实际上包含着許多不同的意义，因此，在我們討論下去的时候，我們必須找出一个切合于我們的目的的定义。抱着英雄史观的人們使用“英雄”这个名詞时，全都认为：不管英雄是什么，在他的活动領域里，他总标志着一种性质上独特的方式，是跟别人迥乎不同的，而且认为：在任何領域里，成績的紀录也就是英雄們的事业和思想的历史。对这些前提，我們还得加以更細致的研究。

第二章 思想界的英雄

人在生物学上都是同种，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又那么显著，甚至在他們的指尖端上都看得出来。而且这些不同不仅是皮相而已。假如有所不同的話，那在有机結构中发现相当的不同之前，在人的行为中老早就能看出来了。这些和其他事实所証实的变异的重大意义，迄今还沒有明智地反映于我們教育的和社会的实践中。一方面，表面上的形体方面的不同曾为了不平等的社会組織的利害关系而被夸大为造成神秘的种族区分的属差；另一方面，潜在的、大有讲究的个性之間的种种差异却在統一訓练的計划当中一概被忽略了。但是，无論我們对于这些人与人之間的不同作怎样的評价，这些不同的存在，不論是与生俱来的，抑或是后天习得的，都是否定不了的。否定了这些不同的存在，結果会变成只是否定了某些不同跟某种特殊問題或特殊需求之間的关联。

人与人之間的許多变异可以化为数量程度上的不同，例如：身高、体重、体力的不同。沒有一个人会强壮到不能被一群一个一个地来看都是較弱的人所打倒。如果人們仅仅靠着体力强壮就能創造历史，那么我們时代的强壮者当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杂耍的精彩表演者了。

但是，其他种类的人与人之間的变异，不仅表明彼此大相逕庭，而且表明无法把一种性质还原为另一种性质。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組合起来的結果。多少大队士兵相当于一个拿破仑①呢？多少二三流詩

① 拿破仑在說下面这句話时，心目中大概指的是他自己，他說："一支由獅子指揮的老鼠軍队，比一支由老鼠指揮的獅子軍队，要好得多。"

人可以构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呢？多少普通的科学家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这一类的問題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独特无双而已。

那些相信历史上杰出人物的重要性的人，光是証实杰出人物底存在，无論如何，是远远不够的。他們必須提出証据，証明这些人不仅存在，而且在他們各自的活动范圍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进一步，他們还得适当地答复这样的詰难：如果这些人并沒有象他們那样地生活过和工作过，是否他們的事业十之八九也会被别人干出来呢？

初一看，这一論点似乎很容易証实。特别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各方紛至沓来的証据充分說明着：独創的典范每每是由少数伟大的人物所創造，而由許多稍許有些才能的人所模仿着。随意考察一下某些重要的文化領域，便觉这一点很为明显。下面我們就来介紹某一种特定形式的英雄决定論的首倡者可能作出的这种考察。

支配文学史和戏剧史的宗师巨匠有埃斯庫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卢克莱修斯、維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密尔頓、哥德、巴尔札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泼劳斯特(Proust)和乔埃斯(Joyce)。还有一些其他人的名字可以增入这一不完全的名单里，不用說，也可以增入相关文化領域中其他不完全的名单里。可是不論是誰去增入这些人，他将强調如下两件事：他們和已經列举出来的作家大体上总得有相同的才具；他們和那些成千上万的詩人、戏剧家和小說家之間有很大幅度的不同，对后面那些作家，我們欣賞他們一些細微的造詣，而并不感觉他們的作品当中有什么伟大气息。沒有任何两张名单会完全一样，这并不怎么重要。假如我們要把名单上西方文化中文学界的最伟大人物增加到一百位，我們只須把那些在所有各种名单中所共有的名字挑选出来便行了。沒有一个人会认眞地否定这些出现在各张名单上的少数人物和那些沒有名单可上的許多人物之間的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也并不会因观察到下列事实而受影响，即：文学界的伟大人物，象其他文化領域中一样，經常是成群地出现的。某些历史时期无疑比其他时期更容易容納一些天才，即是說：更

鼓励天才的产生，或者說：对天才更敏感些。这些时期使天才有勃兴的可能，而对比較平庸的人也是一样給予鼓励。可是这些时期的产生这些天才，比起一块肥土上的滋长花朵来，情况并沒有什么两样；肥土上既茁长名貴花朵，也同样滋生普通杂草，因此并不能把肥土看做花朵的創造源泉。

难以破除的爱好上的不同，影响着所有对于各个文化領域中卓越創作的考察。在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对莎士比亚有不同的評价。但如果我們发生兴趣的是影响問題，而不是"眞正的"成就問題，那末就可能获得更为客观的一致意见。比較一下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单和前一张并非根据影响去編排的名单，我們可以断定究竟有多少伟大人物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我們将发现差不多每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物都出现在第一张名单上，而許多第一张名单上的人物却沒有出现在第二张名单上。换句話說：有几位伟大人物在他們生活的最近的时代里可能为人忽略过去，或被抹煞，而其后又被目为孤峰絕巔，很为人們叹賞，但很少为人学习。

在音乐界，成就的記录更加显著地是所有音乐創作者中比較少数几个人手中的新形式和其圓滿体现的記录，也是他們乐曲設計中新旨趣和其巧妙发揮的記录。我們的音乐家名单里当包括：巴赫(Bach)、格魯克(Gluck)、海頓(Haydn)、莫札尔特、貝多芬、柏辽兹(Berlioz)、李斯特、瓦格納(Wagner)、穆索尔斯基(Moussorgsky)、德彪西(Debussy)、施特劳斯(Strauss)、勛柏格(Schoenberg)、辛蒂密斯(Hindemith)和音乐史家可能以之为实例的其他几个人。音乐的主題，有时候也同它的处理情况一起，都可能是迎合公众爱好，或迎合音乐家（象其他艺术家一样）設法取悅的艺术奖掖者們的爱好。但音乐家也同样經常地选用他們自己所喜爱的主題。无論怎样，他的艺术妙技和創见总不能用其同时代音乐家所共同感受的压力和誘导等說法去解释。

在文学和音乐界，即使我們把某些巨匠大师們的創作宝庫都一起考虑在內，集体創作——史詩、圣歌、民謠等——的証据也比繪画

界更加明显。如在某些大油画和大壁画中，凡是提供了技术助手的地方，这种技术助手完全从属于負責該画的画家底設計和判断。如果我們編制一张现代繪画界中最有影响的画家名单，它将包括乔托（Giotto）、馬薩綽（Masaccio）、望爱克（Van Eyck）、米开朗琪罗（Michaelangelo）、拉斐尔（Raphael）、提香（Titian）、柯勒乔（Correggio）、鲁本斯（Rubens）、普桑（Poussin）、委拉斯盖兹（Velasguez）、华托（Watteau）、大卫（David）、馬奈（Monet）、塞尙（Cezanne）、凡·高（Van Gogh）、毕加索（Picasso）等①。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去注意繪画以外、从政治一直到物理学方面的許多事情，而能了解繪画的历史。关于这样几种与美术家有关系的影响，重要的是一个美术家对待它們的态度。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的材料和技术可以提供共同的、約制的条件；阶級和个人的社交可以提供选擇主題的理想和献身方向；但是，标志出伟大美术家的独特成就的却是他个人的技巧，他的敏感性，洞察力，以及他促使我們用新穎眼光去观察事物的力量。

往往有人断言：在繪画界，象在音乐和文学界一样，伟大的美术家迎合着时代的需求或气氛，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需求或气氛就通过他来說話，纵使他并沒有意識到这一点，或者反对这一点。就算确实是这样，伟大的美术家也应在他如何对待需求方面表明自己，不仅仅去做这个需求的奴隶而已。伟大的創作家每每跟他周围的感觉与理解的方式背道而馳。他应該信賴自己的作品終将产生能够欣賞其立意与巧妙手法的鉴賞力和感受力。讀者只須一讀美术和音乐史上那些受震惊的批評家們向一反传統的新作品所宣布的破門令，就能領悟到那些从亵瀆公众爱好开始的人究竟在多大范围内逐漸轉移了公共的爱好。

---

① 在这名单上，承迈耶·夏皮罗教授（Meyer Schapiro）建議了几个人名字，对此我表示感謝。在編制最有影响的音乐家名单时，我要感謝馬丁·伯恩斯坦教授（Martin Bernstein）和B. H. 海琴先生（B. H. Haggin）。我和他們曾討論过名单上某几个人。当然，对于这些名单所用以表明的观点，他們不能負責。

哲学史反映着政治、宗教和科学的历史，但如不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諾、阿奎那、笛卡儿、斯宾諾莎、莱布尼兹、洛克、貝克萊、休謨、康德和黑格尔等姑且說到十九世紀早期为止的哲学家們的思想作为叙述的中心，誰都沒法把哲学史說得叫人可以理解。哲学的社会学解释已被过度忽視了，但是它所解释的是为什么某种思想在特定环境中被人接受，而不是为什么产生这些思想。眞正能做到体系化了的有影响的哲学，远比所有提出来的哲学要少得多。

有时候，某些思想当时局限于某一学派的狭隘天地内，并沒有多大的进展，而在后来的时代里却重新流行了，并且被人当作一种保卫社会权力的堡垒，或从金城湯池中撼动社会权力的手段。如果这几种情况从沒有发生过，这些思想就还不免秘藏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中，并且只成为在各式各样的思想气候中孤寂的、好探索的心灵永远发生兴趣的泉源。尽管这些思想蒙上了一地方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强調方法，其中某些时常提到的关于人生、斗爭和死亡等論題，对于一切发达的文明国家中的善于深思熟虑的人，都具有普遍的魅力。

即使某种哲学适合于被大家接受，但沒有一种哲学能够显示出它的特殊体系是社会需求或采用这哲学的社会統治阶級所唯一需要的。其他某些同类性质的哲学体系在理論上也一样是合用的。但在所有可以利用来达到把社会理想化或批判社会的目的的哲学体系中，赢得人們接受的那些体系往往以渊博、严密、切合实用和富于适应性见长，而这些长处，各哲学家并非等量具备的。

科学史表明了什么呢？科学发现的累积的特征，科学研究方法的統一性，前一輩研究者給科学提出的共同問題，以及科学、工业和战爭之間的密切关系，——这种种似乎都使下述的假定成为看起来极端不合理：即科学发展中大部分成就应归功于它的領导人物的活动。再說，科学界有許多划时代的发现都是两个人各不相关地完成的业績，例如：牛頓和萊布尼兹对于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萊士（Wallace）对于进化問題，亚当士（Adams）和萊佛勒（Leverrier）对于后来

引起发现海王星的天王星軌道擾动的研究；这些在今天已成为老生常談了。即使一个革命性的发现也还可能依靠一个低微的搖着計算机的实驗室助手的貢献。

所有这些考虑，归根到底，仍然不过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中的伟大，与其說是創造了理論上与实践上的問題，还不如說是成功地迎合了这两方面的問題，这仍然不过是承认：科学，象人类其他各学科一样，接受着从社会生活的需求和压力方面产生的某种促进它发展的刺激因素。但是，同样很清楚，这并不否定一个事实：要去作牛頓或达尔文的工作，一个人必須在智力禀賦方面跟他們相等。假定沒有十几个实驗室助手，认为能另外找到某些搖計算机曲柄或繪制星象图的人来代替他們，这并不神秘；假定沒有牛頓和萊布尼兹，或者沒有任何可与那种善于掌握他們問題的能力相匹敌的才智（这里，能力是不受外力左右的），而认为其他某些个人必然会誕生出来去做他們的工作，那就确是神秘的了。现代物理学借重于现代工业和战爭的，不如借重于下列諸人为多：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牛頓、惠更斯、拉格朗日、拉不拉斯、法拉第（Faraday）、福利叶（Fourier）、克勒克-麦克士威尔（Clerk-Maxwell）、赫尔兹（Hertz）、吉布斯（Gibbs）、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其他一小群先知先觉者。甚至可以这样說：工业和战爭借重于科学家研究的比科学家的研究借重于工业和战爭的为多。真的，就某些最伟大的科学发明来說，例如，就相对論說，很难把它跟工业和战爭問題建立起任何似乎有理的联系。

虽然如此，比起对于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創作来，智力方面的传統，社会需求和科学团体的組織对于科学家的发明确是具有远为巨大的影响。在艺术和文学領域中，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新創作的产生，在下述意义上很明显的是个人的业績——尽管他的一切都有賴于他的文化，但相信假如个别的艺术家或作家沒有生过，而他的业績能被另外一个人干出来，那簡直是荒謬。拉斐尔的雪斯汀殿中圣母象而沒有拉斐尔其人，貝多芬的奏鳴曲和交响乐而沒有貝多芬其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界，任何一个科学家的大部份成

就将被同行中其他个人获得，这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可能的程度则因成就而异。认为如果沒有某一发明，其后的发明就不象会有，——这个論点，我們要設法証实它合法合理，那是极端困难的。不过，某些一般的想法还是适用。如果牛頓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沒有作出他的发明，我們可以欣然相信不久之后别人也会作出来，因为这些科学領域里某些問題引起的兴趣是普遍的，并且第一流的才智之士設法解决这些問題的其他試图也已独立地作出来了。可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某些其他分科却表明了个人循着一定方向曾作出了創造性的业績，在他之前沒有杰出的同行先輩，而所有这一方面接之而来的研究却正在产生。举例而言，我們并沒有明确的証据去保証这个論断：即别人也会发现康托尔的超限数理論和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論。虽然断言除了康托尔和爱因斯坦外沒有别人会提出这些理論，未免卤莽些；但断言别人也会照样提出来，却更少根据。以上这些实例似乎是介于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建立之后新化学元素的发现所說明的情况和«大弥撒合唱曲»的制作所說明的情况二者之間。

差不多在每一个創造領域中都会表现出創造活动的相同的一般样式。有一些例外，特别是宗教。看来这很奇怪：大多数伟大的宗教运动不仅它們的存在，而且連名称也都是从它們的創立者——瑣罗亚斯德、释迦、孔子、摩尼、穆罕默德、路德、加尔文等那里来的。但认为这事实是有决定性作用，或者即使认为有十分重要性，也还未免卤莽。关于一个宗教运动，有意义的事情是它的社会影响和它为什么继續存在，而不是一个假定的創立者所宣布的宗教信仰的宣言。我們說“假定的”創立者，因为对于某几位古代宗教創立者的眞实的史实性，考据学家正在提出怀疑。而且既然他們的教义有时是由后一代的信徒們确定下来的，我們更无可靠的办法去了解究竟有多少教条被忠实地抄传了下来，或者在解释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被改变了。但即使他們的史实性已証明无誤，这对于跟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宗教运动所經受的实践上和信仰上的重大改变，关系也不大。早期教会的神父們在十三世紀欧洲基督教界会被目为异端而烧死。

假如我們用象在我們自己时代里引起宗教运动的同样的力量的看法去判断过去宗教运动的起源，我們一定要作出这样的結論：这些运动主要創造出它們自己的领袖，而这些领袖却成为他們追随者的需求和愿望的戏剧性的象征。不同于神学的装飾，而組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部份的道德理想，是社会传統里永远存在的要素。人們在精神方面从試图控制轉变为寻求救助，这标志着精神已經发生危机和垮台了。在精神发生深刻危机和垮台的时代里，这些道德理想是和一种恳切的希望联結在一起的，即是說，希望事情比外表看来要眞正好一些。用超自然的信念加强起来的希望，就是宗教信仰的实质。宗教领袖把他号召信徒們的时候早已存在的一种感情凝結在他本身和他的生活方式的周围。群众中很少几个产生感应的人接受他个人的影响。榜样的感召力量，特别是一传、再传弟子的感召力量，往往只能感动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个人需求和欲望早已驅使他們走上那个方向了。

*　　　*　　　*

虽然例外情况已經指出来了，让我們暂时还听一听上述各文化领域中英雄决定論的首倡者的主张吧。我們甚至可以对大大夸张了的主张也不加爭論。眞实情况是：除了一个从来沒有被人认眞地辯护过的极端的假定外，一切証据都和我們正在考查的理論完全无关。这个假定是：文学、音乐、繪画、哲学和科学方面的伟大人物也就是世界历史——政治、社会和經济史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或者，换一个說法，这一假定也就是认为：一个莎士比亚，一个巴哈，一个拉斐尔，一个牛頓，一个康德，或者一个巴尔札克的事业的后果，和种种主要的影响一起，形成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形成了政治、經济和社会組織范围以内的社会发展。

把这样一种原因性的意义归功于上述名单中那一类型的天才，那近乎是一种幻想；除了对于科学界人物是例外，因为在科学方面，这种提法远非幻想，可也不象更接近于事实。虽然这是不可爭辯的眞理：技术世界曾受"科学界的英雄們"的发明重大影响，但它必須首

先証实：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历史上的变迁是技术发展的作用。即使一点也不否认首先是蒸汽、其次是动力对我們日常生活和生活中的問題所发生的影响，下面的説法也还是正确的：新工具和技术并不决定着社会的政策，而只是給它提供工具。坦克和飞机使现代战爭发生了革命；如果人們以可与相比的精力用之于农业和运輸部門的話，它們也眞会同样地使这些部門发生革命。但是說它們造成了法西斯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未免太愚蠢了。这是一定的：技术进步了，可能一夜之后接着便是普遍的失业和貧困，但是失业的更确切的原因，如果不是那么直接的原因，則是社会生产制度，它使这些人的继續工作对于雇用他們的人无利可图，即使对于社会还是有用的。现在的工人們比其前辈懂得更清楚了。前辈工人們只是試图捣毁机器，不去設法把机器置之于社会控制之下。

技术革新并不排除选擇和行动的不同途徑。技术革新可能因取消某些可能性而致选擇的范围狹隘了，它可能被用去实现一旦选定了的决定。它并不造成战爭、和平或社会革命——即使是內閣的各种变动也与之无关。最后，不应該把这点看漏了：在科学巨匠的名册上有些个别的科学家，他們的科学理論并无重要的技术后果。技术的历史，比起可以跟它区别开来（但并不分离）的純科学的历史来，是次等人物的历史，是一些福特之流和爱迪生之流的历史。他們因获得賽跑冠軍（指科技研究的成功者——譯者按）而卓然成家。在这次賽跑中，参加角逐的人多到看来沒有一个人是非他不能完成这次竞賽的，可是某些人几乎总会获胜的。

摆在我們面前的爭論点是在一个不同的領域中，那里，艺术和科学起着次要的作用。問題是标志着历史时期的巨大政治、社会和經济的变动，或那些成为历史发展中轉折点的大事件，是否永远应归功于天賦无双，或境遇无双的人的业績。假如有这样的天賦无双的人，或杰出的人物，那末在他們能够发揮影响之前，該有怎样的环境场合呢？或者問：他們是不是能随时起作用呢？循着这些方向而作出的专門的細致的研究工作是很少的，但也做了一些。我們接着就要把

話題轉到它們中間最最耐性的和彻底的研究上去。这里的問題比已經討論的領域中的問題要困难得多，因为在給“历史上的英雄”下定义以别于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英雄的时候，所有各种应加考慮的因素都搞混乱了。历史意义的評价被論爭的激情搞得大为困难。罗伯特·英格騷尔(Robert Ingersoll)和威尔士(H. G. Wells)拒不承认拿破仑是英雄，只因为他們不贊成他①。道德判断在历史上誠然有其应占的地位，但在决定任何个人对于人間事务的实际影响时，它們是不发生作用的。我們可以痛恨希特勒，恰恰因为我們相信他革了二十世紀文明的命。

在我們討論的預期到达的进程里，将会当头遇到定义問題。但我們首先須得考察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影响所作的主要的經驗的說明究竟有哪些发现。这种說明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告訴我們某些类型的人物創造了历史，而且还告訴我們他們創造的历史究竟有多少。这样就把我們的話題引导到伍德(F.A. Wood)的著作上来了。

---

① 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就是 H. G. 威尔士对于拿破仑特性的分析。“失败的(一个高貴的假想)拿破仑所能做的只是在机会的高山上昂首闊步，正如一只小公鸡在粪堆上一样。他在历史上树立起来的形象是一个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自大狂的人，精神空虚，禀性貪婪、狡猾，对所有信任他的人表现出无情的輕蔑，并且夸大地摹仿着愷撒、亚历山大和查理曼，这种摹仿，如果不是用人們的鲜血凝結成的，則純粹是滑稽可笑的行为。”(«世界史綱»，星出版社 1929 年紐約英文版，第 895—899 頁)

第三章 帝王的影响

卡莱尔(Carlyle)之后，英雄史观的最极端的主张者大概要算美国学者菲德烈·亚当·伍德(Frederick Adams Wood)了。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里，伍德的貢献比較受人忽視。伍德所不同于卡莱尔和这位执拗的苏格兰先知的其他信徒們的，是他試图給予自己的論題以經驗的基础，而这一論題將經受批判的、科学的审查。伍德的經驗研究，同他的相当奇怪的“配子”（即精子和卵子）史观以及关于古代历朝兴起的先天构想并无关系。他的著作一般地表现为把銳利的眼光、耐性的列举和荒唐的夸张三者合而为一的奇妙的杂拌儿。在他經常表示的不受偏见影响的反复說明中自有其幽默的一面，虽然在有些地方他論証他的論題頗象一位律师为訴訟委托人进行辯护那样，如他在声明客观性时，把它說得多么純粹，甚至“任何假定也沒有，除非这假定是：一本书是一本书和一个印刷字是一个印刷字。”①

伍德的論証程序很有趣；要給他的发现作出評价，必須先了解这一程序。他詳細地研究了西欧从十一世紀到法国大革命时为止这一期間內三百八十六位君主。这些君主們是他从如下十四个国家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法兰西、英吉利、葡萄牙、尼德兰、俄罗斯、普魯士、瑞典、奥地利、丹麦、苏格兰、土耳其、喀斯蒂尔(Castile)、阿拉岡(Aragon)、联合西班牙(United Spain)。他所考察的这段世界史是一段帝王們，当作一个集团看时，发揮着（就手头材料所示）比先后任何时期更加专制的权威的历史时期。同时，伍德还作出了一张各个帝王統治时期各国国內情况的对照表。接着他把統治者的个人品质和性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3頁。

格跟他們国家的情况作一比較，以便决定两者之間究竟有沒有任何实在的相互作用。他把統治者分为三个品类——强有力的、軟弱的和普通的，并用“+”、“-”、“±”三个記号分别表示之。他們王国的情况同样地也分为三种样子：即表现出繁荣光景，或衰落光景，或两者都无明显征象。这些情况也各用“+”、“-”、“±”記号表示出来。

統治者的性格决定着他究竟应属于哪一品类，而他們的性格描写則根据于“标准的”史料，百科全书以及其他参考資料的广泛考察，而不为这些資料的写作观点所左右。性格描写主要根据智力特征，而不是德性，因此分为上智，“+”；下愚，“-”；或中庸，“±”。伍德把各种学派的史学家們对于一位帝王的“善”与“恶”，或他們究竟是人类的福星还是祸首的判断，同他們对于一位帝王的“才气纵横”、“昏憒愚妄”、“睿智”、“顢頇”、“軍事与政治才能”的判断作了对比后，发现各家判断之間具有令人难忘的一致性。

一国的情况只是就它的物质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部由“政治与經济事务”組成——去判断。更明确地說，物质条件的分类，即分进步的、衰落的、或既不进步又不衰落的，是以历史学家对下列各項的叙述为依据：“財政、陆軍、海軍、商业、农业、制造业、公共建筑、領土变更、法律和守法状况、整个人民群众的一般情况、政治自由的增长与式微、以及国家的外交形势，或从国际間所看到的該国的威信。并不試图包括文学、教育、科学、或艺术活动在內。”① 最后这些題目所以省略掉，大概因为在权威历史中对这些問題的估計格外具有相对性。但伍德并沒有証明：这方面的判断比物质事务方面具有更大的相对性。

在这不厌其煩的論証过程的末尾，伍德得出一个非常触目的結論。他把帝王表和其王国情况表作了比較后，断言道：两者相互作用的系数“約0.60到0.70，而可能的誤差为0.05左右”。他粗略地計算了所有与他自己的假定相反的两可情况，作出最保守的估計，认为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10頁。

相互作用系数的值是 0.60。用百分比来表示，他闡明結論如下：“强有力的、普通的和軟弱的帝王分别处于强盛的，普通的和衰弱的时期占实例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强有力的帝王而处于衰弱的时期，和軟弱的帝王(包括非王室的摄政者們)而处于强盛的时期，約占实例的百分之十。另有实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則为普通的帝王而处于强盛或衰弱的时期，或普通时期而有强有力或軟弱的帝王。”①

这些相互作用的系数和百分比是极端高的，不能煞有介事地把它們解释为只是事有凑巧而已。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把它們解释为如下三种不同假設的証明：(一)历史条件产生强有力的、軟弱的或普通的帝王；(二)各类帝王給历史条件以决定性的影响；和(三)无論帝王或历史条件都是某种第三类因素的結果。伍德擯弃第一和第三，而单单采取第二个假設。他用一种在他著作中最为温和的說法断言道：“帝王們影响了历史；何况，从十一到十九世紀，帝王們影响欧洲的历史十分巨大，帝王們的性格和其国家情况的相互作用至少大概 r＝0.60”。②

这一論点当然和英雄史观相符，但在伍德著作中，它跟其他两个主张有联系，而这一論点，在对它作任何評論之前，应当把它同伍德的其他两个主张区别开来：第一个主张是历史上的英雄首先是帝王；第二个主张是帝王在本质上与其說是社会的創造物，不如說是生物的創造物。的确，伍德把他的生物学上的想象充类至尽了，竟管王族叫做“人类的亚变种”。③

伍德有計划地輕視历史上杰出的非王族人物，即使他們当了摄政者，或国家的权貴。他并不否认黎塞留比路易十三强，或者，如果他的研究工作下及十九世紀，也不会否认俾斯麦比威廉第一强。他认为容許政治家、情妇或教士从自己手里夺去权力之繮的帝王是軟弱

① «帝王的影响»，1913 年紐約英文版，第 246 頁。

② 同上书，第 35 頁。

③ 同上书，第 275 頁。

的。假定我們接受伍德所开英雄的帝王名单的表面价值，而在这名单上加上这些有权有势的非王室人物的話，那末主张英雄史观的論点当会加强。但如果我們擯斥他的名单和他关于帝王作用的結論，这不足以駁倒含义更广的英雄史观，后者所认为的英雄是不管他出身于哪一个社会阶层的。除非用他固执的配子預定論的說法，一般很难理解为什么伍德并不去扩大他的考察，以决定所有有材料可查的身居要津的人物的性格跟他們本国国情之間的相互作用。

这个配子史观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輕視了环境的因素，并且几乎絕对强調所謂遺传事实。照伍德的看法，"精神品质正如生理品质一样地遺传下去，并且遺传的程度也一样"，而在精神品质之中包括着所有特性，如智慧、軍事方面的英勇、野心，这些特性的有无对帝王的强和弱有重大的关系。"既然残酷与不残酷典型的区分，荒淫与正經，野心勃勃与慵懶痴頑等等的划分并不明显和絕对明确，那么现在所考察的区分趋向就只能希望在通常的遺传作用里去考察了"。① 伍德因而肯定說："近代王族（从紀元一千年起），当作全体看时，在智能方面断然强于平常的欧洲人；我們可以毫沒有被反駁的危险，說：王族，作为一个单位看时，是优于任何一个家族，不管这一家族是貴族或是平民"。②

談到伍德的配子史观，我們說，他的生物学理論很难自圓其說，其中論証是浅薄的和先驗的，所引的具体証据也并不适当，这并不算太苛刻。不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精神特质可以遺传轉移，这些精神特质必然不包括伍德在作帝王分类时所列举的那些特质。随手打开他的梗概表来，看一看他描写奥地利的約瑟夫第二的性格吧："不知休息、勇敢、野心勃勃、机警和见聞广博……不实际、专爱空想、拙劣的将軍……仁慈、宽大、急于改良。严厉而厚道。以对内有美德而见誉。其主要缺点是口是心非。"或者再看这段对俄罗斯的德米特里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270頁。

② 同上书，第257頁。

(Demetrius) 的描写："野心勃勃、富有胆識、渊博、多才而輕率。好脾气、和藹可亲、好心肠、庄严。"或看这段对英国約翰王的描写："并非不智或欠缺一股子猛劲，但优柔寡断且无深远眼光。十足墮落、卑鄙、有仇恨心、淫蕩、残酷和虛伪。"

就生物学理論言，硬說大部分这些特征在发生学角度上說是預先决定的，并无一点可資辯护的理由。一个人的精力可以靠他生来的生物学上所謂天賦，但是养成他"不知休息"或"野心勃勃"，熱中于战爭或研究的，却断然不是靠天賦而来。性的力量可能在腺的遺传方面有其根源，但是认为"貞操"，即是說：丈夫的坚貞；或"荒淫"，即是說：追求有夫之妇——这是伍德使用这些名詞的方式——是系腺方面的天生素质，眞是荒唐透頂了。毫无理由去假定圣奧古斯丁为了教会和独身生活的緣故而休去他的妾妇时，他的腺改变了。

即使关于尙有討論余地的"智力"問題，伍德的主张也并沒有什么說服力。因为，大体上，他认为智力的标志是成功——"智力意味着实际上获得財富与权力"。他只是从获得权力方面的成功与失敗之处推断有还是沒有遺传的智力。假如帝王与帝王之間和帝王与平民之間取得权力的机会是相等的，那末这个推論也可以說是正当的。但伍德并不敢这样冒险断言，除非就史前蒙昧时代而論，因为关于史前蒙昧时代，黑格尔曾經說过，我們最最可以肯定的，也就是我們最最不了解的。

在評价遺传和环境——发展帝王的特性并产生发揮这些特性的机会的环境——的相对意义时，伍德根本貶低了环境的影响。他甚至否认帝王拥有較平民更好的机会去发展他們的才能，硬說：不管帝王享有多么优惠的条件，它們早被更大的不利因素抵銷掉了。他給自己的結論——王族的卓越与其說是社会的賜与，不如說是自然的賜与——想出的論証理由之一是帝王們，作为一个阶級来看，在政府中較大臣們具有更大的成就。"……总計所謂伟大的政治家总比帝王的总数要少一些。机会可能曾（!）帮助帝王們为数比大臣們要多一些，但其他考查材料指出了机会之不同通常只具有一点点的成因价

値(!)，这完全不象是那样的不同，即足以說明那个在数字比率上表現出来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显得政治家出自皇族的机会千百倍地多于出自平常人家。"①

当人們想起伍德所討論的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世袭继承成为常例的时代，他所說的机会"可能曾"帮助帝王們为数比大臣們要多一些，似乎是一个笑話，而他提到平民也具有相当机会，则成为趋炎附势的笑話了。依据同样的邏輯，人們可以主张說，一个世袭教士在进行寺院仪式时所以表现出才能来，其原因当从他比俗人具有发生学上的优越性这一方面去找得。如若认为"其他考查材料指出了机会之不同通常只具有一点点的成因价値"一句話是既定事实，那人們就能引証大批考查材料，从教育一直排列到軍事成就为止，証明机会之不同却經常具有巨大的成因价値。最伟大的将軍們，如大家所熟知的，差不多总是受过专业訓练的。

大概顶顶确实的証据——証明伍德过份卖弄他生物学上的拿手好戏的，可以在他自己引証的历史材料里找到，不用說，也可以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君主政治史中找到。照他自己承认，从1603至1811年，沒有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統治者身登英国大宝，可能的例外就是威廉第三。可是这一漫长的时期，照他說，却是一段继續不断地进步的时期。苏格兰也有相同的情况。对于这一个在英吉利、苏格兰历史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之間的可惊的不同，并沒有什么配子史观理論可予解释。整个十九世紀当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里，帝王們比起国內政治家来总是相形见拙。在二十世紀，他們或被放逐，或成为装飾性的象征。拿破仑，就配子作用和社会地位說，是一个平民，而与欧洲戴皇冠的一起揮金如土。一百年之后，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希特勒、阿泰托克(Ataturk)、梅泰克雪斯(Metaxes)以及追随独裁者們所树立的榜样之后的其他小信徒們，或是埋葬了他們的君主，或是把世界上"最优秀"家族的苗裔变成下賤的残物。对配子史观所要說的

---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261頁。

就是这些！

* * *

现在，我們可以撇开伍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奇妙的狂想来考虑一下他的积极的发现了。即使我們接受了他对于帝王与国情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系数的評价，这評价本身还是不足以証实以下这种观点：即“世界上的事业是由少数几个极伟大的人所开創和指导的”。相互作用所提醒人們的是环境給予伟大人物的成因影响跟伟大人物給予环境的成因影响是一般大的——这个可能性，伍德因运用无效的論証和以假定情况为論据的巧辯論証而把它忽略了。益发重要的是，一直要到我們了解了在国家情况和其他可变因素（如技术发明、气候变化、新土地和資源的发现等，以及此外一些并不直接依靠帝王决定的其他因素）之間到底存在着什么相互作用时，然后才能确定相互作用的相对价值。理論上說，这些一連串东西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系数可能高于 0.60。我們根据这样一系列的因素可能比根据統治者的遺传素质对于文化的特征做出更加正确的預言。

假如我們把話題轉到伍德所提出的逐项相互作用，我們第一个批評是这些起相互作用的各项含义太广泛，以致在評价历史上英雄的行为时它們无法十分說明問題。例如，“一国的形势”，在任何时候，或者即使指某一段时期，总是含义太多并且太不确定，难于把它归因为个人行动的結果。我們对于人的行为效果的自身經驗指出，只有当我們把〔人們〕所特有的作为与不作为之类的行动，通过一連串事件，跟一些特殊的事件与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断定这些特有的行动是否具有历史的因果作用。伍德沒有在一連串事变之中考虑事件，这使他整个治学方法搞糟了，因为他沒有办法去处理历史上的事变性行动和事变性人物。举个例說，假如某一帝王是个强有力的人物（+），而他的在位年代是动乱的（-），伍德便以为这是他在历史上沒有起重要作用的証明。但很明显的，他在位年代里的动乱局势也可能就是那位帝王的行为造成的結果，就是某种胜利或灾祸的結果，或某一与国运有关的政策的結果，这种政策的后果

是我們可以通过特定条件下一系列連續的事件而追索到的。同样，假如某一帝王是强有力的，而其国家又恰好是繁荣的，伍德就假定这是英雄史观的証据。但这样一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除非能够指出国家的繁荣（不管怎样去給它下定义、怎样去衡量它）是某种历史事件的結果，而此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又正是这位君主，或某一其他伟大人物。

假定一代帝王和其在位时代之間具有因果联系，这正是伍德治学方法中的巨大缺陷。假定一国的“繁荣景象”，或其“衰落情况”一定是当朝帝王的特性或决策的結果，这有什么正当的根据呢？在某一特殊的重要方面，一国的形势可能是前朝帝王在推行一种政策时种种行为的后果，但这种政策的后果，不論好或坏，都要在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才一一显露出来。法国（1731—1793 年）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是“軟弱”的皇帝，而他們的时代特征是社会、經济情况悲惨不堪；但把这些悲惨景象归因于路易十四（1661—1715 年）的政策和活动，則可能看起来更为合理些，而路易十四是一个“强有力”的皇帝，他的在位时代比起他的那些子孙的时代来要繁荣得多。大不列顛工业革命的种种后果在維多利亚女王时代，比乔治第三时代，要表现得更为透彻而明显。可是把貿易昌盛和商业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景况归功于她，或归功于迭斯莱列(Disraeli)，或葛莱斯頓(Gladstone)，那就大謬不然了。其实这也是駁斥所有英雄史观时必須考虑的一个严重問題：把工业革命归功于乔治第三，或工业革命开始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物——这究竟有沒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呢？都市化給现代文明的非常革命性的影响，不管当时活跃着的是些什么头戴皇冠和列身朝堂的人物，还是会产生的，这里說的仅仅是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而已。

从另一个立脚点去檢查伍德的梗概表，我們发现“繁荣”这个名詞，即使只取它“唯物主义的”意义而言，也实在过于包罗万象了，簡直使我們无法充分肯定地据此断言一个时代的特征。依照伍德的看法，一国的繁荣是可以从历史学家們关于該国如下几种情况合在一

起的叙述中推論出来："財政、陆軍、海軍、商业、农业、制造业、公共建筑、領土变更、法律和守法状况、整个人民群众的一般情况、政治自由的增长和式微、以及国家的外交形势，或从国际之間所看到的該国的威信。"他并沒有明白指出一个国家到底应該在一个方面显示最巨大的进步，还是应該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进步才能叫做繁荣。他明知一个国家难得会全面"进步"，但对于不同領域中取得进展的相对重要性，他却沒有作出估价。一个具有伟大的公共建筑、安定的法律和守法状况，但賦税过重，政治自由式微的时期是否应該看作"繁荣的"呢？或者采用伍德为查理第一时代的英国所举示的种种特征的实际綜合为例："商业和一般物质福利的扩大。国际威信衰落。公众不满。内战时的灾难。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① 究竟根据什么原则，伍德从这些情况的排列对比中得出"繁荣"(＋)的結論来呢？当我們把这个結論同他对英国从1199年到1216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描写——为(±)，即根据下述原因定为既不繁荣又不衰落——作一对照，就显得我們的問題格外提得恰当了："动乱与不和終于形成大宪章。个人的权利明确了、加强了。立宪政治的成长这件事应看作非常重要"。英国立宪民主政治的成长，对于該国嗣后的发展来說，确乎非常重要。那末，为什么它不比当日的一时混乱和局部失調反见重要呢？

那些现状激烈变动的时代，不管它們的最終成果多么进步，在伍德的表上，这些时代在多数方面都显示出相对的衰败来。这很显然，作者自以为自己完全不受那些并未表明出来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些判断在他进行分类时却大起作用。当我們用这样几种包罗万象的范疇，如"繁荣"和"衰落"等去处理題目，而不把它細分成表达比較有限的社会现象的名詞时，这种毛病就逃避不掉。

給伍德說句公平話，应該强調指出，他是了解某些困难的，虽然沒有认眞重視它們。在研究之初，他承认对政治自由作出相应的評价很觉为难，因为"人們經常发现在强有力的国王統治之下，国家差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401頁。

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兴旺，只是人民受着压迫”。他快刀斬乱麻地干脆把国家的政治自由跟个人的勇敢和坚定一样对待，当作“中間属性”·一部分是物质的，一部分是精神的。他建議我們“二等分”之。这意思是說，我們或者在評价一国情况时不管有沒有政治自由，或者有时候，在沒有指明的情况下，我們应把免于压迫之自由看作繁荣的社会的要素，但有时候也不如此。不論是哪种情况吧，这种論証程序看来是随他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实际上，伍德是这样：他不能无視于政治自由的状况，而同时，他又不知道应該把它怎么办。既是他相信着历史学家們对不同时代的一般評价，就应当看到历史学家們給政治自由所规定的重要性显然会因他們的立足点和历史哲学的不同而异其规定。一个蒙森(Mommsen)派史学家对某一时代的看法将不同于一个吉朋(Gibbon)派史学家；一个泰因(Taine)派史学家对之不寒而慄的政治事变恰正是一个米歇勒(Michelet)派史学家所夸說的。当这些历史学家們的判断混杂成一个假定算是某一时代的客观、全面的描繪时，这一描繪就掩盖了一种价值判断。

伍德把帝王分成优秀的、普通的和低劣的三种，其理由也不是常常明显的。为了使他的分类取得一定的科学价值，那些决定帝王属于哪个特殊品类的特质就一定要不受他在位年代的国家情况評价的影响，因为他相信国家的情况主要是那些特质的結果。从国家情况中推断帝王的特质，然后再引述这些特质作为造成这种国家情况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成为严重的以假定情况为論据的乖謬論証。可是还令人难免觉得伍德所給分类的帝王如果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伍德便会把他們的“与生俱来”的品质作出不同的划分。关于英国的查理士第一，伍德說，他的主要毛病是“口是心非和固执不化”。根据同样的材料，别人却可能說，查理士第一是“精明圓到而頗有原則性的”。大概伍德在抱着一种不同的政治与宗教偏见时，或者在估計那个国王和一个不很艰难的时代的关系时，就可能同意这种看法了。这里，同样的，道德的判断完全加入到对个人性格的全面評价中去了。

对伍德的論点的最大的反对理由大概是他出于自己的爱好而把

时代局限于法兰西大革命之前。整个十九世紀給他提出了关于各国帝王的生活与命运的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材料。但他不去接触它。原因很清楚。甚至是一个最頑固的保皇党也不会认眞地主张十九或二十世紀的帝王是英雄，除掉一个不是王家出身的篡夺者拿破仑之外。最近两世紀的帝王影响之衰落对伍德来説，是整个儿难于解释的問題。說明这一衰落的那些情况与事故不能把它們本身解释作为帝王行动的結果。因为照伍德的主张，遺传因素是比較恒定的。

总結我們研究伍德为他自己限定的那个历史时代的証据，我們不能不作这样的断言：他为王室的利益而作的殷勤的、饒有趣味的努力是失敗了。假如他扩大专题研究到数十个杰出的人物，以便逐項地探索他們在决定帝国趋势和历史河流动向中所作出的貢献，他的論旨虽不至于这样极端，但可能健全得多。不論他的发现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都能够被如下事实所充分說明——即，既然他研究的正是君主专制时代，統治者自然要比后来的时代拥有更大的无論作好事或作坏事的权力。話得說回来，如果这是历史时代的性質給君主政体的影响划定了范围，那末一个时代轉变为另一个时代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现在我們必須把話題轉到那些社会决定論者的相反的主张上，他們深信他們了解答案并且解决了問題。

第四章　社会决定論：黑格尔和斯宾塞

十九世紀期間被夸大了的卡萊尔"英雄主义"引起了一种相反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否认历史上英雄人物和英雄活动的存在，甚至也不否认它的必要性。它所主张的是：英雄活动所造成的事变决定于历史規律，或者說决定于英雄人物出现时的社会需要。哲学家們对于这种强迫性的社会需要，說法各有不同：有的把它叫做"形而上学的"，有的把它叫做"理想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济的"等等。而我們将統称之为"社会的"。这种社会力量，每当必要的时候，会从茫茫人海中召喚出一批英雄来。英雄人物的"使命"就是要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而英雄人物的伟大程度則要看他对于这种被賦与的任务究竟了解得多少。

有的哲学家认为：根本不需要英雄人物来完成世間的工作。他們相信社会需要会通过群众的活动来"实现它自己"，而构成群众的单个的人，站在远处来看，是彼此不相上下，无法辨别的。对于他們来說，只有群众或阶級才是英雄。这一派的若干后継者的著作，又把生产数字代替了群众的地位。

十九世紀中所有的社会决定論者有个共同信念：即认为不管英雄人物的活动造成的后果意义怎么重大，总可以从各个完全不同的考虑角度在事前加以推断。不过一般总是就事論事，也就是說：总是在英雄的事业已被人們观察到了之后，才加以推断。

即使他們主张某一位有着某种英雄气质的人确是在一个必然性的历史典型中构成其中必然性鏈环底必然的一环，也极少是在他作出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业績以前就断言：有某一个具体人物符合了当时时势的种种特殊要求。黑格尔曾称贊拿破仑这位英雄人物为：

"馬鞍上体现出来的世界灵魂。"但他也是在耶拿附近亲自瞻仰到了这位英雄之后才有这样信念的。可是他更加相信的是：即使拿破仑沒有降生，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什么人物出面来体现那"狡滑的理性"的使命——如果不是在馬鞍上，也許是在步行中吧。

不同意于英雄决定底一般观点的說法，不一定就是对这种学說和其倡議者作明确的駁复。例如，在所有的社会决定論当中，以黑格尔的学說为影响最大；而黑格尔的主张在卡莱尔的学說还未变成时髦以前老早就已构成体系了。黑格尔的学說乃是針对着十八世紀的唯理論者而发的——这些唯理論者用个人心理或是运气的好坏来解释历史。馬克思的主张則是做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的系論而提出来的。斯宾塞虽然带着輕藐的眼光来批評卡莱尔〔正如巴克尔(Buckle)和滕(Taine)所做的一样〕，但他所写的东西沒有一句不是从他尊奉的社会进化鉄律的教条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們现在来詳細探討一下这三派决定論者关于英雄的历史地位不同的論点，对于我們是会有所启发的。

黑格尔的看法（在这方面追随他的斯宾格勒也是一样）是认为：伟大人物并不是物质条件(也包括社会的或生物的)的产物。根本上說，却是他的时代"精神"的表现，或者說是他那个文化的"灵魂"。当文化向前发展，就有种种客观需要产生，而这些客观需要是要通过人們的主观决定体现出来的。人們滿足自己的多方面愿望，履行自己的迫切义务，并以他們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来克服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障碍——但他們所造成的东西总是不同于他們所期望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若有所知的朦朧状态中編造了命运之网的一股绳子。所謂命运之网也就是历史的"意义"或历史的"理性"。伟大人物就是一个了解到他的言行是表现事物的理性的人。他尽管騎在别人头上，或甚至騎在全体人民的头上，也还是具有历史的或神圣的根据，那些黎民百姓就老是只懂得些平常道理。

黑格尔认为每个时代都会有当之无愧的伟人，但所謂"当之无愧"不是决定于伟人怎样审慎选擇自己的出处，而是决定于一种由上

天鑄定的模式。这些模式是由时代当中激生出来的，而且还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滲透到时代的各方面事变中去。号召那伟人降生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任务并不是从获得面包、和平与自由解放的日常問題之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含蘊在人的邏輯概念之中，含蘊在社会发展的种种有机的必然性之中。沒有这些必然性，人就不能成其为眞正的人，也就是說不能成为自由的人。黑格尔自信他已认識到日耳曼民族注定要成为統一的国家，并且是最后一个举起自由火炬的民族。但他的认識并非根据于德国經济史或政治史的特质，也不是根据他所效忠的奧地利皇帝或普魯士国王的个人英雄的种种性格。他的认識是以自由这个邏輯概念的辯証必然性为根据的。行动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伟人就是掌握了这种必然性，而且也为这种必然性所掌握的。同样，斯宾格勒也认識到：每种文化都会有它自己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但他认識到这点并非由于任何經驗証明，而是由于他对于那社会有机体的永恒生命循环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默认。沒有这种类型的伟人，社会有机体就不能体现"它的灵魂的风格"。

根据这种见解，任何个人的伟大只有等到事变之后，等到他的全部业績变成尽人皆知，而且能够有把握对他加以品評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伟人并不創造历史，而是"伟大的时代"召喚出伟人来。"伟大的时代"就是指人类从自由与組織的一个水平上升到自由与組織的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之过渡时期。所以，伟人是总会找到的，不过究竟在哪里找到——是在皇帝的宝座上，还是在乞丐的草棚中——却是料不到的偶然。

那末，由黑格尔来看，所謂伟人的伟大究竟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关于什么是世界秩序这一种朦朧的知觉当中。这种知觉最后会轉化成为政治行动，用来安定世界秩序。伟人象愷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等都是被神圣的理性接触过的。在他們同时代人的清醒头脑中，这种神圣的理性看来好象是疯狂似的。

由此可见，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他〔愷撒〕个人的胜利，而是一

种不自觉的本能；要来完成那时机已經成熟的事业。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他們可以称为英雄，因为他們不是从现行制度所认准的、沉靜有常的事物进行中，取得他們的目的和他們的事业；而是取自一个泉源——它的內容是隐藏着、还沒有达到现实的存在——取自那个內在的"精神"，这"精神"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它冲击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冲击一个外壳，把它打成粉碎。因为他自己具有另外一个核心，而不是这一个外壳的核心。所以他們这种人在表面上象是从他們自身吸取了他們生命的冲动……

当这类人物追求着他們那些目的的时候，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展开的那个普遍的观念；相反地，他們是实践的政治的人物。不过，他們同时又是有思想的人物，他們见到什么是需要的东西和正合时宜的东西。这个正是他們的时代和他們的世界的"眞理"；可以說是排行在次一瞬間即将輪到的物种、已經孕育在时間的母胎之中了。……这样說来，我們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們的行动、他們的言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詞。①

我們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反对把一般俗人(原文是：世俗的有死者)的道德标尺应用在伟人的事业上，或是应用在他所属优秀民族的业績上。这就因为英雄人物对于他們所成就的无情业績是不能負任何責任的。他們都是未来的时代精神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倒霉的工具——只待他們的事业一旦成功，他們本身就将为历史所抛弃。"他們的一生都在辛劳和困苦之中渡过。……他們或者早亡，象亚历山大；或者被杀，象凱撒；或者被放逐到圣海里那島，象拿破侖。"这就是伟大的代价。英雄可能死亡，也可能显得遭受失败，但"历史"总会为他們辯护。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69 頁。

但我們不会受黑格尔辯解的欺騙。他的全部哲学不外是处心积慮地要把个別人物的单个儿行为所应負的道德責任轉嫁到那非人格的自然与历史的“大全”身上去。他让我們相信：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身不由主的，正如他們的时代是必然的，他們的行为也是必然的——这都是受了同一邏輯的支配。他犯了双重的亵瀆罪：旣說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又說现实的就是神圣命定的。那受天之选的少数英雄正如那非受天之选的多数群众一样——都不能創造出任何东西，而只是执行早已派定的任务。即使世界上所有的英雄都不存在，世界历史还是会照样进行的。

假如我們把以上引自黑格尔的那一段話加以仔細推敲，便不难明白：一旦剝掉它所披的唯灵論的外衣，其中原来包含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决定論所具有的共同假設：

1. 沒有一个人能从新創造历史。他总要受到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限制。他的精力和聪明也許是盖世无双的，但他的种种愿望和他着手要做的事业都是如同黑格尔所說：早已植根于“客观精神”之中。而所謂“客观精神”也就是如今的人类学家所謂文化——那是指超乎个人之上的种种制度，如語言、家庭、宗教、法律、艺术和科学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必須这样来理解：他的行为决不是代表一个个人适应环境的活动，而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和它的另一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伟人所能够做的只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容許做的，但文化只能容許向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一点却是关鍵所在。沒有眞正可以选擇的余地。

2. 人們（即便是伟人也罢）所想象他們自己正在做的事，和他們所做所为的客观意义或重要性——这其間是有着分别的。他們种种活动的意义，追根到底，必須从历史的趋势上来理解。而历史趋势是要：追索到过去，包含着现在，而且指向着未来的。在严肃的历史事績面前，人們很容易随便利用那道德上所謂正义的标尺，就因为他們往往只就一个一个的事件来品評是非。但那正是一种幻想，是人們的鼠目寸光所致的。

3. 那震撼世界的事功或思想，足以表征某些人物之伟大的，只有在当时的文化已經有了准备，或者說，已經对此成熟时才有其可能。英雄必須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能够順应时势的人物。正如一个嬰孩的降生，虽然必須依靠助产婆的帮助，但只有胎儿已到成熟时才能生出来。尽管象普罗米修斯①那样的呼风唤雨的本領和創造生命的热烈愿望，除非他所想創造的那个生物已在现有的种种条件下生出了胚芽，他的愿望还是要注定落空的。"那单只表现愿望的月桂树不过是从来沒有变綠过的〔想象的〕一树枯叶而已。"②

4. 因此，所謂伟人不过是历史力量或社会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代表"，一个"符号"或一个"工具"罢了。他必須順应历史的潮流才能获得声望，或取得胜利。如果我們要想掌握他所以伟大的来源或理由，他的自传，或者，純粹个人性格，对于我們的目的来說，都仅具次要意义。我們必須轉过面来考察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因为只有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才是那伟大的历史力量发生連續震撼的场所。而这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理解的。科学的历史或社会理論的目的正是要认識和掌握这些历史力量。也只有认識了这些，人們才能获得自由和控制社会的力量。社会决定論的各种变型之間的不同，就看他們是怎样来解释所謂"科学的"这个术語——究竟是經驗論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 * *

斯宾塞和受他影响的那一群知名的作家达到了相似的結論，不过所用言語不同，所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也不同罢了。斯宾塞所以相信伟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其所用的方法并不是依据經驗来仔細研究世界历史，而是单純地由他的社会进化論演繹出来的。社

① Prometheus：希腊神話中半神半人之神，曾盗天火，将其用法授于世人，因而获罪，被宙斯縛于高加索山上，每日命一鷲鳥来啄食他的脏腑，以折磨他。——譯者

② 黑格尔：«法哲学»，拉松版，第317頁。

会进化論的假設是:所有的社会都是以一种一致的、漸进的和进步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有任何一位行險侥幸的天才或冒險家能够让社会发展軼出了它的既定的道路，那末，在发展中将找不到一致性，或者尤其可怕的是不能保証发展的漸进性。这时革命就会发生，只有革命的爆发能够来打断那緩慢而逐漸积累的演变进程。

虽然斯宾塞沒有讀过多少历史传記，但他却堅信："如果你希望理解社会进化的种种现象，单靠閱讀历史上統治者传記(由那貪婪的拿破仑到那阴险的腓特烈)，纵使你把眼睛讀瞎了也达不到目的。"①斯宾塞还沒有象巴克尔那样陷于荒謬的极端，因为巴克尔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国王、将軍、政治家等等人物只能阻碍文化的发展，从而把他們叫作"傀儡"——意即毫无历史意义。假如我們有兴趣来一一摹拟自古以来这样一些人物的生动图形，历史上伟人的数目的确是車載斗量的。但如果竟把任何划时代的大事归功于某一时期的某一个人，那就和走入死胡同一般，将会全无所见。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当他涉猎史册时〕，也許会把个人看做是某一决定性事变的切近的或直接的原因。但他还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問題中的个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个人的那些行动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在他(伟人)重新創造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創造出来。"②

① 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美国1912年版，第37頁。

② 在关于伟人及其环境这一問題上，斯宾塞的见解对于现代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这样說，决非夸大其辞。例如，奧格本(W. F. Ogburn)所著«社会力量»第5卷(1926—7版)第225頁以下«論伟人和社会力量的对照»一节，可供参考。虽然著者对于生物变化的事实，比起斯宾塞来，給予了更多的注意，但論旨还是大体相同。"假如有某人想把伟人林肯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加以对照的話，必須記牢：成年的林肯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一个部分(因为正是这些社会力量促使他的产生)，所以必须和他做个对照。""因此，伟大人物乃是时代的产物，反过来也就可以說：是他們的成就影响了那个时代。所以，伟人不會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媒介。"研究的結論是說："所以伟人和他的业績好象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步驟，而那是大部分要决定于其他因素的。"这其間絕沒有留下一些余地可能容許步驟会重新决定进程的方向。一个人走錯了一步，还有可能致于死命。为什么时代的錯誤(或錯誤的步驟)就决定不会对于一种文化的成敗給予絕大的影响呢？

我們試来玩味一下斯宾塞的这一句話。这一句話似乎道出了一个平凡的眞理。但正如社会理論和政治理論上的許多术語一样，其中滲透了一种不自觉的，从而也是足以导致錯誤的类比推論。严格地說，个人是生物界的創制品。至少他必得先是降生下来，然后，他的社会环境或教育才能着手塑造他的个性。我們永远不能把个人从他降生不久之后就已开始获得的个性区分开来，但我們却能够分辨：纵使在相同的或相似的社会环境下，个人之間还是有着种种不同的能力或潛能的。我們都很熟悉：受支配于相似环境条件下的个人，往往会有极不相同的反应。正是那环境的影响，不能总是相似的，就因为个人对于环境会有种种不同的适应。往往两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机会，但是到了后来他們的成就却有着重大的歧异。究竟这个歧异是否由于某种强烈的生物学上的潛能之有无，或者由于某种不属于环境文化的什么〔因素〕之有无——这至少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問題。人类的种种特征有的属于天賦的本性，有的属于获得的文化。这其間的区别的确可以辨識，但是很难分解的。而斯宾塞所用的"創造"或"产生"等等术語則适足以妨碍我們对此做精密的辨識。

虽然斯宾塞所用术語足以导致錯誤，但他已充分地承认历史上的英雄活动問題还須深一步地加以探討。即使承认在伟人能够改造他的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創造"出来，不管这是什么意思，至少已經含蓄着承认：某些人能够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是社会創造出来的，但仅有少数人能够"改造"社会。英雄决定論者向对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超过这点，因为他們所要求的也不过是公平地承认一件事或一个問題罢了。因此，斯宾塞还得做更进一步的努力。他所用以表达要把英雄一脚踢开的言辞却反而說明了英雄是一个必得加以估計的力量——或至少是說明他还沒有解脫掉这一难題。到此为止，斯宾塞告訴我們的話，充其量不过是說：在富兰根斯坦① 的

① Frankenstein 是雪萊夫人所著«Frankenstein»小說里的人物。是一位生理学家，曾亲手制造一个怪物而賦以生命。后来，这个怪物竟至以怨报德，而加害于創造它的这位主人。——譯者

怪物能够杀人以前，必得先由富兰根斯坦亲手把它制造出来。但富兰根斯坦所亲手制造的只是这个怪物，至于后来这个怪物的头脑中怎样活动，却不是他所能創造的。我們若是說："如果怪物杀了富兰根斯坦就等于是富兰根斯坦的自杀。"——这是难以說得通的。

斯宾塞对于生物学的兴趣使他理解到这一点：即伟人和其他人物之所以不同，不能单純地化为社会机会上的不同。但当他面对面地来探討英雄理論时，他却又主张英雄人物仅只是"一长串复杂的因果联系中的一个結果——就是說：頗为复杂的层层因果联系产生了这个英雄人物所属的人种，以及这个人种在其中逐漸成长的社会环境。"根据这一理論（即把英雄人物看做种种因素的結果）斯宾塞又做了进一步的主张：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伟大人物似乎是某一决定性事变的原因，就把这一事变完全归属于这个伟人，我們宁可向那既产生了这一伟人又产生了这一事变的种种复杂条件的集合体当中去寻求那最后的解释（斯宾塞叫作"实在的"解释）。

把斯宾塞的主张化为最簡单的形式就是：不要以伟人来解释他的当时环境，或以当时环境来解释伟人，而宁可以当时以前的世界形势来做为解释伟人和当时环境这两方面的根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說法是頗为天真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世界形势都可以用与之紧相連接的前一时期的世界形势来加以解释。但就科学方法来說，这却不是什么有效的办法。正如威廉·詹姆士所給予斯宾塞的那个犀利的評語：这和用上帝意志来解释事件的发生沒有什么不同。究竟麻雀儿是落下来，还是飞走了，都无妨說是上帝的意志所导致的結果。不管任何时期的历史局势是怎样的，或者有无伟人降生，都无妨把它看做前一时期世界局势的自然結果。

仅就历史的范围而論，斯宾塞是犯了：假定未决問題做为論据的〔邏輯謬誤〕。为了使这問題更加明确，我們把他的见解改作如下：假定用C代表任何英雄人物当时的文化环境，用P代表英雄本身的內在力量或潛力，用 C_1 代表历史上前期的文化环境，用 P_1 代表問題中这位英雄的祖先传袭下来的血統关系。那末，斯宾塞的主张可以

簡化为以下两点判断:(1)关于这位英雄人物的业績或作用的任何問题都属于 C+P 的問題;(2)任何时候,C+P 都可以用 C_1+P_1 来解释。以上第二点判断显然缺乏邏輯根据。因为 C+P 也許是 C_1+P_1+X 的結果。式中的X系指能发生历史影响的任何事件,但既不属于文化上的,也不属于生物学上的各种因素,如火灾、地震、疫病、或其他偶然事件。如果把这些偶然因素統統包括在斯宾塞所謂条件的集合体中,那末,他的见解正中了詹姆士批判的攻击。他的全部主张不过等于說:今日由昨日产生,或者明日是今日发展出来的。在这当儿,斯宾塞不是犯了同語反复就是荒唐背理。

正是在上述的第一点判断上,斯宾塞犯了把未决問題当做論据的邏輯謬誤,因为他全盘否定了个性与文化之間的任何眞正交互影响的可能(即 C 和 P 之間,或 C_1 和 P_1 之間)。在他早先所用的公式里,他曾断言:伟人是当时文化环境所造成的,而且认許伟人也能改造文化。可是在这里却又坚持要把伟人和他的文化环境放在一道,不过不是做为一个尙待分析的問題,而是做为要用早先的情境来加以解释的情境,而对于早先的情境也同样地不加分析。就这样把一个悬而未决的問題放过去了。但这問題是放不过去的。在我們的历史經驗里,它是每次都要露头的。

无疑地,那居于战略地位的伟人們也要受支配于种种压力。在这种种压力之下,他們有时畏縮不前而被压得粉碎;有时則安然穩渡而能够掌握它們。在解释某些发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变时,究竟是那領导人物还是那当时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問題。例如,德国納粹主义疯狂的反犹太运动对于納粹的欺騙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国际性綱領不但沒有帮助反而是个阻碍——那末,这是否要由希特勒本人来負責呢?还是当时德国的历史传統和文化环境逼得希特勒不得不迫害犹太人呢?① 即使我們承认:除非先前已經有了张伯伦、斯托克尔(Stocker)和奥大利人卢格尔(Lueger)等等反犹太的早期"使徒",希特勒是不可能把这种烧杀劫掠的癲狂变成一种国策的。可是为什么单单要把这样犹太人来当作牺牲品呢?

当时的确也还有其他集团，和犹太人一样无辜，而且在政治上更加活动，从而更适于做为这种牺牲品来达到希特勒的狡猾目的。沒有反犹太运动作为陪衬的納粹主义是我們可能想象的，纵使那还是一样的令人厌惡。

納粹信仰的兴起，事实上确可追索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邏輯上那并不意味着：納粹的反犹太运动是由于这些或那些的社会条件而决非由于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心理。德国納粹主义的許多附和者們，起先还把反犹太运动做为一种偶然性或过渡性的事件来祈求加以避免——用他們的話来說，就是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吓人的堂皇大話，以便达到用威力取得有条件的投降而不致引起斗爭。但这些附和者們旣已把賭注押在希特勒身上，并在希特勒当政后都变成了自愿的人质，一旦希特勒表示出来对于犹太人問題的狂妄的不妥协态度，他們也只好乖乖地表示拥护和捍卫反犹太运动。一位忠实的斯宾塞信徒会叫我們相信：希特勒連同反犹太的迫害运动都能从十九世紀的德国文化状况以及从希特勒的世代祖先来加以預測。这个解釋是不正确的，即令正确也是与此不相干的。

假如斯宾塞是在今天写书的話，无疑，他还会在那貪婪的拿破仑和那阴险的腓特烈之外，更以輕藐的笔調来加上一个兽性的希特勒，做为統治人物的另外一个例証来說明他們的生平事迹不足以解释当时的事变进程。这个见解很容易从斯宾塞的“綜合哲学”的“第一原理”中推論出来，却不是从历史事实的批判研究中引导出来的。斯宾塞的这个单純而不加任何限制的主张，用于拿破仑或腓特烈身上固然不正确，而用于希特勒身上也同样地不正确。例如，我們如想理

① 据1942年11月29日紐約时报記載：記者麦克唐納(James G. Macdonald)談：希特勒于1938年春季一次訪問中对記者說：他(希特勒)打算“把反犹太运动做为支配世界的一个手段。”虽然希特勒的反犹太运动是喚醒世界輿論一致起而反对希特勒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別是希特勒希望他們暫时守中立的那些国家是如此。尽管这样，但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加强了对于犹太人的迫害。除了几个原先就是他的同盟国而外，只有那受他軍事力量鎮压的脅从国家才“采納了”他的反犹太运动法令。

解：为什么拿破仑于1812年侵略俄国？（正如他自己后来宣布的，那是他生平最大的錯誤）或是如想理解：为什么他到达維尔那(Vilna)时，竟拒絕接受沙皇亚历山大的和議要求？而这种和議的結果是会把大陆封鎖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加以堵塞起来的。即便拿破仑接受了和議，并且避免了由于侵俄失敗而发生的五百万法国部队的牺牲，欧洲的历史也可能还是一样的。（仅据初步印象而做出来的专题研究可以很容易导致相反的結論。）不过一旦承认了拿破仑的所做所为有可能和历史实录不同（而这正是事情的关鍵之点），那末，再来于事先否认拿破仑下决断的关鍵可能从拿破仑这个坏蛋的个性中来求得解释——便是地地道道的独断主义了。斯宾塞和黑格尔填正要使我們相信的不过是：不問是拿破仑还是其他的历史人物，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可能有和历史不同的活动。这是一种足以导致历史宿命論的傾向。虽然他們还不愿明目张胆地来主张历史宿命論，并且有时也会加以反駁，但这种傾向却的确存在于他們的历史方法論的核心之中。正如一切其他的宿命論一样，那是找不到任何証据来加以支持的。但在与之相反的任何証据面前，竟还有人公然主张它。这种主张之所以不易駁倒，就因为它不冒任何具体預測的危险。它代表着历史研究中形而上学对于經驗方法的胜利。

第五章　社会决定論：正統派馬克思主义

在最近时代里，能够給人以最深刻印象的社会决定論哲学体系，是由正統派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这一派的主要概念包含在恩格斯、普列汉諾夫、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之中。这一派人的理論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忠实于馬克思本人的意旨，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重要。因为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优势的理論传統就是由他們来奠定的。我們的解說和批判，目的并不在于广泛地无所不包，而是要集中地針对着这一派哲学对于历史上英雄活动的問題究竟怎样处理。

正統馬克思主义的主张所以能够給人以深刻印象，由于它具有两个特色，那也就是它所以别于黑格尔派和斯宾塞派的地方。对于后面这两派，进化論学說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理，而且根据所主张的邏輯原則可以由此演繹出社会决定論的理論体系。而馬克思主义者則把决定論的理論建基于历史經驗之上，而且是方方正正地以此为其堅固的理論根据。他們把自己的主张（包括有关伟大人物的作用之种种結論）建筑在細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他們設想这种历史研究足以証实他們的基本假設：經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集团利益的冲突就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他們认为黑格尔是神秘的，斯宾塞是折衷主义的，而只有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科学的和一元論的。

人們很容易这样主张：正統派馬克思主义，渾身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因素，特别是当它乞灵于辯証的必然性和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等等观念的时候，因而其可疑之处正不下于他們所要批判的其他见解。尽

管如此，但它是以大量的經驗材料做为推論基础，而且对于我們理解过去的与现代的历史給予了重大貢献——这一点却是真的。就人类历史的若干时期来說，也确是能够合情合理地为他們的假設找出大量的証据。例如，封建制度的沒落，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各次大战，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二月革命)等等都是。作为一种帮助我們发现和探索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确是有着丰富的果实，即使还显然不够完备。不少权威的历史学家，尽管他們漠不关心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綱領(当其不是和它敌对的时候)，但却采納了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加以种种的修正罢了。

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給人以深刻印象，还由于它的第二特色，就是表面上也承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它既不否认伟大人物的存在，也不否认他們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用这样的語气来应付各方面的批評："当然，伟大人物是有着影响的，不过……"，即似乎是主张这一問題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似的。但使人失望的是他們这一认許却和他們的基本理論互相抵触——这一点下文还要說明。当他們对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业績給予适当的注意时，——例如对于他們自己的英雄人物如馬克思、列宁等——他們的历史一元論就宣告破产了。当他們把亚历山大、愷撒、克伦威尔、大彼得、拿破仑等等人物的历史活动解释做"社会压力的聚合点"的表现，或仅仅做为阶級利益的"工具"时，他們便往往放弃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而代之以神秘的先驗主义了，那是他們从黑格尔那儿继承下来的一部分遺产。

既然恩格斯的著作是正統派馬克思主义当中这一論題的泉源，我們就先来討論他的见解吧。而馬恩的后继者当中，沒有哪一位曾把这一学說加以发展以便給它增添若干新的內容或新的側重点，除了普列汉諾夫和托洛茨基可以算是例外。他二人对于他們这一派理論的虔誠虽然絲毫不减于其他諸人，但对于批評者所提出的辯难却比和他們并肩作战的同志們更为敏感。关于普列汉諾夫的貢献，我們将在討論了恩格斯的见解之后，再来加以討論；而有关托洛茨基的貢献，则让給后面一章。

依照恩格斯的看法，历史領域为一种必然性所支配，而这种必然性要通过人們日常經驗中的大群偶然事件才能表现得出来。这种必然性，在根底上是一种經济必然性——而那是統治着整个宇宙的辯証必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历史既然受支配于一种經济必然性，而人类行为可能和它順应，也可能和它相反；假如和它相反，那就注定了要失敗，只有和它相順应时才能发生作用。社会經济的发展既以生产力的不断膨胀为其发动的泉源，它的进程是不会那么平滑的。而是要在两个矛盾面的对立和冲突当中向前发展：一面是生产力，另一面就是成为它的桎梏的生产关系（或者叫做所有权的基本法律形式）。

既然創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毫无血肉的抽象体，因而拦在生产力之前而阻其继續膨胀的种种障碍也得由人来把它加以清除。这种清除工作越艰巨，則經驗中感觉出来的变革的需要也就越大；变革的需要越大，則为了領导革命斗爭而必然出现的人物也就越发显得伟大。思想方面的伟大人物，任务在于替人們筹画种种精神准备以便发动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虽然这种变革事实上已在进行，一般人还无从知晓。行动方面的伟大人物，任务在于組織阶級斗爭，这些阶級由于革命的发生，有的获得利益，有的遭受損失。究竟誰是这个伟大人物，我們无从知晓；但如果为时势所需，則他迟早会要产生却是肯定不移的。他的特殊思想和行动怎样，我們也无法說明。但不管怎样，而其結果必将有助于生产力的解放，并且为它准备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即各种社会关系的組成体）以应社会的需要，——这点却完全可以保証。用恩格斯自己的話来說，就是：

>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間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純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們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間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战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軍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

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証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愷撒、奥古斯特、克伦威尔等等。（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①

这个論点显然带有种种困难，却竟能在那些以忠实于科学方法自豪的人們中間取得广泛的认可，这一点是难以解释的。恩格斯告訴我們：伟大人物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必然产生的，但我們究竟怎样知道社会对他确是有着一种需要呢？当然不会是在事变之后才知道的！因为那样就要陷于循环論証。而如果是在这个伟大人物出现以前，我們就能够认識到社会对他的需要，那末，就无妨說：面临着战争、革命、阶級斗争以及重大的社会問題的历史，对于伟人的需要总是会存在的——这样說决非言过其实。但我們究竟要到哪里去寻找他們呢？根据恩格斯的假設：伟大人物必然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那末，应該說他老是存在着。历史仍然属于經济必然性的领域，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却又总得通过伟大人物。可是恩格斯却又认为：在历史舞台上，伟大人物的鞠躬送迎（譯者按即出现意）仅仅是百年一遇的事。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需要不仅是伟大人物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个充分条件。但他究竟怎样知道的：每当一个巨大而急切的社会需要存在时，便一定会有一个伟大人物出面来应付它？是誰和什么保証了这个幸运的事件？不是奥古斯丁和波緒亚的上天保佑，不是黑格尔的狡猾的理性，也不是斯宾塞的不可知者，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的矛盾作用。"

这种动力确乎是以一种非常引人注意的方式来发生作用的。但人們却不免怀疑：某个伟大人物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他适逢其会地能够成就其伟大的，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因果联系引导到他的〔父母双方〕的精虫和卵子結合在一起而使之产生出来的呢？假使一个伟大

---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8頁。——譯者

人物既已降生，而又不幸夭亡，那末，在經济生产上又須得有什么样的辯証程式好給他找到一个替身呢？在找到了替身以前又需要耽擱多久呢？而在还沒找到以前，那急切的社会需要和历史危机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是否会采取殷勤恳切的态度来迎接这位替身的降临呢？恩格斯一方面在說.經济矛盾的解决，那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另一方面又說：精虫和卵子的結合，那是历史上的偶然。那末，历史上的必然又是怎样把它自己轉变成为生物学領域內的必然呢？也許有人会完全采取哈姆雷特向他父亲的阴魂呼喊的口吻說："你干得眞好，玄妙的老鼹鼠！你在土里能够干得这么快嗎？你眞是一个了不起的开路者！"或者还是恩格斯相信不管任何人都能够起来代替愷撒、奥古斯特和克伦威尔呢？

我們不妨选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来把恩格斯的論点加以考驗，并用具体的辞句来回答这些問題。假如我們这样提出来問：〔在那反法西斯战爭发动的前夕〕为什么不曾降生一个伟大人物好来迎合时势的迫切需要把德国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一个統一战綫呢？因为有了这个統一战綫，就能阻止希特勒的掌握政权（除非他不惜发动一个激烈而长期的內战），而且在某种条件下，也許就能解决当时的經济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經济困难，希特勒才得以把他的那班附和者和追随者号召起来的。誰能否认当时确有这种时势需要呢？誰又能否认当时在应付这种需要上的失败呢？哪怕能找到一个替代的人也好！可是当时这样的人物竟然沒有降生，这是否說明：时势无此需要？抑或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答案是肯定前者，那末，为什么又会失敗？如果答案是肯定后者，那末，为什么又来反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呢？即使是现在那些断定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为不可避免的人，也还不得不承认：在許多不可避免的理由当中，确有一个乃是：当时沒有一位足够伟大的領袖人物起而动員千百万人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誠然，根据恩格斯的理論，只要稍加弯曲，我們便不难把希特勒描繪成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并說他就是由于辯証法的必然性而降生，以便起而应付时势需要的。对于这样一个結論，

恩格斯将只有大吃一惊。但是，除非他情愿放弃他自己的論点，是很难拒絕用以导致这个結論的方法的。

威廉·詹姆士在1880年他所写的著作中以嘲笑口吻质問斯宾塞說：假如莎士比亚不是于1564年4月26日降生在亚馮河边的斯特拉得福，那末是否相信：社会的和經济的各种力量綜錯聚合的結果将会使他降生他处？还有，假如莎士比亚不幸幼年夭折，是否一定会有另外一位母亲在同时降生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物？他并且揶揄地继續追問下去：还是会在波卫附近的斯特拉得福降生一个替身？十四年以后，恩格斯对于拿破仑以及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同样問題上都做了肯定的答复。自然，在原則上，对于莎士比亚的問題，他也只有做肯定答复。他所坚持的唯一斟酌，只是这一替身可能較好或較坏，但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复制品。

最后，再提一句，我們就可以让恩格斯去悬在关于他的論点的这个"归謬法"上搖来摆去了。假如我們把所謂"社会需要"給予比較狭义的定义，那末，就很难說它真会在一切历史时期都必然存在。这样，我們也就很有理由来怀疑：是否某个伟大人物的降生，都会有一种社会需要为其必不可少的先兆？当底比斯和其他城市被亚历山大蹂躪得几乎成为废墟时，这些城市的居民并不是一看到亚历山大在城外出现，就会意識到什么社会需要。群众們很可能会感觉到他們的某种社会需要不是为英雄人物所滿足，反而是为他所破坏。他們也許是需要和平与社会主义，而他給他們的却是战争与独裁——尽管那是以他們的某种"更深刻"需要为借口。他們也許是需要长寿百岁和幸福生活，而他偏偏要把他們一群群送入天堂——据說是为了拯救他們的灵魂。而当某种社会需要为一位卓絕領袖人物的行动所迎合时，难道这种社会需要就不会是这位領袖人物自己的早年业績所一手造成的嗎？〔解鈴还是系鈴人〕，也許要一个英雄人物起而解除他自己早年的恶作剧呢！

*　　　*　　　*

普列汉諾夫是他那一輩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之中最有光輝成就

的哲学界智多星，这是这一派左右两翼的領袖人物——列宁和考茨基双方一致贈送給他的尊号。普列汉諾夫在他的許多著作当中討論了历史上英雄人物問題。对于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来說，这是一个非常尖銳的問題，而普列汉諾夫則是他們之中被公认的理論家首脑。說这个問題是尖銳的，这不仅是作为一个理論問題来說，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实践的或政治的問題来說的。俄国民粹派的政治綱領和哲学即以下面这种见解为其确定不移的基础：即历史能够受到伟大人物的影响，并且不問他是言論上的首倡者也好，或是业績上的首創者也好，它的影响意义都非常重大。（业績方面的人物影响更大）这个集团和它的公认继承者，即社会革命党排斥馬克思主义有关决定論和社会进化論的见解。他們固然不否认物质因素（包括社会的和經济的）的影响，但却更加重視历史上人格的和道德的因素的决定作用。他們反对那种断然否定把个人恐怖作为抵抗压迫的一种策略的主张。他們要让居于战略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上的灾祸和政治上的过激行为負責，而不是让产生个人的"制度"来負責。所以，不論是根据实践上或理論上的理由，普列汉諾夫总是和他們立于敌对地位。有关这一問題他所写的知名著作就是：《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①

在討論过程当中，普列汉諾夫不仅排斥英雄史观一派的见解，而且也排斥那些决定論者的见解。他們和前一派正相反，而宣称个人是历史上不妨等閑視之的因素。普列汉諾夫认为双方都遺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問題，其为重大不仅是就馬克思主义来說，而且也是就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說。普列汉諾夫把他的学說作为一种"綜合"而提出来，认为它是綜合了以上两个单純而矛盾的见解中的眞理。他并且暗示：只有这种綜合才是对于历史上个人作用的問題做了一个圓滿而明确的解答。而这是基佐、米涅、梯耶里、莫諾(Monod)和兰浦瑞哈(Lamprecht)等等一切决定論者都无法解答的。他采用了圣

①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36—375頁。

貝夫(St. Beuve)的若干論点来陪衬他的論辯——圣貝夫相信：在任何假定的时間，一个伟大人物意志上突然的决断会把历史进程重新加以决定。

我們将采用一系列的实例来检驗一下普列汉諾夫的論点是否正确和前后一貫。而且为了使得問題的爭点更形尖銳，我們就照样采用了他所用的那一套实例。

1. 彭帕杜尔夫人(Pompadour)对于路易十五的影响是十分深重的。在七年战爭时期，和奥国結成生死同盟也似乎是这位夫人的业績。这次战爭中，法国的将軍們，尤其是苏俾兹(Soubise)屡次向她表示对于胜仗毫无把握，但彭帕杜尔夫人却一定要宠信他，以致給法国造成了悲慘結局。假如她不向大陆方向发动徒劳无益的战爭，法国也許还能保持她的殖民地而不会受到英国的侵犯。她为了个人的感情而向馬丽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献媚，与奥国結成生死同盟，共其命运，因而不能发动一切力量来保卫法兰西帝国的主权。战爭的失敗以及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对于法国后来的經济发展有着明确而重大的影响——这是普列汉諾夫所承认的。

2. 在同一战爭时期，奥、俄两国的軍队曾于斯垂根(Striegan)附近围困了腓特烈二世。当时，腓特烈的处境十分危急，只要对方輕易发动一次攻击，就会把他消灭。但由于俄国将軍布图林(Buturlin)失誤了戎机，随后又撤退了他所統率的部队，才使得腓特烈二世得以侥幸逃生。并且由于依利薩伯女皇的逝世，几个月以后，腓特烈得以挽回了他的命运。关于这个偶然事件，普列汉諾夫說：“但实际上我們却很可断言，只是由于布图林的优柔寡断才使腓特烈二世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当时被任为俄軍总司令的不是布图林而是苏沃洛夫，那末，普魯士的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而事实上俄軍統帅正是布图林而不是苏沃洛夫那样的人——这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他这样认为)。他承认七年战爭中的种种偶然事件对于此后普魯士的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他也断言：如果是在普魯士史上的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影响将会完全两样。

3. 在法国革命时期，如果早亡的不是弥拉波（Mirabeau）而是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那末，当时的局势又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弥拉波果眞不曾早亡，则立宪君主党掌握政权的时間可能更长些。但即便他还在人世，那也决抵抗不了共和主义的狂风巨浪。假如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被杀的話，他的地位将为另一个人所代替。究竟这个代替者是好是坏，是长是短，我們无法預言。不过我們不妨說（普列汉諾夫向我們保証）："事变进程将和罗伯斯庇尔在世时一模一样。"关于拿破仑也是如此。如果他被人打了一枪，就象他在都伦（Toulon）被围困时几乎遭到的命运，或者因得了坏血病而死亡，或者是象他于1795年在巴黎曾經打算过的，竟然自杀身死——不管怎样，"法兰西共和国毕竟还是会在当时各次战役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歐洲其他各国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即使当时沒有拿破仑，雾月18日政变的种种結果还是会发生出来的。如果不是拿破仑把他自己提名出来毅然佩带西哀耶斯（Siéyès）长老所鑄的那柄用以鎮压法国革命的"宝劍"，老天爷也会降生无数的別位将軍来揮舞它。

普列汉諾夫在說明历史时，所举例証的一些細节，乃至他的历史判断是否正确，对于我們来說，都只有次等兴趣。而他所用的方法和論辯方式对于我們品評社会决定論的門道，則有着头等的重大意义。我們試来进一步考察他怎样处理問題中的历史偶然性。

1. 普列汉諾夫确凿地告訴我們：眞正說起来路易十五朝代中法国軍队的失敗不应归罪于那位狐媚的彭帕杜尔夫人。失敗老早已然决定于以下种种軍事因素：如軍队质量的悪化、軍紀的废弛、将領的靠不住，而这些都来自那沒落的貴族政治的残余作风：只顾享乐而不图事功。即便沒有彭帕杜尔夫人，仅仅这些一般因素已經足够导致一场敗仗。至于这位馳名的貴妇人玩弄嬖幸，并把不能胜任的苏俾兹将軍置于統帅地位，那不过使得敗坏的局势更加敗坏罢了，不論是她还是另外一个人，都无法来挽救的。

所有这些已經足够簡单明白，而普列汉諾夫却还要强調：彭帕杜

尔夫人并非以她自己的权势和名义来統治当时的法国王朝，而是要通过那位順从她的意志的国王。但这位国王的性格显然不是必然地追随着当时法国經济发展的一般进程。即使是在同样的經济社会和历史局势之下，也很可能出现一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国王，例如，是一个居家人，有妻室之累者，或者是一个女性憎恶者。不管是哪样吧，反正彭帕杜尔夫人都不再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即使她仍然置身于当时法国宫廷的話。普列汉諾夫的結論是說：假如我們承认有可能出现一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国王；那末，由此推論，"这些暧昧的生理学上的因素"（即指导致一位好色的君主之降生，而不是一位心地純洁或性欲比較淡薄的君主之降生的种种生理因素）"通过影响七年战爭的进展和結果，也就从而能够影响到此后法国的发展前途。假如不是由于七年战爭的結果夺去了她的大量殖民地，那是会完全不同的。"①

这也还是足够簡单明白的，但却和上面所引他的論点刚刚相反。一个突然的大轉弯，前面列举的軍事因素已經不够当做战爭失败的充足理由了。这些因素也許完全都还存在，而只要允許另一对配偶之子的降生，那末便能轉败为胜，打败英国，保持了殖民地，并使以后的法国发展形势整个儿改观。〔我們由这些議論中所嗅到的〕，与其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气味，不如說是伍德的气味更浓厚些。在这里，普列汉諾夫也深深知道有些什么是須得加以解释的。他继續說道："試問这个結論是否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相抵触呢？不，絲毫也不相抵触。个人的特性在上述场合发生过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这种作用只有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之下才能发生，也同样是沒有疑問的。"②

若是和普列汉諾夫（也包括其他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在内）原来想要加以論証的那种自命不凡的議論比較起来，这够多么垮台！当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58頁改譯。——譯者

② 同上书，第358—359頁。

然，任何一系列个人的特性或个人的怪癖，只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发生那样的作用。如果换了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个人特性，以上所說是同样的正确。而他們的作用也同样要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它們的作用和路易十五的个性所发生的作用究竟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在一个段落里，普列汉諾夫告訴我們說：作用相同。在另外一个段落里，他却又說：作用不相同。而在第三个段落里，他又用下面的話来把其間的矛盾加以調和：不管是作用相同还是不相同，反正个人所发生的作用总得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

如果普列汉諾夫是主张：彭帕杜尔夫人的影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是頗为自然的，也許他的理由反倒更加充足些。因为彭帕杜尔幷非路易十五的头一位或末一位得宠的情妇，而路易十五也不是法国历史上喜欢宠信情妇让她得以掌握朝政的头一代或末一代国王。勿宁可說这种国王的情妇当政是从查理九世以来法国宫廷中一种頗为长久的制度。而法国資产阶級也决不会憎恨这种在他們自己圈子里幷不陌生的制度。他們之所以反对仅仅是由于豢养着大群的嬖幸以及他們的远近亲属会增加租稅負担，尤其痛恨的是那班敢于干涉国家行政的任何嬖幸人物。我們只要看一看：彭帕杜尔夫人是怎样受她亲生母波亚孙夫人(Poisson)(她确乎是資产阶級出身)的鼓励，从幼年时代就已自认为国王将来的情妇——这一事实足够証明国王和他的嬖幸之間的关系是多么自然。由于她生得貌美，所以在她家族范围內，公开給她起了一个綽号叫作 un morceau du roi ——意思就是："国王的口中食"，或"国王的一块肉"①。但所有这些不过足以說明：路易十五可能受到掌权人情妇的影响，而不一定就是受到彭帕杜尔夫人的影响。也不一定要順着这位貴妇人爱好的方向而受其影响——她的爱好，就其身份来看，勿宁是非常聪明的。②

普列汉諾夫所犯的方法論上的錯誤是重大的，而且也普遍影响到其他派系的历史哲学。但不管是普列汉諾夫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好，都无法做这样象似有理的詭辯：就是說复杂的社会条件必然导致某人的种种特性的出现，而这些特性正是人們认为

足以“影响法国此后历史发展的”。充其量，人們所能主张的不过是某些个人的特性不可能影响到社会条件，而社会条件翻过来却可能阻碍或禁止历史上风云人物若干特性的发展。例如，一个白痴儿童不可能变成一个統治者，一个有着严重精神病的将軍不可能受到統率三軍的付托，一个好战的无神論者决不会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总理，一个过于老实的人不可能获得一个外交官的地位，因为这个地位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善能纵横捭闔的塔力兰(Tallayrand)。尽管这样，統治者、政治家、外交家和革命領袖們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全然不同的特性。而这些特性的不同組合就很可能对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发生大不相同的历史影响。

普列汉諾夫的論点，就譬如是說：小麦和毒菌所以和石头不同，是因为二者都能对于人身有机体发生影响，使它产生种种生理上的情况。話是很对的，因为并非任何东西都能影响人的身体。但在那些能影响到人身的东西当中，却有的給予它以营养，有的足以致其死命。同样，并非各种类型的个人都能影响当时的社会条件，而那些事实上发生影响的，必須是能够迎合这些社会条件的。但只要一旦承认个人能够影响历史发展，便不能再否认：在某些时候，不同的个人，通过他們的行动和思想上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发展。一个现代的阿甲克斯（Ajax）会被放在一个馬戏团里独占一个棚舍当作余兴来供人观賞；一位冉达克（John of Arc），处在如今的科学昌明时代，当她闖入了总司令部里，造謠說什么听到了一些声音的話，会

---

① 参看：《彭帕杜尔夫人侍从女官奥塞夫人回忆录》符舍特英譯本，1928年伦敦版，第8頁。

② 普列汉諾夫对于这位夫人全然沒有給予公正的品評。在她的血統关系中，她要算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假如不是象她那样聪明的話，对于国家大事也許会干涉得更少些。她除了裁决外交政策之外，还掌握大臣和将軍們的任免权。她解散了耶穌会，并把該会会員全部放逐国外——这是她唯一得人心的作为。創办了塞佛的瓷器工厂和軍事学校（后来拿破仑即在該校受訓）。援助和保获了伏尔泰、孟德斯鳩、克莱比雍、揆內（她的私人医师）、狄德罗以及其他类似的天才人物。

被送入精神病人收容所来接受检查。他們都不会对事变发生什么影响。但是，依照普列汉諾夫自已的說明和认許，如果以苏沃洛夫代替布图林，以路易十八代替路易十五，以一位对于外交政策更加聪明，而不象彭帕杜尔夫人那样阴险可怕的妇人来代替彭帕杜尔夫人，則法兰西帝国的历史进程是会受到影响的①。

2.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耍的花招是当他最后重新陷入正統派的道路之前，先拿一种完全不同于恩格斯和其他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理論来加以敷衍。他并沒有肯定創造英雄的是他們所处的时势，也沒有預言社会需要会使伟人产生。他并且不否认伟大人物，或甚至渺小人物都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他只是主张个人所能导致的变化，这变化发生的时間、地点和范围将决定于当时的經济条件以及由于这些經济条件而产生出来的阶級利益的交互作用。对于这样的主张，除了那神秘的极端主义者象卡莱尔之外，是不会有人加以反对的。不过許多的历史学家将会对于伟大人物的活动自由加以种种补充的限制罢了。假如普列汉諾夫是完全自觉而不是試图論証他的主张和經济决定論的教条完全符合的話，他的独立思考是值得我們称贊的。就因为这种教条堅持否认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会有任何眞正选擇的余地，并且以具有充分理由的姿态来强調：个人在任何时間都不能成为决定取舍的关鍵。

在討論腓特烈二世的命运时，普列汉諾夫又采用了一般的分析方法。是布图林挽救了腓特烈，免致他掉脑袋。要是苏沃洛夫就会把他消灭。但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要取决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經济条件。尽管如此，他却又明白承认：如果三軍統帅不是布图林而是以苏沃洛夫来代替他，普魯士的历史是会完全不同的。事实上的三軍統帅

① 须知我們这里所討論的并非普列汉諾夫的例証是否合乎历史事实，而仅仅是他所用的方法。彭帕杜尔夫人对于法国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許不如普列汉諾夫所信的那么大。但就他的思想的这一面而論，他必然相信：她是所謂一个反面的女英雄，而不仅仅是另外一位美丽、有头脑和具有野心的女人而已。

正是布图林而不是苏沃洛夫——这是一件偶然的事。因而，“由此推論，有时国家命运也会决定于偶然事件，我們无妨把它叫做次等的偶然事件”。① 作为一个正統派的馬克思主义者竟然說出这样的話，眞是勇敢极了！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并非沒有原因——普列汉諾夫也有看到这一点的功劳。正如庫尔諾(Cournot)老早指点出来的：这乃是两个系列或甚至更多于两个系列的事件綜錯变化的交叉点，而这些事件则又各自决定于本身的原因。从决定任何(或所有)系列事件的各种规律上来看，也无从預测出这个交叉点的所在。显然，誰要是严肃地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誰就不是一个一元論者。但正統派馬克思主义却正是一元論的。因此，我們倒要看看普列汉諾夫究竟怎样摆脫这个矛盾——就是說怎样調和他所尊奉的理論教条和他对于历史的經驗研究之間的这个矛盾。

他在这里采用了移换問題的方法。偶然事件是要作数的——不管就表面上来說也好，还是就根底上来說也好。尽管如此，恩格斯所了解的历史决定論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就为了偶然事件絲毫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研究。我們姑且承认这一点，但人們却不免怀疑：这些偶然事件的不可預测是否在某些方面絲毫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即使我們承认了以上这一点，那又怎样来处理各种不同的历史理論之間的爭执呢？因为，偶然事件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这一点乃是任何一派历史理論的共同假設。而大家爭执的問題却是：在英雄决定論、历史唯物主义、气候条件变化論(亨丁頓〔Huntington〕)、心理决定論(麦克杜加尔〔McDougall〕、塔尔德〔Tarde〕、弗洛伊德〔Freud〕)等等的理論之間，究竟哪一派理論所設定的假設最能把有关社会和历史的现有知識加以一貫的系統化，并且最有把握来預测将来的历史事变的发展进程？或者，换句話說，姑且承认：历史領域是为种种规律所支配；那末，究竟是哪一种规律，或哪几种规律的組合使我們能够准确地(也就是說，能够达到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1頁改譯。——譯者

我們的研究主題所需要的那种准确程度)預測历史的发展进程呢?普列汉諾夫在这里相信他自己已經辯明了正統派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举出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做为有力的証据。但科学解释的可能是探求一切因果律以及任何規律的〔共同〕綱領。这綱領对于各种矛盾的科学解释应該采取中立态度，而各种科学解释則无不順从于証据的控制。

3. 如果說正統派馬克思主义理論体系的优点是：在一位天才(例如普列汉諾夫这样的人)的手里，便于用新的观点来反复思考历史資料；那末，它的缺点就是：把自己加以封鎖，拒絕对遺漏了的因素加以适当枯价。正当我們想贊扬普列汉諾夫的革新精神，說他愿意接受証据的指导时，他却再一次地堕落到經济一元論的泥潭中去了。而这正是他在他的专題研究的討論当中曾加以全面駁斥的。他堕落的理由是因为錯把一种陈旧的方法論上的謬誤当作了正确的邏輯原理。而这种謬誤是在任何一派独断一元論者的著作当中随时可以发现的。

普列汉諾夫指出：当时，彭帕杜尔夫人的罪悪影响，受到各方面的反对，但輿論力量却不足以制服她。当时的法国社会不能执行对她的罪状的宣判。为什么？就因为法国的社会組織形式使得国君不受监督，不象英国那样，錢袋口儿經常勒得紧紧的，就連皇室也无法插手。但为什么正是这种組織形式存在于当时的法国呢？这就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間的对比关系把它加以决定的。因而，他的結論是："由此可见，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癖性竟能对法国命运发生出这样一种悲惨影响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話似乎都足够有理，但須是在下面这个問題沒有提出来以前：为什么当时的法国，正好存在着那样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呢？是什么来决定的呢？而决定它的原因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們既然要分析到最后，又为什么停止在这里呢？显然，这个提問題的办法将会引出一連串无限多的和关系愈来愈疏远的問題。而普列汉諾夫的做法却是要武断地停止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上。到了

这里，他就不再向下追問了。但是各种社会力量对此关系却和彭帕杜尔夫人所以发生作用的的特殊原因和結果——这一特殊問題幷沒有什么确定不移的关系。可能有人要这样提出来問：难道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絕对沒有什么办法来消灭这位彭帕杜尔夫人嗎？譬如說利用那种幷不陌生的暗杀手段。或者适逢其会地出现了这样一个才貌适足和她爭宠的海妖；这个海妖只是迷戀閨閣生活而不喜过問政治。①

但所有这些，若和普列汉諾夫的論辯所根据的主要假設来比較一下，就都显得是些瑣屑細节了。

他的主要假設乃是：一个事变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是这一事变本身的原因。把这話說得更加具体些就是：因为經济生产方式是社会組織形式所以存在的原因，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組織形式乃是无法制止宮廷宠幸干涉國家大事的原因，而这一点又是彭帕杜尔夫人所以敢于拒絕听从輿論的原因，而輿論的失效又是法国的历史所以发生悲慘結果的原因。从而，按照普列汉諾夫的邏輯，經济生产方式乃是彭帕杜尔夫人給法国的历史造成了悲慘結局的原因。

普列汉諾夫的这个假設所以謬誤就因为他把最多只能看作这一事变的必要条件解释成这一事变的充分原因。当然，法国社会必得首先存在，然后任何一个人才有可能对它发生影响。当然，在某一个瞬間，法国社会的情况也必得正如它当时的面貌，然后，在次一个瞬間，任何一个人才可能对它发生事实上确曾发生的特殊作用。但决

① 这两种办法似乎都不很困难。奧塞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叙述了彭帕杜尔夫人屢次遇刺的經过。她并且叙述了这位情妇怎样向一位知己女友勃兰卡夫人(madame de Brancos)坦白自己心情的奇聞。当时这位女友正在关于食物問題上給予她一些忠告。彭帕杜尔夫人說："我常常因为担心不能得到和穩住國王的欢心而苦惱。你应該知道，男人是喜欢某些事儿的；但不幸我的性情却是非常冷淡。我的意思是想采用某些刺激性的食物，好来补救我的这个缺点。而最近两天，这剂特效药确曾对我有些好处，至少我认为它是有些好处的。"引自《彭帕杜尔夫人侍从女官奧塞夫人回忆录》符客特英譯本1928年伦敦版第52頁。至于上文所說刺激性食品乃是"加配三种香草精，并調以龙脑、松露和蒲蒿等等香料的巧克力。"

不能由此推論：因为法国社会的存在和它所具有的那个情况，任何一个特殊人物必然会对它发生作用；或者是說：因为法国有着某种社会組織形式，事实上，对它发生作用的那个人物必然是好是坏，是有能为是愚蠢。普列汉諾夫的錯誤就是以下面这两个关键性的語句为其焦点："为什么当时法国的命运竟会操在这样一个既无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也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的妇人之手？这就因为当时法国社会的組織形式正是如此。"① 这个"因为"完全缺乏邏輯根据。

普列汉諾夫的假設之所以謬誤还因为他忽略了他自己先前承认过的一件事，就是：在他所設定的因果系列当中，那最后一个事件，如果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因果系列之中的某一事件来加以解释可能要更适当些。举个例子，就如：約翰斯密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母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曾祖父母——这些因果关系都是单就生物学的范圍来說的。但約翰斯密被选充当某項官吏却应該归之于另外的一个因果系列（社会的因果系列）。而他和市府女秘书的私奔，那更加应該归之于其他的因果系列。现在，除非他的曾祖父母曾經存在的話，他是不可能降生的。但絕不可因此就把他所以降生的原因完全归于他曾祖父母的身上，即便他的生物学上的若干性格可以追索到他的曾祖父母来加以解释。除非他降生，他是不可能当选为官吏的，但他之所以当选还应从选举运动当中的政治原因来加以更适当的解释。除非他当选充任官吏，他不可能和那个市府女秘书相遇，但他俩的私奔却应該从他俩相遇以后的許多情况来加以圓滿的解释。普列汉諾夫則坚持要把他的曾祖父母，不仅作为他降生的原因，而且也作为他当选和他俩私奔的原因。

最后，普列汉諾夫的假設之所以謬誤还由于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說有那么一种"归根到底"或"根本的原因"——那是永远适当的，因而也是和任何特殊問題或上下文意全无連带关系的。普列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0頁改譯。——譯者

汉諾夫旣然相信"生产力的发展〔乃是〕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和最一般的原因，因而他觉得自己不得不用一种具体方式来表明：这个根本原因用来說明他勉力要想解释的問題本来就是非常适当的。但由于他意識到自己是一个經驗派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就不得不承认一个事件的切近的和决定的原因很可能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风馬牛不相及的。可是他又必得忠实于他那一套形而上学的教条，因而逼得他只好把正在研究当中的主題加以偸换，为的是想方設法来显示出引用这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等等概念的似乎有理。因此，他就宣布：这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乃是研究主題的"根本原因。"

这里用不着再来詳細叙述普列汉諾夫在处理拿破仑問題时是怎样离开本題和彷徨不定，因为这和刚才所举的例子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普列汉諾夫向我們担保說，拿破仑在战场上所成就的战績是其他的将軍們也能赢得的。也許是这样吧。但这却很难抹煞以下的事实証据：即只要拿破仑每次把兵权付托給其他的統帅时，法国軍队几乎总逃不了战敗或調动不灵的命运。即就那次由莫斯科退却的經过来說，当时从維尔那(Vilna)行軍不过两日的路程，而拿破仑竟錯把他的軍队交給了繆拉(Murat)和貝尔底埃(Berthier)，因此才造成了几乎全軍复沒的慘敗。普列汉諾夫为了不把他自己牵連到这些瑣事中去，因而就假装对于拿破仑各次战役的純軍事結果不感兴趣。他告訴我們說：即使沒有拿破仑的話，欧洲的历史本质上还会是相同的，因为生产力的不可制止的发展是从封建制度的桎梏当中爆发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法国軍队的胜敗，就它們对于法国社会生活和經济生活的影响来說，是比較地无关輕重的。

但这个含义却是无法加以証实的。普列汉諾夫自己也承认：随着法国的胜利入侵大陆而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对于法国此后的发展給予了相当大的影响。假如波旁王室和教会，在霧月18日政变之后很快就恢复的話，一定不会輕易接受那些社会变革和财产沒收等措施，而这些措施經过了一世代的执行已經取得了普遍的承认，到了路易十八恢复王位时，就已經习以为常了。試举拿破仑对于法国的

社会生活和經济生活給予影响的一个方面来說，即使是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的继承法曾經发生过非常大的作用。当时，长子继承法的废除以及对于遺嘱处置財产自由的限制，使得小农所有制迅速发展以至很快地普及于全法国，并使得农业人口对于此后法国的生活情况給予了压倒优势的影响。人們往往引証这件事作为法律和政治对于經济发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例。我們沒有理由来假設波旁王朝統治的提早复辟会导致采用一种精神实质上与拿破仑法典相类似的法典。但是，拿破仑法典連同法国革命的其他成就，只是經过了法国軍队的胜利以后，才对欧洲发生影响的。

因此，我們无妨假定：就問題中的历史时期来說，为了容許欧洲的生产力取得一次自由膨胀的机会，法国的軍事胜利是个必要条件。那末，这一軍事胜利是否不可避免的呢？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凭借什么力量呢？是否凭借法国生产力先前的发展情况呢？还是凭借拿破仑的軍事天才呢？普列汉諾夫沒有胆量来肯定前者。（譯者按：即指肯定凭借法国生产力先前的发展情况而取得軍事胜利。）但假如他的經济一元論前后一貫的話，他势必做这样的肯定才行。他的論点可以还原为以下的这个信念：法国的軍事胜利对于她此后的經济发展虽然是必要的，但拿破仑的軍事天才并不是法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那末，法国軍队所以幸而造成那光荣的胜利紀录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依照普列汉諾夫自己的話："法兰西共和国毕竟还是会在当时各次战爭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欧洲其他各国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① 我們試来注意两件事：第一，普列汉諾夫的解释还是軍事的，他并沒有主张法国士兵品质优良是法国生产力情况不可避免的結果。第二，这个同一无比优越的法国部队，当它的統帅是拿破仑时，就能够取得胜利，而每当統帅换了其他将領时，就一定会吃敗仗。足见当时各国軍事权威所以一致評判拿破仑是现

①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4頁。

代史上最大的軍事天才，这一点确有事实根据，决不仅是一种传說而已。

不管事实上我們对于拿破仑能够給予什么贊語，但普列汉諾夫却还是堅决相信：正如一切有天才的人一样，拿破仑也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天才的人物只能够影响到特殊事件的个别情况，但决不能影响事变的一般趋势，因为連“他們本身也还是这个一般趋势的产物。”这一点不仅就政治、战爭以及社会关系来說，即就艺术、科学以及文学来說也是眞的。因此，他下結論說：“即便在这里，归根到底，一切〔！〕都还是决定于社会发展进程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①

普列汉諾夫是从教条到教条——由始至終地画了一个大圓圈——尽管此外他还以这个大圓圈的圓周为中軸，画了无数繞之而轉的小圓圈。

* * *

尽管社会决定論有着种种的缺点，但却給我們这个时代的种种思想类型留下了一笔永久的財产。在我們继續向下討論之前，必須对这笔財产来加以适当評价。显然，只要学术研究还是自由的，而并非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話，那末，簡单地把英雄人物贊頌为时势的創造者，早已不能再在今天这个时代占据任何学术上的地位。我們永远得把英雄人物联系到他的时代和他的种种問題上来加以考虑。但是否所有这些都得归功于社会决定論呢？还是，假如把它的种种极端說法加以淨化的話，則社会决定論的这笔財产将会是更加丰富而有用的呢？

---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9頁改譯。——譯者

第六章　英雄活动的框架

我們試来回顾一下社会决定論者的种种主张。凡是社会决定論者，不問属于唯心主义的，或者属于唯物主义的，似乎都曾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概括：即一位伟人，除非到了时机成熟时，决不能影响历史。这和他們起初所要捍卫的論題比較起来，已离得很远了。因为，正如同成熟的果实，有的可能为园丁摘取，有的可能任其在枝上枯萎，时机的成熟也是一样，或者是白白地消磨掉而无所收获，或者可以被一位风云人物来加以利用。这些道理，就連卡莱尔也許都会同意，只不过他还要固执他的看法：今天时机的成熟乃是昨天的英雄人物活动的結果。

也許讀者們会私下議論道：这是把一个傲慢自大的主张降格为一种老生常談罢了。但当我們体会到这說法的涵意不仅要对英雄人物的活动加以明确限制，那末，就会明白这决不全是老生常談。它还提醒我們：为什么这些人物的活动能够迎合种种成熟条件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假如我們把它和卡莱尔的其他见解对比一下，就会更加清楚了。

就卡莱尔的一些語气来說，似乎他也同意社会决定論者的这一主张：英雄人物也得受他降生时代世界局势的限制。但即使就这点来說，他們之間也还有着不同。因为在卡莱尔的心目中，所謂当时世界局势的种种限制究竟具有什么性质是模糊不清的，而历史决定論者則至少对于这点十分了然。这些限制有的属于社会范围，有的属于政治和經济范围。

和卡莱尔的这点模糊不清相照应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观念：即天才者的能力并非固定不移，相反地，对于他所发现的世界却有着毫无

限制的創造性的适应力。卡萊尔說："拿破仑的議論风生，舌鋒銳利，正如同他在奥斯特利茲諸战役(Austerlitz battles)中所显示的作战本領不相上下。"并且又說："英雄人物可能是先知者、詩人、国王或牧师，或者是适应于他降生当时的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物。我坦白地承认：在我认为眞正伟大人物的概念中，絕沒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不能是一切种类的人物的。"①

社会决定論者对于天才或英才的特质则有着一种更冷靜的看法。他們认为社会条件对于天才来說并非老是任其所为，天才也許会被社会条件压成粉碎。即使社会条件順利的話，也要对英雄人物活动的可能范围加以种种限制。从社会传統、风俗习惯、工具器材、技术、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整个集合体上，我們不难推知这些限制是什么。正是这些属于文化方面的集合体，对于英雄人物的历史发展和他們如何反应"成熟"的时势条件給予了我們一些启示。尽管它还沒有解释天才所以存在的理由，卡萊尔可能会主张：如果牛頓降生在澳大利亚的原始社会的話，他也必然有些巨大的科学发现；拿破仑也可能降生成为一个伟大的蛮族酋长。反过来，普列汉諾夫以及其他社会决定論者则认識到了人是一种"有了文化的有机体"——我們姑且借用杜威爱用的一个措辞。人的智力不仅决定于他所具有的种种生物学上的机能，而且也决定于社会。因为正是社会給他建立起那个兴趣和注意的框架。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之內，他才能发生怀疑和进行探索。也正是社会供給他以所需的語言，而他头脑中萌发的概念是要受到語言的限制，并由語言来給以鼓舞的。我們沒有什么有力的理由来相信：那有着生物学上某种天賦的牛頓、拉斐尔或拿破仑，如果降生在史前期的話，他会重新发现用火，或者創制堂皇壮丽的装飾品和繪画，或者成为有声望的战士。

社会决定論者給现代思想界留下了一份丰富遺产，它的作用决

① 卡萊尔：《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大众出版社英文版，第312頁。

不限于使我們了解天才怎样受文化的种种限制，而且也使我們对于文化的各种不同表现之間相互发生的影响更加敏感，尽管他們荒謬地夸大了这种相互影响的范围。但其最大貢献还是由于他們坚持历史具有决定趋势的看法，尽管其中带着一些形而上学的神秘色彩，但的确体现着某种眞理。

我們现在并不是要把社会决定論所带的那一层形而上学的表膜来加以剝除，以便发现其中包含的眞理內核，而是要把这一眞理来独立地加以重述。

我們都曉得：在自然界和在历史上都是一样的——某些事件之間似乎有着比其他事件之間更为密切的联系。任何社会决定論者，只要他們一接触到具体事例，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使我們同意：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事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认：有些事件似乎要比其他事件联系得更为紧密。人們常常把生物有机体指为有机体系的一个例証，它的各个部分是交互依賴着的。尽管如此，一个手指的丧失并不一定影响視觉，虽然視神經上的疾病可能影响到它。人体的許多部分或是机能可能发生变化，但未必显著地影响到人的思維能力。历史上事变的模式也是这样。我們都会相信：这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某些事变，例如說爱德华八世的浪漫婚姻对于大战的爆发并沒有什么因果联系。沒有人能够强辞夺理地做这样詭辯：正是爱德华的婚姻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說：如果他抛弃了他的情妇而继續做皇帝，大战就会打不起来。对于你所仰慕的英雄，不管他天賦着什么特性或气质，我們还是沒有根据来相信：他能够預先阻止法西斯德国和民主英国之間的将近攤牌。这两个国家的攤牌，纵然字面上不能說是不可避免，但事实上却正在酝釀之中，或者用一句諺語，是正在"运筹謀画"之中。就因为双方面确乎有着某种重大的利害冲突，似乎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加入战团。根据过去的观察：类似的利害冲突确曾导致西方国家发生战祸，不問它們的元首的个性如何。反之，如果这些利害冲突不存在的話，那就很少会发生什么大的战祸。社会决定論者之所以輕視个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显著作用，

正由于他們以这种形态的历史局势做为他們的着重点。而这一点确也有它的根据。

还有其他形态的历史局势，关于它們，我們不妨这样說也合理：当一系列的事件向前发展，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巨大事变时——在这整个儿事变过程的模式当中，虽然某一个人的活动确曾构成它的一部分，但即使这个人不存在的話，这一事件还是要发生的，不过不一定在同时罢了。例如，仅就对欧洲发展的影响来說，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我們无不一致承认他所显示出来的勇敢和他在航海程途中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尽管这样，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即使哥伦布的船中途沉沒，新世界还是一定会被人发现的。而且，即使事实上沒有后来的亚美利哥·味斯浦奇（Amerigo Vespucci）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他們还是会坚持以上看法的。这就由于：初期資本主义种种技术設备的扩张，对于东方市场更深一步开发的愿望，通至印度更近通路的寻求——哥伦布至死自信他确曾发现东亚——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有冒险进取心的航海家必然能够到达西半球，不过仅仅剩下了到达早晚的时間問題。历史紀录說明：整个儿那个时期特别具有进取和发现的特色。因而，在这里我們不妨又說：促成新世界发现的乃是欧洲的社会史和經济史上存在着的种种"起决定作用的"趋势，而那是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社会史和經济史的情况有着鮮明的对比的。哥伦布、味斯浦奇、达伽馬、麦哲伦等人所造成的显赫功績都不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只有他們干的事业本身才是历史上的必然。在整个儿发展进程中，这些人物都仅是一些色彩鮮明的偶然事件——尽管他們有着什么样的天才，这个发展进程的結构还是不能用这些特殊人物的活动来加以說明的。就历史上的英雄作为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的人物这个意义来說，他們并不是这种英雄，因为对于那些与他們的姓名联結在一起的发现事业，这些个別人物并不是絕对必要的因素。②

上文所說的"起决定作用的趋势"决不是什么迫使事变发生的、脫离了具体的人的各种力量（不管把它說为物理上的也好，还是带有

神秘性的也好)。它們都可还原为生活于确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传統之下的許多个人所組成的集团的行为的范型。这就由于：这些人們对于当时环境的要求和胁迫所起的反应是充分类似的，足以让我們来預測：面临着相似的要求和胁迫，他們将会怎样行动。当我們根据这些起决定作用的趋势来推測某一时期內事变如何轉化，或者是检查关于过去事件的某項判断是否正确时，我們的信心所根据的那个假設乃是：在試制某事可能发生或某事可能已然发生的图案时，不妨把瑣屑細节的变化来加以忽略。社会决定論者的主张是认为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人物永远属于这类瑣屑細节。而这一点却是錯誤的——我們已然把它揭露过。但是我們必須认識英雄人物有时确属瑣屑細节之类的东西，而这种认識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仅仅由于它可以使我們避免发生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伟人或者領袖人物永远能够挽救一种失敗局势，或者是把历史上的愚蠢行为所制造而积累起来的禍根加以排除。历史生活上的悲剧之一就是人們永远不能解脫一个本来可以不做的事件所遺留下来的种种后果。困难的問題就在于发现：英雄人物出现于历史，什么时候才是偶然的，什么时候才不是偶然的。

有一位具有眞正的哲学眼光的美国戏剧作家写过一个剧本叫作《假如蒲斯(Booth)的行刺失敗了的話》。他写这剧本的构思是要用一种似乎有理的想象方式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如果蒲斯行刺林肯确乎失敗了，总会有另外一个刺客不会失敗的。这位戏剧作家不过要

① 关于事变性和事变創造性的意义，可参看本书第九章。当然，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意义的"英雄"。我們如果把这种意义上的"英雄"来称贊哥伦布，那是十分恰当的，即使我們承认：如果哥伦布在他的搖籃里夭亡，美洲还是会被人发现的。例如，雅可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虽然也承认：哥伦布并非对于发现美洲必不可少的人物，却还这样写道："在远距离大陆的发现者当中，只有哥伦布可算是伟大的，但其所以非常伟大，乃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和弘愿完全賭在一桩理想事业上。而正是这个理想事业使他能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齐名。"参看《世界史研究》(«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布尔克哈特全集》第7卷，德文版，第165頁。

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是說：林肯的被刺并非不可避免，而只不过是以下这一事实的象征：即当时的南北战爭使得北方的态度硬化到了无从取得进一步妥协的程度。历史上确乎有很好的証据来証实这一判断。处于当时四年激烈內战的背景之下，沒有哪一位总統〔即使象和試图实现林肯政策的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完全不同的林肯本人〕能够抵得住当时居于胜利地位的許多州郡的愿望：即面对它們认为是造成一切灾难的禍首的南方，它們宁可加以严厉的对待，而不愿和它妥协調停。假如最終一幕的那天晚上，林肯因为得了感冒，呆在家里，之后还活着的話，他也决不会在約翰遜失敗的那个事业上取得胜利。假如林肯企图改变急进共和党人劝他們深謀远虑走仁慈道路的意图竟告失敗，并且經过一番毫无效果的努力而逝世的話，則后代子孙們对他的崇仰将会降低一格，仅和威尔遜一样。威尔遜的命运說明：由于領导了一次战爭使之胜利結束而取得的威望，还不一定能够应付战后的再建問題。

从以上所說自然会得出如下結論：即只有当历史局势容許今后发展道路有重大选擇的余地时，英雄人物的活动才会发生决定作用。正統派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論者之所以否定英雄人物的活动能够对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往往是下面这个学說带来的必然結果：即现有的經济生产方式乃是决定它的上层建筑（即指文化）之唯一因素。依照他們的学說，从一种已知的經济制度只能发展出来一种（而且仅只一种）其他的經济制度。而在这样发展出来的經济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只能繁荣起来一种（而且仅只一种）文化——所謂"文化"是指不属于經济范围的其他社会制度。即使在政治、艺术、宗教或哲学等領域之內，容許发生重大变化，分析到最后，那也还得以經济制度的发展过程为其据以解釋的根据。而經济制度的发展則是由于它的內在矛盾力的推动。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英雄人物只能到社会經济发展过程的所謂間隙之中（或接笋处）去寻找。英雄人物的出现和旧社会的消亡与新社会的产生毫无关系。

証据呢？至少只就伟大人物来說，除了普列汉諾夫和托洛茨基

的著作算是例外，他們甚至連提供証据的打算都沒有。关于普列汉諾夫，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现在輪到我們来談一談托洛茨基。他的撰著确乎有着显著的聪明技巧（尽管最后还是归于失败），那对于历史的科学研究，可以說是一个永久的貢献。关于这个題目明白无隐的論述见于他撰写的《俄国革命史》。

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大意是說：俄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乃至达到高潮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革命是为人們所創造的，他的問題之一就是研究一下：个别人物的个性和历史过程之間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很自然地，他所最为关心的就是居于战略地位（或領袖和权威地位）的个别人物的个性。他試圖表现：在决定性的历史活动上面显示出来的个性特征可以說是"为社会条件的巨大力量所移植或更直接地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簡短的实例做为証据。那就是描写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皇后的个性以及他們怎样应付1917年2月里以他們为对象而爆发起来的革命情緒之高潮的。借助于宫廷侍从的日記和回忆录等資料，他把尼古拉二世的肖象作了这样的描繪（这是其他的历史分析家也认可的）：一个懦弱而沉默的人，当他的江山已經显然面临崩潰，却还整个儿浸沉在宫廷的日常瑣事之中，怀疑他自己身边的大臣，仇視諍諫的人。虽然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却給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以一个完全无法挽救的印象。

然后，我們在这本书中又看到追溯回去对路易十六世和查理一世的形象作了描繪，这两位皇帝也都是面临革命危机的专制君主。尽管有些个夸大的地方，但托洛茨基确乎能够在这两位君主的个性的模式上，找到了一种可惊的类似点，特别是在那些終于使他們失去王位和生命的事变之中，他們如何应付时局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事迹。甚至連馬利·安多涅特（Marie Antionette）和亚历山大·斐多罗甫娜（Alexandra Feodorovna）两个人之間，在行动、語言和态度上也有着显然的类似之点。在这里，我們就遇到了具有伟大权威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們表演出来那似乎为他們安排好了的历史任务。

“一个反动的法国历史学家，关于路易的个性，曾經这样說：‘他不知道該抱怎样的希望——这就是他个性上的主要特征。’这些話可以同样地用来描写尼古拉：就因为他們两个人都不知怎样希望，而却知道怎样不抱希望。但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历史上的失敗者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又眞正能希望什么呢？他常常只是听别人讲話，面带微笑，而很少下什么断語。他的第一个口头禅往往是‘不’。这是描写的誰呢？还是这位加貝。① 但如果是这样，那末，尼古拉的面容簡直就是完全抄袭了。他們二人都是‘歪戴着王冠，冠簷几乎盖上了双目’——就以这样的姿态陷入深渊。但当你面临陷入深渊的危险而无可逃避时，睁着眼睛是否就会毕竟比較容易一些呢？”②

托洛茨基是让人們注意这一事实：一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不能仅从个人心理学家的见解来加以解释。而他的性格、聪明和道德乃是他的天賦能力和社会条件之間不断相互影响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他比普列汉諾夫具有更大的說服力。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足以代替路易十六或尼古拉的国王或沙皇，都会有着一般无二的个性特征呢？托洛茨基还不敢这样輕率地加以肯定。他只不过承认：假如遺传性格上的历史偶然因素完全不同的話，則俄国革命将会是“一个极不相同的沙皇的創制品”。但历史結局还会是一样的。这个专制君主无論怎样也得垮台。即便是换上一个有为的沙皇，也决不可能长远地挽救这个局势。

这样就又轉移到了以下这个人皆熟悉的见解之上，就是說历史人物的个性只限于在比較不重要的变化上才有其意义，而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决定于社会力量和經济力量；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当中，英雄和伟人都成了一个无足輕重的因素，不妨把它忽略。历史上的事变越是巨大，积累起来的社会压力的解放越是强烈，則历史

---

① Capet，法国革命后給与路易十六世的称呼。——譯者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麦克司·依斯特曼英譯本，1932年紐約西蒙·舍斯特尔公司版，第92頁。

人物的个性将会越发完全被扫除开去。托洛茨基以有力的和提着要害的比喻，作了这样的結語：

“人們对于呵痒的反应将会是不同的，但对于赤紅的热鉄，則反应无不相同。正如一个蒸汽錘能把无論是方鉄或圓鉄压成了鋼板，在过分巨大而无可抵御的事变的打击之下，任何阻力都被压得粉碎，而个性之間的界限将完全消失。”②

托洛茨基給我們指明出来的就是：面临着某种历史局势而被解放出来的各种其大无比的力量会把任何企图加以阻拦的人物一扫而光。至于这些力量是否单純属于社会的或經济的范畴，还是都和：民族的野心和沮丧，宗教信仰和政治野心等等因素交織在一起，那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我們承认：人物个性在其中并不占什么重要位置。

我們对于这个問題，試加以深思熟虑，便不难明白：托洛茨基的眼光尽管聪敏，但仅限于以下这种场合，它才能合乎实际：即当恐怖或希冀心理之爆发打动了千百万的群众，把他們号召起来反对那到昨天为止还是公认为权威象征的东西。也就是說：当时，沉淪在社会底层的各个阶級，他們的生存需要还沒有得到满足，而利害的冲突又那么尖銳，除非起来反抗那些掌权人物，攻垮他們的‘天賦’王权，問題就无法得到解决，而在位的人却又坚信他們的王权是由于神授，或是应享的社会权利。那时成为习惯的政治統治已經越来越显出它的愚昧和压制，那时馬上人物的道德說教在现实光耀之下响彻云霄——我們已然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不安的动蕩可能突然氾濫成为一场天翻地复的灾祸。我們能够說出是什么即将到来，我們也能够預见它的临近，纵然还不能指出是哪个特殊事件将引起它的爆发。換句話說，我們能够預測一场革命或一次战爭的到来，但不能总是預言它的結局如何。那个結局有时可能决定于領袖人物的个性。

托洛茨基沒有看到这一点，而当他迟疑不决地瞥见了一些可能性时，也不知道究竟是应該放弃他的一元論的社会决定論，还是强把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93頁。

事实来加以牵强附会。他的方法所能解释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旧制度的消亡，而不是代之而起的那个新制度；是一种旧文化的崩溃，而不是新文化的产生；是沙皇制度的衰亡，而不是克伦斯基的被推翻或布尔什維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当托洛茨基看到了一个老年人經过一陣愈来愈强烈的肌肉痙攣和衰弱的症状之后，断定他必然会死亡，却又把同样的情况做为是一个新生命必然降生的証据。不錯，一切人都是会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会有些人生存在人間。沙皇制度逃不了垮台的命运（这一点下文还要談到）并不足以証明和这相距八千里的布尔什維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局势当中确实存在着可能加以选擇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乃是英雄人物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就我們的目标来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是否存在着这种可以加以选擇的发展道路——以及它們的性质和期間如何。上文的論点使我們相信历史上确乎有着这种可以加以选擇的发展道路，而且也正是这种可能导致相反結局的选擇道路才有可能改变了已然发生的事变过程，或是有可能把今后的事变过程来重新加以决定。这个见解并不排斥科学的决定論者的种种假設，却是要反駁上文检查过的一元的有机的决定論。因为这个见解并不主张一切的选擇道路都有可能实现。它承认这些可能性是受限制的，包括对于英雄活动的可能影响所加的限制，它所根据的就是承认社会行为的概括性的描述或社会规律。

根据已知的社会資料，我們有时能够預測究竟哪些道路是敞开着，哪些是关閉着，纵然我們还不能够預言要在这些敞开着的道路之間怎样来加以选擇。例如，希特勒当政以前的德国經济局势：失业的人数紀录早已增加到好几百万，而且从1928年到1932年之間还在逐年增加，便把当时可供选擇的道路限制在以下两途之間：或者是为了社会福利而实践一种民主的計划經济的扩张政策（而这是当魏瑪共和国时代就已见諸案卷的計划），或者是把全国的生产設备一举而轉变成为全面战争的工具。这两条选擇道路都是历史上有着可能的，并且不問选擇哪条，都必然要深刻影响到此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經

济发展，和引起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至于那种恢复德国初期資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抽象理論上的可能性，則是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等不到自由市场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德国的群众老早就因饥餓而死亡了。

同时，根据我們对于德国經济的已有了解，希特勒决策的胜利并非确定不移的結論。假如对于德国經济还敞开着向外輸出的大門，假如不是她受了經济危机那样严重的打击，希特勒的当政很可能早就失敗了。但他之所以取得胜利，那不仅由于当时危机所造成的广大經济灾难。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的，也还由于希特勒有着那种政治手腕来团結右翼——从容克貴族、工业家直到那深受恐吓的中产阶級——和取得了兴登堡的支持。如果当时的德国能有一位善于团結左翼并且安撫中产阶級畏惧心理的人物，希特勒也許根本不会升任总理。

每当真正的选擇道路存在的时候，一个伟人的积极参預可能会发生决定性作用——这里只說可能会，因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插足进来决定道路选擇問題；而这些因素可能比个性因素在这上面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

尽管我們的論旨在于主张(此点将见下文)①：那具有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对于历史阶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即在这里，我們也决不会放弃那有关因果联系的信心，或者是接受絕对偶然性的信念。我們所要断言的不过是：在这种局势之下，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是个相对独立的因素——所謂独立是說独立于决定道路选擇的各种条件——而且在这时节，对于帮助我們来了解（或預测）究竟哪一个可能的道路竟会得到实现这一点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都只具次要意义。在这种局势下，我們也就能够說(而且能够提供这样說的事实根据)：如果那位伟大人物沒有降生的話，則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会完全改变方向。凡是否认：对于处在这种局势

① 参閱本书第十章。

下的伟大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应該給予这样評价的人，都得提供各种事实根据好来証明：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只有仍走老路。在上举任一场合，我們都得提供事实根据以便使人相信：如果某些人物沒有存在人間，或者，如果某些事件沒有演变出来，则历史紀录将会是怎样怎样——这一点就足够說明：在历史的領域，正如在自然的領域一样，純粹的偶然性并非处于統治地位。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是（而且正是）因为并非所有事件都是偶然的，我們才有可能証明偶然事件之所以重要。

我們这一研究的整个答案恰恰决定于我們提出和解答以下这一問題是否合理（誠如每一个胜任的历史学家都得提出問題并作出答复那样）：如果这一事件沒有发生，或那一位人物沒有降生，或那条道路沒有被选擇，則事情将会是怎样的。但这里却显得頗为奇怪，似乎人們都深深地厌恶严肃地对待历史上的“如果”問題。① 这些“如果”問題往往被人当做“純粹的假設”而加以忽略，就好象只有非假設的問題才有意义这一点乃是自明之理。持这样看法的人似乎是抱这样的态度：将会怎样的就将会怎样，已經怎样的就已經怎样，我們完全用不着再向深处追求。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到处充滿了这样的口气，即似乎有意地追求或者是說明：假如某一已經实现的事件竟然沒有实现的話，事情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問我們：“假如我沒有干扰你，你现在又将做什么呢？”我們总得回答他的。历史在这方面和日

---

① 严格的决定論者往往是把“如果”問題看作毫无意义而加以抛弃，而极端的非决定論者則承认它是有意义的，但又认为它是无用的。例如，法国的法哲学家都尔都隆(Tourtoulon)在討論历史上的可能性时，这样說：“如果有人問：假如某一特殊的假定事件竟然实现的話，或者是：假如某一现实的事件沒有实现的話，世界将会有什么变化？——这样提問題是絕对无用的。”他举出的理由是：在机会（或偶然性）的普遍統治之下，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参閱«法律发展中的哲学»，1922年紐約英文版，第631頁。至于与此相反的見解，可参閱珂痕：«因果律及其在历史上的应用»，載«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第3卷，第12頁以下。

常經驗并沒有什么不同，即使它有一些更崇高的題材时也是如此。

据說罗斯福总統每当緊急会議，应付不暇的时候，对于苦恼不堪的問題，往往是把它加以“試办”的标签而擱置在一边。但所謂“試办”的問題，正如其他任何問題，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适当的，也可能是不适当的。只要有人提出問題，不管他聪明也罢，愚笨也罢，我們总得給以回答，而不是仅只駁斥他提問題方式的不正确而不了了之。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如果1940年大选时，当选的总統是威尔基（Wilkie）而不是罗斯福，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是怎样的？要叫对方等待事变的演进来回答其是否相同，那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由于这一問題的性质和它的重要，以及人們对它采取的不同立场，值得我們深一层地来探討一下“如果”問題在历史上的意义。

第七章　历史中的“如果”

几年以前出版了一本由斯魁尔(J. C. Squire)主編的有趣的书。这书包括若干篇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撰写的論文，內容是关于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可能演变的推测。① 这书的立意是光輝的，如果发揮得当，或可对于历史进程的动力表現出多方面的見識。不幸作者的撰写方法非常使人失望。大部分文章仅只馳騁幻想，而并未能做到科学性的改写。主要的作者和文章內容有：葛达拉(Guedalla)——如果摩尔人在西班牙获胜，事情将会怎样?；斐歇尔(H. A. L. Fisher)——«如果拿破仑逃到了美洲»；哲斯脫敦(G. K. Chesterton)——奥地利的唐·約翰(Don John)和苏格兰的馬丽女皇的婚姻問題；尼科尔孙(Nicholson)——論拜伦如果做了希腊皇帝；柏洛克(Belloc)——論路易十六如果逃出了革命的巴黎；范·隆(Van Loon)——論荷兰如果继續統治亚姆斯特丹；温斯敦·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如果李(Lee)在葛的斯堡(Gettysburg)获胜，結果将会怎样?

对于这类問題，究竟要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們才能得到科学上真正可靠的答案，而不是仅仅幻想上认为可靠的答案?为了解答这个問題，我們将于下文对一系列的假設情况加以考虑，因为我們相信根据这些假設，就能够得到可靠的結果。然后，再来考量一下：上举作家的文章布局作法——他們同意提出“如果”問題的合理，但显然只是作为一种幻想的练习；它的根据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类乎一篇文笔巧妙的故事所表演出来的看似有理的虛构。不过在这以前，我們还得討論一下那些否定“如果”問題的提出具有科学意义的論点。

① «假如我們的历史經过重写»，1931年紐約英文版。

某些历史哲学家主张历史事变的模式有如一个错综复杂的交叉結构，是由专門术語叫做“具有內在关系”的事件构成的。不过所有的实践历史学家沒有一个贊成这样主张的。如果甲事件的发生必然导致乙事件的继起；或者反过来，乙事件的发生必然导致甲事件的继起，这甲乙两个事件就是具有“內在的关系”。結果，这一事件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必然引起那一事件随而发生变化。如果甲事件不发生，乙事件也一定不可能发生，或者：乙事件发生，則甲事件也一定不可能不发生——那末，甲乙两个事件就是具有必然的关系。扼要地說，这甲乙两个事件在邏輯上互相蘊涵。现在，如果所有的事件之間，都有着这样相互蘊涵的关系，則只要我們一旦假設任何事件发生了和事实不同的变化——或甚至它的一个单純的細节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末，任何其他事件也得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但在这个假定之下，每当我們提出“如果”問題时，再也不能明智地說出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了，就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这样一来，我們就再也不能凭借过去观察到的其他情况下曾經发生过的关系来預测今后也将随着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一旦我們設定了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設，則这些关系本身早已自发地发生变化了。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情况或事件都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說：都是某一总情况或某一巨大事件的一个部分。而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設，是不能够摆脫掉自身矛盾来加以陈述的。而它既是一个自身矛盾的陈述，那末，任何事情，不管带着怎样的幻想色彩，也都能和它連結起来。

这种历史哲学乃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一个特殊的应用。某些派别的神学决定論者偶尔会暴露出这种思想来，但更加清楚明白地把它发展起来的是黑格尔的絕对唯心主义以及它的变种。它的基本假設即：一切事物必然是互相包含着的；从而，任何一个眞的判断蘊涵着其他一切眞的判断的全体——这是从来沒有能始終一貫地发揮出来，也是絕对无法确立的。誠然，为什么任何两个历史陈述，譬如“威灵敦在滑鉄卢打仗”（事实上这是眞实的）和“黄金不是在加尔佛尼亚发现的”（事实上这是虛妄的）結合在一起，就一定会产生矛盾？或者，

能有人严肃地相信：如果我的狗不叫“追踪者”而叫“老虎”的話，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必然要受它的影响嗎？詳細地来批判关于这种封閉式的宇宙之形而上学理論，这里不是适当的处所。而对我們的目的来說它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后果即已充分暴露出它的弱点了。因为它包含蓄着这样的意思：历史上不存在客观的种种可能性——未来已經是现实的，只是还沒有产生出来，人类的努力或不努力都是事有“前定”，理智从来不能絲毫改变历史的演变过程，而是“只有当夜幕拉下来的时候，米奈娃(Minerva)的猫头鹰才开始飞翔。”(黑格尔語)

历史事件之間相互关系的程度是个經驗問題。当我們断言某些事件之間有着特殊的相关，那意味着：它們都是証实一些經驗規律的一些实例，而这些經驗規律的职能只不过做为我們所研究的特殊問題的若干假設。检驗相关的范围或者規律的确实性的一个办法就是提出一个有关的“如果”問題来。当这个“如果”問題的答案告訴我們：即使問題中的某个特殊事件沒有发生的話，事变的进程本质上将仍然和以前一样，那末，我們便无妨下結論說：在这一特殊事件和它出现于其中的那个群集之間沒有什么非此不可的联系。例如，如果1928年当选总統的是斯密司(Alfred E. Smith)而不是胡佛，那末，在这位总統任职期間的美国經济情形将会是怎样的？这时，我們便能不必顾虑任何矛盾而坦然回答說：那是和胡佛当选以后的情况毫无二致的。这就因为：經济循环的各个方面并非决定于总統的政策。我們甚至可以这样地說：不管是誰住在白宫，1929年的經济危机和它的种种后果将会在一切可能上都和事实的經过大体相同。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提出这样問題：在1933年到1938年間，假如由于某种机会，不是罗斯福而是約翰·南斯·嘉納(John Nance Garner)出任总統的話，則与新政联带而来的社会福利立法以及对商业上的种种限制措施(它的作用是制止了相对地不受統制的巨大企业的发展)是否还会被采用？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事情上这些措施还会完整无缺地被采用的。不过，这时我們也不难正确地断言：由于沒能采取一系列的挽救性的經济措施，因而給本国

土生土长的法西斯情緒和运动造成了非常有利的发展机会，使得象休·朗(Huey Long)这样的人也能乘机把它当做巨大的政治資本。有时最須估計到的是时势，有时则是人。如在1929年，罗斯福将会和胡佛一样毫无办法。但在1933年，他却有了他的机会。罗斯福之所以放弃1932年的竞选綱領是因为当时时势給了他以活动的自由，正如威尔基如果当选，也将放弃1940年的竞选綱領，則因为当时时势沒有給他以活动的自由。

* * *

特魯埃(Drouet)公民是一个老实的法国乡下人，当他駕駛着双輪馬車越过发棱(Varennes)桥附近的拱門时，粉碎了路易十六企图逃出巴黎的阴謀。当他的仪式馬車被阻停下来的时候，这位国王眼看着安全已沒有問題了。柏洛克提出了这样的問題：如果特魯埃的馬車耽擱住了而这位国王竟得逃脫，事情又会是怎样呢？他高兴地給予了这样的回答：欧洲的全部历史都将因而改变，最后到我們自己这个时期会形成一个"基督教国的黃金时代"。尽管貝劳克是为了反对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抱着长期的热烈复仇情緒而涉猎历史的，但这样一个判断还是缺乏清醒头脑的。他达到这个結論是从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設中引申出来的：即是說，如果路易十六竟得逃脫，这位国王将能鎮压了革命的武裝，解除了拿破仑的兵权，阻挡了工业革命的种种后果，从而不仅改变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斑斑点点，而是改变了資本主义发生作用的整个方式。他哀悼地說："正是特魯埃的双輪馬車搞出来的詭計！"由于"这辆馬車而皇室淪落，革命得逞，以致于现代世界的机械化的发展和社会不安都由此而变为可能。"但好几个世代的历史学家所纂輯起来的〔历史〕証据，却以其全部力量来反証：无論是特魯埃，还是路易十六对于十八世紀末期的欧洲工业扩张以及它的多方面的社会影响都是螳臂当車无能为力的。柏洛克竟把历史上两个并无影响的枢要，一个皇室的和一个平民的，錯认为具有密切的历史內在关系，而把它过份地加以夸大了。

* * *

一个更适合当做話題的“如果”問題就是：当拿破仑准备渡过英格兰海峽进击英国而正在悬而未决的情况。假如有那么一天，英国的舰队因风息而停駛，拿破仑正好乘机以汽輪渡过海峽而实现了他侵略英国的未圓好梦，事情又会是怎样的？这样，拿破仑是否就能免于滑鉄卢之敗？而英国是否会变成法国的一省？

以下从两封信札中的摘录証明：拿破仑的新式舰队渡越海峽的可能性并不是牵强附会不近情理的，而是千鈞一发地系于一种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上的事。第一个文件是汽輪发明家罗伯·富尔顿（Robert Fulton）給拿破仑的信。信上說：“我能够扫除您的敌人用以保卫自己的两个障碍物——巨风和暴风雨——不用把他們的舰队放在眼里。无論何时都能从从容容地把您的軍队在几小时之內运到敌人的領土上。”第二个文件是1804年7月21日拿破仑給他的內政部长的一个手令。日期是重要的，因为它足以說明：在那些年月里，拿破仑正有机会来利用富尔頓的发明为他自己服务。信中这样說：“我刚刚看过了工程师富尔頓呈給我的建議，这是个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局势的文件，你送得太迟了。赶快把它交付一个专門委員会来加以討論。”①

让我們假定富尔頓的发明并沒有擱置在委員会里而竟得到实现，法国果眞装备起来一支以蒸汽为动力的舰队，拿破仑的軍队得以渡越海峽。那末，他的侵略計划果然能够成功嗎？不管我們的答案怎样，那总得根据一些由双方局势的对比而建立起来的軍事上作战的原理或规律。既然任何軍队都得仰仗它的輜重、給养、和补充来生活，拿破仑就得耗尽他的一切財力来維持他的运輸路綫。而只要英国舰队还存在的話，那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絕对沒有把握来操纵那海上的风暴，好让英国舰队永远停駛在那里，以便輕而易举地加以破坏。当他有机会能够装备起来一支以蒸汽力推动的作战舰队，而

① 两个文件的摘要引自卡罗拉·奥門：《拿破仑在海峽》，1942年紐約英文版，第155頁。

他的敌人，那个拥有更大的造船业和工业后备力的英国，至少也能够和他并駕齐驅。所以，我們可以这样断言：即使拿破仑能够在英格兰登陆的話，那也离胜利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如果他只能倚靠他的帆船来抵达英国海岸，这个結論就将更无疑义。

*　　　*　　　*

最著名的一个"如果"問題，是由德国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最初提出来的。德国的另外一位历史学家麦克司·韦柏(Max Weber)就把它当做一个关鍵性的例証来討論历史上的"客观可能性"。这問題就是：如果在馬拉敦(Marathon)、薩拉密斯(Salamis)和普拉梯亚(Platea)等等战役之中，波斯人竟得胜利，以后的欧洲历史又会是怎样的？迈耶很有理由地主张：希腊的政治史和种种文化价值以及欧洲的整个儿文明都将因此而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完全不同。既然阿凱美尼(Achaemenian)帝国的既定不移的政策是要把它的专制独裁和宗教統治强加之于在它軍队鎮压下的整个土地，則希腊城邦，附带着它的自治传統和有限的民主制度都将在一切可能上从欧洲絕迹。那随同波斯人奴役恐怖的解除而来的希腊文明的大繁荣也将在其萌芽状态下很快地夭折。

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古代历史学家同意这个看法。詹姆士·布里斯德(James Breasted)在这一点上是追随着迈耶的，但英国历史学家裴歇尔却相信波斯人的胜利并不能损害真正的希腊传統，而这是由于大流士(Darius)和泽尔士(Xerxes)准备利用希腊的叛徒来充当傀儡統治者。而在这些傀儡統治之下，希腊文化的卓越传統是会得保存下来的。

但以上这种见解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希腊人都效忠于希腊城邦，正如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接受法国大革命的遺产一样。有些希腊人却宁愿接受波斯专制政府下的安居乐业，而不喜欢希腊民主政治的扰攘不宁。还有，裴歇尔沒有注意到波斯人鎮压革命的爱奥尼亚諸城(以及一切敢于援助它的)所用的那些严刑峻法。如果波斯人的侵入冲破了希腊的防御綫，則希腊的其他城邦也

将陷于同一命运。

迈耶所預料到的那种可能性是頗为可信和頗有可能的，因为他的設想是以阿凱美尼帝国的旣定軍事政策和政治政策为根据，并有一系列的其他历史事迹做为証明。当然，說这些政策都会保持不变只是一个假設。但我們确乎沒有什么理由来相信：一个胜利的泽尔士竟会放弃这种政策，而勿宁有充分理由来相信：这种政策如果加强只会使波斯人的統治更加巩固。如果我們沒有足够的根据来假定某种决定性的关系在任何历史局势下都是个相对不变，我們便不能在幻想和科学的重新构想之間划上一条显明界綫。

就因为抹煞了幻想与科学的重新构想之間的这个界限，温斯敦·丘吉尔所写的那本假想美国历史上南部同盟一方在葛的斯堡获胜的故事，尽管說得很好，但在每个关鍵性的情节上却都搞得很糟。他这篇故事設想北方在葛的斯堡吃敗仗会造成什么結果，其中几个高潮之点就是：(1)北方打敗仗，在现在的合众国領土上建立起两个和平共处的国家；(2)紧跟着南方在葛的斯堡的获胜，李宣布解放黑奴，这使得北方愿意接受和平的調解，并且导致了英格兰和南方的联盟；(3)正当1905年左右危机发生的时节，組成了一个英語的联合国，即由英国、北方和南方三方面共同組織起来的“重建合众国”——这是盎格魯薩克逊民族的大团結，每一方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或同一份財产的继承者；(4)由于这个英語联邦宣布了对于外来侵略的共同御侮，因而使得1914年的薩拉也沃（Sarajèvo）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1. 对于北方来說，葛的斯堡的敗仗所导致的軍事后果决不是一敗涂地而是战事拖长。这就因为，北方的工业后备，它的压倒优势的人口，它对于海权的控制——更不必說維克斯堡的陷落使得北方能够控制整个密士失必河流域——所有这些早已注定了南方的終归敗績。至于华盛頓的被攻下以及它所加于北方各郡的威胁，那不过是使得这些区域的人民增强了团結情緒，更加勇敢地达成作战任务。甚至，这会使得林肯一变而成为急进的共和党。我們同意丘吉尔所說：

“一旦获得一次大胜仗……一連串的結果会随之而来，形势就如不可遏止。”但是南方的一次胜仗并不足以造成一連串的因果鏈环最后导致北方的失敗。假使几次胜仗就足以保証南方在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那末，南方早已就打胜了，因为在大多数战役中都是南方占居优势，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意志帝国的軍队一样。如果想象中北方几次敗仗所招致的悲慘結局，果眞严重到了成为最后战敗的序幕，那末，今天就不会有不列顛帝国了。

2. 說南部同盟軍于葛的斯堡获胜之后，李氏将会宣布解放黑奴，这簡直是一位戏剧性的历史家的狂想。有好几次胜利的战役提醒他可以这样做，但他始終沒有这样做，就因为解放黑奴将使种植园經济为之破坏，而南方各州正是为了維护种植园才作战的。如果南方在葛的斯堡获胜，英格兰出面来积极干涉这件事似乎不大可能。至于劳动人民所关切的，他們的同情完全寄于北方一边。就掌握在統治阶級手中的外交政策可以不受这种情緒影响的范围內說，当时的外交策略路綫乃是：打击一方、拉攏一方以便削弱双方以謀漁人之利——不仅南北战爭是如此，就是大陆上的每次战爭也是一样。

3. 相信1905年时，北方的合众国和南方的同盟国——这两个在許多方面利害冲突、互相忌妒的主权国家，会放弃各自的主权而和第三国（即那至少被其中的一方看做世仇的大不列顛联合王国）結成联盟——这与其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见識和学問，勿宁說是丘吉尔氏高尙的希冀和渴望。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沒有先例的。它的失敗或者更符合历史实录。誠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分割的合众国和大不列顛結成联盟或者更要容易些，因为那时这两方是比較接近的战时同盟。但在丘吉尔撰写那篇文章以前，事实上旣毫无朕兆，也沒有人公开倡議过，或甚至是暗示过。不过，根据他这篇文章，我們必得把他算做这个新联盟綱領的最初发起人，尽管是間接的发起者。

說一件事在人类历史上沒有先例，那不一定是否认它的可能出现。否定了这一点，历史将成为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样一个事件的

可能发生却决定于足以促使它发生的时势如何。丘吉尔的故事所設想的那个联盟似乎沒有可能，就因为无論是凭借一般的历史常識，或根据人类活动或利害关系来考虑，当时都沒有促使它发生的条件。它乃是做为一个設計蓝图的暗示提出来的。就因为目前的局势在这些方面已和当时有所不同，所以，他的理想纵使还沒有见諸实际，但我們不妨把它看做一个历史上的可能。

4. 假如有一个英語系統的联盟国把它的最后通牒送达欧洲大陆的話，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許不会在1914年8月間爆发——这一点毫无疑問。事实也确乎使人相信：当德国的最高司令部准备扫蕩法、俄两国时，它是估計在这期間內英美一定守中立。不过即使1914年的大战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要想完全遏止一个早有准备的战争在此后数年中爆发的可能，其所需条件决不仅是英美两国的行动問題。此外还得具备如下种种条件：巴尔干問題的彻底解决，一切具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同意柏林-巴格达鉄路的存在和共同管理，世界資源和殖民地市场的重新分配，德国海軍恢复俾士麦的海軍政策，以及相当范围內的普遍裁軍——还不必說，几个强国的国內資本主义經济的重大变革。事实上这些必要条件似乎毫无可能实现的形迹。

* * *

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想象上的重新构想常常具有的缺点之一就是把面向着未来的推想綫索拉得太远。他們不滿足于把既定情况的重新构想限于一段有限的期間之內，以便能比較清楚地看到可供选擇的道路之継續出现，而反把他們思索中的进程拖得无限地远。因而他們就忽略了以下这一点——即随着愈来愈多的因素在故事中的出现，那可供选擇的各种道路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增多，愈来愈复杂。假如限于几年之內的历史重新构想具有冒险性的話，那末，拖长到百年期間的重新构想，其冒险性将不止大了十倍。下面列举的实例可以使得这点更加清楚。

假如在独立战爭中，魁北克因美軍的攻击而淪陷，我們便能比較可靠地推测战事的結束会比事实更早，而本尼狄克特·亚諾尔

(Benedict Arnold) 或可避免成为叛徒的命运。这是一个比較可靠的预测，但并不因为我們假定了对于战事演变和个人(譬如亚諾尔)的行动所作的某些概括是正确的，这預測就有必然性。固然我們有权根据过去經驗中引申出来的各种规律来做这样的概括，但在邏輯上我們却不能担保这些概括一定会继續有效。而且也难保某些新的而且完全料不到的情况不会露面致使战事拖长和亚諾尔成为叛徒。另一方面，我們也是在假設：随着魁北克的陷落而来的那一系列事变不会受到其他系列事变中发生的事件之干扰。但不同事变的各个系列确是有着交叉互扰的可能，那也就是我們的判断虽然有着几分可靠的根据，却不一定十分准确的理由。我們也还能預言：假如魁北克陷落，則那拥有大量法籍移民的加拿大各州(这些法籍移民只是最近才归入英籍)在战爭結束时，也許不会对于与美国合并的問題提出了不可調和的反对意见。不过在这里，从其他系列的事变而来的干扰因素就会更多，可能受到其他事变影响的期間也会拖得更长。但如果有人想来推測：加拿大与美国的假想合并对于降至二十世紀的美国經济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那他的結論就将非常不可靠，纵然不一定完全是幻想。他是把可能发生互相影响的若干系列的事变看做相对孤立的，而单純設想出一条事变发展的路綫。但如果我們根据其他历史知識便不难看出事变的系列是互相交叉錯綜着的。往往我們假想的历史路綫会在許多点上被无数其他的事变系列所切断。

假如沒有宗教改革，我們便可准确地来推測：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后来种种反对宗教改革的举动。也就是說，十七世紀当中所发生的許多事变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是足够眞实的。但假如沒有宗教改革的話，我們目前是否就会享受着一种世界宗教之下的宽容，这种世界宗教有着思想自由的教皇，把那神圣的圣經历史都解释做启发道德的故事——正如桑塔亚那 (Santayana) 显得相信的那样呢？这样，在这一类的文明教化能得到发展之前，历史上許多其他事情就得不曾发生过。但得要不曾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因而我們不妨把以

上的推想看做虚妄，而加以抛弃。

如果1919年凡尔賽会議当时，或者是克雷孟梭(Clemenceau)，或者是威尔逊的政策能够拚命坚持到底，而不是把双方面的弱点合在一起，則后来世界各地所受希特勒恐怖的威胁也許不会那样严重。我們这样推測是妥当的，也就是提供了正确的根据，可以来作这样的断言。但如果苏罗(Soul)仍然是苏罗，或者如果他再生为保罗(Paul)以后沒有决定把那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又复活的弥賽亚的福音带給异教徒，則罗馬帝国的命运又会怎样？在阿拉瑞克(Alaric)以及其他野蛮酋长統治之下的欧洲又会怎样？十八世紀的法国又会怎样（假如还有一个法国的話）？是否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都会发展得更早些？还是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在这些問題上，只能用健全理性做出最粗略的回答。①

当我們把未来事件可能演变的綫索拉得远离目前阶段，我們的心智就会由于不可預料的因素愈来愈多而动搖不定。那也就是为什么預言家会是那样一种冒险的职业。“未来”的机会誠然使我們較为活跃，因为它們还在我們前面。不过“过去”也还是有关失却的机会之一篇动人的故事，纵然它一去而不复返。“过去”把它的幕在我們身后默默地拉下来了，所余下来的仅仅是那已經神灵裁判的可怕的結局。但所謂結局的意思也不过是說历史的不可逆轉，而不是說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当然，更不是說一切都是好的。一个受了欺騙的回顾会把不可預料的事情錯当做事有前定。历史上一切久已确定的事情以及不能改变的事情对于人們所发生的催眠作用往往会使天眞的人錯认为这些东西有着一种隐藏着的目的；并使虔誠的人錯把历史的裁判褻瀆地当做了上帝的裁判。

---

① 这是一切时間过长的历史的重新构想都难办的地方。例如，查理·勒奴維埃在《历史中的虛构年代烏托邦》一书中在叙述二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欧洲文化时，“不是作为事实經过，而是作为可能实现的假想来写的”。这样重新构想的历史，其科学价值虽足令人怀疑，但可能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与教育意义。

如果我們讀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它得到理解而不是靠它来得救，那末就一定会承认过去确是存在着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这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之中，有的竟会結果变成和未来的机会有关系，正如同一次认識到的失敗会和随之而来的成功活动有关系一样。历史上的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并不是仅由人們的希望而生的鬼怪似的反响，却是錯失了的种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其所以錯失，有时由于缺少一位英雄，也有时由于缺少一匹馬或一只鞋，但大多数情况是由于缺少理智——特别是缺少那觉察客观上种种好的可能性所需要的理智。

我們可以把历史过程比做一株盘根錯节的古树，至今仍在茂盛地生长着。那树干就是人类，有着其形如弓，向各方分开生长的巨枝。由每根巨枝上又分出来大大小小的細枝。这里或那里还能找到那已經修剪掉的成对叉枒的痕迹，只留得一个分叉长得很大。另外的地方，也还能看出那修剪掉的单独巨枝遺留下来的瘤形痕迹。在那繁茂的树叶丛中也还能找到那枯萎的枝条。似乎当年曾有一位技术高明的园丁打算把它修剪成对称的形状（或者是令人欣賞的其他形状），不过目前这修剪工作已难着手。但由于每个季度都有新芽发生，因而这修剪工作也还得年年进行。这株古树或因雷电的打击而刹时毁灭，或因毒菌的蔓延而逐漸死亡。而人們对于它的果实的味道沒有共同的欣賞。

在这株古树上有着过去曾經长出巨枝而今已无存的处所，这是比較容易想象的；但在这条今已无存的巨枝上可能存在过的叉枒就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了。而对于这个虛拟的叉枒上曾經派生出来的細枝和树叶，則我們更加是只能做到最粗略的猜想。当我們看着这株活树时是比較容易看到的，比我們經驗着活的历史时还更容易，因为我們的眼睛追索着一个几何的模型，我們不难由此推知：如果任何一根现存的巨枝沒有得到順利的成长，或者中途夭折，那末，它上面已經长出来（和可能长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将无存。但絕不可由此推論：而說树干能够解释巨枝，巨枝能够解释叉枒，而叉枒又能够解释

細枝和树叶。因为在这一系列关系上，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罢了。

树木的結构模型比較历史的因果联系要簡单得多。在那株历史的大树上，絕对沒有那“眞实”、“必然”、“前定”或“固定”的形狀。它上面也更加沒有那无数旣无規律，又无模型，又无相互間的支持与联系的千变万化的枝椏。它并不是一块荆棘野草纏繞蔓生的荒野，其中沒有任何东西引向任何方向，而任何东西都可能在任何处所生长。

第八章　偶然和意外

事物的相对尺寸决定于配景。山谷中，鋸掉树干的橡树根和那参天矗立的枫树对比起来，尺寸相差悬殊。但如从高山頂上对之远眺，則二者似乎一般高。同样，当我們从远距离的年代来观察一个民族的命运时，許多重大事情都被忽視，而伟人和細民間的差别也就微乎其微了。

如果有人問：观察历史的时候，适当的配景法应該怎样？一年、十年、百年还是千年？我們必須这样回答：独立于某一具体問題的"适当的"配景法是沒有的。問題的提出就已經預先假定：把我們的探討限于一个固定的时間跨度之內。如果是为了比較分析，要对整个文化作一可理解的叙述，我們也可以把它加以縮写，而将杰出人物或其他偶然事件所发生的作为原因的影响完全加以忽略。但不得由此推論說：在这个文化以内的任何一定年代的历史都可以把这些因素加以忽略。

历史上的偶然事件相对于研究者的着眼点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位想把百年历史的記录加以鳥瞰的研究者来說，偶然事件的意义就显得极小；而对于一位敏感于种种可能事态和珍惜細节的研究者来說，它的意义就显得极大。如果对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我們不是用一个传記作者的眼光来看，而是从一个探索整个儿人类历史，把它和地球史、海洋史、星座史等等来加以比較的研究者来看，那便不妨用簡单公式把它加以描写。这些公式就如同中国的御史向他們年老的皇帝所說的話差不了多少，这位皇帝在登极初年，就派这些御史去探測人的"秘密"，而当皇帝临終的时候，御史向他所报告的就是說人生下来、活着、受苦，然后死了。不管某一个人的

生活細节有什么变化，他淪为乞丐，还是做了皇帝，成为武士，还是成为圣徒，御史的报告总依旧是眞的。即使把这个人的生平加以改变，他的乡土，他的时代都改变了，但在一切变化之中，仍都可以追索到这相同的模式。这样的思考对人之为人的身份来說是适当的，因为在其中，每一个人都被当作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样的。但如果我們是研究某一个特殊人物的历史，那末，这种方法便不値一錢了，除非所說的故事是要我們相信他不止是一个通常的人。

打个譬喻，如果我們为了替人类各族的社会史繪制图形，用弯脚规来測量以千年計的时間跨度而加以比較，那末，从这样的配景法上，我們除了說：它們之間也有着这共同模式或命运之外，还能再多說些什么呢？它們是产生了，長得多少更加壮实了，又衰微了和消失了。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它們延續的年代会长些。在一个明智的政府之下，它們的成員的生活会过得稍好些。在一个信仰宗教的政府之下，它們的成員大多数是在香烟繚繞之中終其一生，或者是作为异教徒而死在火刑柱上。但它們之間的发展过程都是大体相似的——不問它是希腊和波斯，罗馬和耶路撒冷，还是薩拉丁和理查一世的社会等等。如果这些就是我們能够从維科（Vico）、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湯因比（Toynbee）等人的循环論当中找到的智慧，那末，这些人的著作就不値一讀，光靠传道书也就够了。

如果把各种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或是試图在它們的整体上来加以解释，这种門道对于我們研究历史是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启示的。用直觉的方法把各个文化看作"意义的独特总体"，也絕不能够了解关于文化的任何东西。我們要进一步地理解历史就得把各种文化各自的內部联系、或是异类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問題分离出来；就得对于一种文化之內所发现的各种制度，研究它們的結构上的互相关系和时間上的依赖关系；并且指示出来：一种文化的各个固定方面或各項变迁是怎样受到人类的非文化环境种种特征的限制和决定。如果有人要求把希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或者是要求解释美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那末，他是否了解他的意

思，或者是：他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这都是很够令人怀疑的。为了要有历史的意义，对于各种文化所主张的齐一性必須超出那种不适当的比喻——即指生长、成熟、和消灭的循环——之外，而把它推广到：各种特殊的机械結构、各种控制性的条件，以及按关系的輕重深浅而排列起来的原因性影响——一句話，要照顾到那日新又新的經驗之循环往复的各个方面。因为只有在这种經驗的基础之上，我們才能明智地作預測和行动。

但这时，我們上文所談那些偶然的、独特的、个别的和新奇的等等事物又将如何呢？这些东西是否会从我們的理解之网的网眼中漏了出去呢？每当我們用一般关系、职能、原因等等〔概念〕来解释一桩特殊历史事件时，它的“历史性”是否便会消失呢？这些問題曾經引起人們的热烈爭論，但部分困难是由于“偶然”这个辞語含义模糊。在某种意味上說，所謂偶然就是一种被給与的、或被发现的事物，它的存在在邏輯上不是必然的；而它的不存在，在邏輯上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說：任何存在于世間的东西沒有不是偶然的，連那描述偶然事件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规律也不能例外。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則所謂偶然乃是不发生关系的意思。一旦我們在各組事物之間发现了一項互相联系的規律，那末，从这个規律的角度上来看，凡与此无关的现象都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假定“其他事件与此无关”，我們也就不能发现任何描述某些事物的行为的規律。在第三种意义上（这是第二种意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一个事件是作为两个事变系列的交叉点而发现的，而这两个事变系列又得分别由两种互不相关的規律来加以描述的話，那末，这个事件就是偶然的。①

就这个辞語的主要意义来說，我們可以承认：每一个事件之中都存在着偶然性，但不能由此推論說：这个事件的任何方面都是偶然的

---

① 参閱珂痕：《理性与自然》，1932年紐約英文版，第151—152頁。并参考庫尔諾：《关于现时代中观念与事件的进程的考虑》，第1卷法文版，第1—15頁。

或新奇的。就这个辞語的次要意义来說，我們可以合理地做这样的預测：一个事件本来将会作为一系列若干前在事件的后果而发生的，但由于另一系列其他事件中途插足进来，因而所期望发生的結果竟然变了样子（这就是一个或好或坏的"意外"）。

历史学家，平时浸沉在历史事件的丰富細节之中，由于天天生活在那不可預料的偶然氛围之中，因而眼光短浅，往往会把偶然因素加以过分夸大，以致历史对于他們就好象只不过是一个純粹意外的故事而别无其他。无論是伟人，还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显得是偶然的，因此，他們对于伟人的估价和那极端的决定論者不相上下，两者都认为伟人在历史上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結果，在任何一定的时期，一个特殊的个人，究竟能够发生什么特殊的历史影响——这个問題，在他們看来，是几乎不能陈說的。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从另一个偶然事件产生的，誰又能說它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为什么这样发展的理由呢？这样的历史学家沒有分清以下三件不同的事：(1)一个事件的絕对新奇的方面是不能理解也不能預测的这样一个同語反复；(2)事件之間的相互关系是那么复杂，人們对此无法加以可理解的說明和預测——这样一种见解；和(3)偶然事件仅只因为存在着其他的非偶然事件才能够发生历史影响——这样一种见解。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历史著作，其中有一段頗为著名的話。这段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一位实践的历史学家所能合法地认識到的齐一性，不过是"偶然与意外的作用"而已。

> "可是，有一种理智上的刺激向我提出了抗議。比我更聪明和更有学問的人，在历史上看出来了一种計划、一种节奏、一种前定的模式。这些和諧对于我是隐藏着的。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事变跟随着另一个事变，有如后浪催前浪。只有一桩大事，而既然那是独一无二的，我們就对它不能做任何的概括。对于历史学家来說，只有一条规律是有把握的：在人类命运的发展之中，所能认識到的只有那偶然和意外的作用。这并不是什么犬

儒主义或絕望的学說……”。①

这段話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那样广泛地为人所主张，因此值得更深一步地加以研究。如他所坚持的见解，其中頗有些曖昧含糊之处。如果这段話的意思是表明：斐歇尔先生不相信那种神学的決定論（如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等等），或者那种目的性的理想主义（如黑格尔和辯証唯物主义的），那末，沒有哪一个关心科学的历史学的人会对此提出反对的。可是那所謂“后浪催前浪”的紧相跟随的事件，其間的确暗示着某种节奏的存在，而那是和所謂計划的意义，或所謂前定模式的目的性怎样也是不同的。尽管一件东西可能是独一不二的，——例如我們的地球——但总还有許多的概括可以正确地适用在它身上。但作者的基本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可是錯誤的。他所强調的那“一桩”大事——即偶然性，絕不比另外一桩大事更为重要或更为根本的——即偶然性在人間事务当中所受的限制。

因果的鏈环沒有严格的必然性，不过我們可以当它十有八九是靠得住的，而且它的可靠性往往还不只十有八九。例如，把技术引进一种文化之中，則一系列的后果会随之而来——由軍备工业的建立到政治的集中化——尽管这种文化对于和技术結合在一起的外来的种种价值怀着敌意。对于一个战敗的敌国加以侮辱而不把它的重整軍备的潜力加以彻底的破坏，則另一次战爭将会在下一个世代里发生。假如一个国家漸变富饒，并更加爱好和平，而邻国則仍旧淪于貧困飢寒，但拥有很好的軍备，則一旦有所借口时，这个繁荣的国家就会受后者的侵略。如果发动內战的一方，只打防御战，迟早是要失敗的。鼓动起来一次总罢工，而不于事先规定罢工的期限，那是一定要失敗的。假如一个民主的团体和一个紀律严格的集权的团体結成統一战綫，而那个集权的团体坚持鼓吹自己的政綱，那末，这个民主团体不是組織遭到破坏，就一定会受到对手方的愚弄，被利用去达到和它原来的民主性意图格格不入的目的。

---

① 斐歇尔：《欧洲史》第1卷，1935年伦敦英文版，第7頁。

当然，每一种情况之間，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个不同。我們常說的：能够对于两种情况加以区别，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但我們不必停止在这个同語反复上，而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們可以承认：偶然和意外事件，从外插入到預期的模式中来的突然发生的事件，几乎不变地总是要露头的。不过，对于我們从自己以往的行为中能詳細准确地看出来的灾难，絕不能指望靠这种偶然或意外来加以防备。我們能够断定某些事情总会发生，但不一定是在适当的处所发生。关于偶然和意外的眞正独特的特点就是：总能加以預測，但决不能指靠它。

偶然事件的历史影响虽然是千变万化的，但却要受某种历史规律的制約，这是上举著者所承认而在那本书中到处都表达出来的。事实上，我很少遇到任何一种历史著作，象这本书那样处处布满了有关偶然和意外事件可能在其中发生的限制范围的种种"規律"和"概括"，这些規律和概括的正确性有的地方是頗成問題的。下文将把它加以引証，但不是因为我們承认这些規律和概括是眞的，而是为了說明：斐歇尔先生，为了构成一篇可以理解的故事，不得不相信它們是眞的；或者，与之相类的某些东西是眞的。

关于早期希腊移民的定期侵略，著者告訴我們說："借战爭或劫掠的办法搜寻給养乃是这个社会的农业和牧畜业一个必要的补充措施。与其說那是犯罪，不如說那是国民經济的一部分。人为了活着必須吃飯。假如不幸收成歉短，他必得去偸盜、战斗、或者向外移民。"关于罗馬的扩张政策，著者写道："罗馬連續地征服意大利，那是迫不得已，因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受到强暴邻国的环伺，总得要在她的边界綫上来建立和平和确保安全——正如后来英国在印度取得的經驗。"关于这种扩张政策，后来对于罗馬人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著者写道："由于对非洲、亚洲、馬其頓和希腊广泛地进行掠夺所給予罗馬人性格恶劣的影响，那是突然获得財富对于本来无此心理准备的人心中总是会发生的恶劣影响。"

斐歇尔先生既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經济决定

論者，但他对于政治經济学上的种种规律却有着那样坚强的信念，竟认为这些规律对于历史偶然性的整个儿領域有着絕大的支配力。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历史上最聪明的皇帝之一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了一道命令要把罗馬全国的物价加以规定，結果却发现（正如他以后历史上許多人所发现的）：并非世界上的一切法律或懲罰都能禁止人們在市场上賤买貴卖。”在戴克里先那个时代是眞的事情，过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后，在黑死病发生过后的英国也是眞的：“英国的議会要求全国劳动者和手艺人拥护旧时的工資率，并且禁止他們随便在乡村之間迁徙。政治經济学如同大自然一样，尽管可以加以人为的驅迫，但迟早总是要回头的。爱德华議会的立法要想遏止一个札根于当时經济必然性中的历史过程是办不到的。”①

象“必要”、“迫不得已”、“总得要”、“必須”以及“不能”等等措辞，絕不是适用于偶然性的語言，更不必說下面那种馳騁文笔的辞藻了，在其中宣布了苏拉对于罗馬元老院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注定要失敗的，因为“不論是苏拉，还是其他什么人絕不能干象抵挡天上星辰的运行那样的事。”

偶然事件究竟会在什么范围内发生，固然受历史关系之网所决定，但历史关系之网也会遭到每一个偶然事件的破坏。这里，我們所需辯明的不过是：网是常被破坏的，而伟人就可能是使它遭受破坏的偶然现象之一。

試来考察一下任何历史学家的著作，只要是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而牺牲了偶然性所受的种种限制，那末，这里对于裴歇尔先生所論証的，也很容易适用在他們身上。

* * *

上文已然談过：历史上的“如果”問題具有科学的意义。同样，也能够說明：这些“如果”問題指出了一件具有非常重大道德意义和

---

① 这些引証都采自裴歇尔《欧洲史》第1卷，第18，62，64，93，320各頁。所有重点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社会意义的事实。历史上的必然性，正如同与之連續的自然界的必然性一样，二者都具有束縛力，只是不具有邏輯上的强制性。历史上的必然性所以区别于自然界必然性的地方就在于：它們部分地还具有目的性。它們包含着一种意义，牵連到人們所认为“有价値的”、或“可取的”东西。

当我們說：奴隶制度的废除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說：“打破私人垄断的限制以便解放生产力”——这一理想具有社会的必然性时，那至少包含着以下两点意义：第一，当“人”出现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时候，我們对于他所具有的生物学上和心理学上的特性必須立定若干假設。人类行为的种种特性应該看做是个相对不变的因素，其一般的特征是相同的，但和自然科学上所研究的种种性能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专題范围。

第二，它还得参考那个时代的人間种种价値和种种偏爱之間的秩序，参考善恶之間的选擇；并参考如何对待既定环境的策略。这些个秩序、选擇和策略本身可能是习惯、教育和传統等等所发生的預料得到的結果。但他們旣属自愿的，那就也可能是理智上反复思考的后果——亦即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的决定。这个自由的决定能够减少未来的冒险，但絕不能把它完全排除。如果象韓斯·萊辛巴哈（Hans Reichenbach）所暗示过的：我們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啻是針对着可能的失望而押的賭注，那么，理智的方法也就不外是一种如何增加我方贏得的分数的办法。

历史上的許多可能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出乎人力控制之外的。在那决定性的事件最后宣判人們处于天堂地獄之間的不确定地位之前，为了实现这些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人們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頗难逆睹的問題。我們为了1933年罗斯福总統的被刺未中而感到欣喜，同时，我們也悲叹1923年慕尼黑兵变中，希特勒遭到德国国防軍的連珠射击而竟得脫逃。以上两个例子当中，行刺命中的有根据的可能性，使得我們深切地感到一切历史过程的异常复杂，同时也使我們更强烈地感到人們对于它的无能为力。若能于适当时机

随时記得那出乎人力控制之外、但确有所根据的客观可能性，便有可能緩和那理論家的严格公式，并且遏止那实行家的自然而然的独断主义。对于这些可能性加以适当的考慮，可以增强我們的防御能力，以便避免那恶运和机会所加于人們身上的失敗痛苦。

不过正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有些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是人們所能够掌握的。它們乃是眞正失掉了的机会，因为它們本身有着实现的可能。人們所以失掉时机是由于他們沒能更有理智些，更勇敢些，或更决断些——有时則因为每个因素多了一点。

理智和意志的取得胜利永远不会违反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它們的作用不过是刺激人們身心上本来具有的那些无可怀疑的潜力，使之能够更好地迎合这些必然性而已。理智和意志，由于本身的努力就能給人們提供若干有利条件，以便把可能变为现实。当我們說："回顾起来，那不可能的事竟告完成了"——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历史上最沉痛的悲剧，莫过于人們喊叫"不可能"喊得太早，并且由于眼光短浅，沒能及时充分发揮本身潜力。人們的美德和罪恶都不仅是触媒。这些美德和罪恶能够成为有力的历史力量（而且实际上也曾經是如此）—— 但这一事实并不否定社会决定論的任何明智的想法。

历史的道德責任就在于恰当地理解当前种种的"如果"和"可能"的問題，以便在那可以預測的种种后果的光照下，选擇前进的道路。即使我們已經做了明智的选擇和勇敢的奋斗，有时还是会遭受失敗的。在这种场合，后悔总是白費的，比較聪明的办法还是暫时退却，同时，千万不要向敌人的理想妥协，以便等待新时机的到来。但理智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总归比那动摇不定和时作时輟的努力更容易贏得胜利。假如有什么于一切历史时期都能适用有效的道德命令的話，那就是求知与行动。

以上的考慮对于现阶段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关系。每当我們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总能够看得出：由于以往失掉了的机会而招致的种种致命的后果。例如，1914 年 8 月間，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运

动沒有抓住时机来制止世界大战，而这一事实，正如当时所料，可能会引起更可怕的战爭。克伦斯基和民主社会主义集团，失掉了实现他們党正式的但未公布的政綱的机会，正如切尔諾夫（Chernov）所揭露的，这个未公布的政綱內容是：号召停战，把土地分配給农民以及其他等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后来布尔什維克所鼓吹的做为强制实行少数独裁的准备步驟。魏瑪共和国失掉了破坏那保皇反动党团的机会，而沒有这些反动党团的帮助，希特勒是不会当政的。西欧各国政府和美国失掉了机会来援助那得到合法承认的西班牙国家，以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侵略，以致在和法西斯主义作不可避免的摊牌的时候，不能贏得大陆方面的一个积极同盟国，而仅仅得到一个敌对的中立。

失掉了机会的后果很少会完全杜塞起今后供选擇的道路，但却能把选擇的范围弄窄，而仅仅剩下来若干比起更早的那些可能性来相对地不利的道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凡尔賽会議当中失掉了履行諾言的机会，但当今反法西斯战爭的理由却不是由于威尔逊主义复苏的反响。其理由勿宁是：失败于軸心国家之手会带来籠罩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以及那不忍言說的野蛮和墮落，而胜利的获得則意味着得以残存，并可得到再一次的机会。得到再一次的机会来解决我們这个时代的基本問題——如何把那走向計划經济的經济趋势和那民主的价值及技术，加以融合。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民主的存活，以及另一个机会，——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严酷的选擇。

第九章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

以上各章我們使用“英雄”这个字眼儿是根据日常习惯采用了那比較广泛而曖昧的意义。而目前則有必要使它充分明确，以便对下文即将展开的論点能作某种考核。

但在进一步討論我們的主題所系的主要区别以前，这里先把上面几章暗示过的几个次要的区别引述一下，还是会对于討論的进行有些帮助的。首先須得把历史上行动方面的英雄人物和思想方面的英雄人物分开。但是一般对于“伟大”人物或“杰出”人物的通俗評价則很少作这个区别。例如，喀德尔(J. McKeen. Cattell)对于西洋历史上杰出人物所做的那个有名的考察，在一千位英雄的名单当中，居首的十位英雄是：拿破仑、莎士比亚、穆哈默得、伏尔泰、培根、亚里斯多德、歌德、愷撒、路德和柏拉图。①但根据历史事变的实录来考虑的話，其中只有四位可以称得起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候选者。沒有人能够强辞夺理地主张：莎士比亚对于决定性历史事变的出现或不出现有着任何影响。这样說并非否认：思想方面的英雄同时也能成为行动方面的伟人，也非否认：他們思想的后果（譬如說发明家、宗教領袖和社会哲学家等）可能对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但在我們品評他們的主张时，还得轉而面向历史事变的实录。就古代史来說，亚历山大的名字并未见于上引名单之上，但眞正以历史英雄的面貌出现

① 見«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第62卷(1903年)，第359頁。此項研究是以若干标准的传記辞典和百科全书对于一千个历史杰出人物所指定的相对地位为根据的。

的，与其說是亚里斯多德，不如說是亚历山大。而只有当我們能够証明：确是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对于亚历山大的开創帝国有所鼓励和启发时，然后才能把亚里斯多德联系到英雄事业上来考虑。

第二，我們还得承认历史上的人物有这样的区别：一些是著名人物，是那些能够取得人們信仰的人，另一些个人虽然影响了历史事变，但沒有赢得伟大著名的声望。而在历史意义和历史上的声望之間并沒有什么靠得住的联系，历史意义是以某人的行动对于事变发生的影响来衡量，而声望則仅仅根据于人們的欢呼与贊頌。所以，当我們研究某个人物时，与其根据：人名簿、标准著作叙述此人事迹所占頁数，以及援引的頻度等等，还不如根据科学历史家对他的判断来得更为可靠些，因为科学的历史家是研究特殊的因果联系的，而前面几种根据則大大受到风格、形象生动性的要求，以及成见等等的影响，而很少根据眞正的科学探索。尤其在今天，任何"头面"人物都有可能被塑造成"英雄"。1916—1933年之間，无疑地，兴登堡(Hindenburg)是德国最知名的人物，但我們却不难提出至少半打以上的人物，对于这时的德国历史(包括軍事史在內)有过更大的影响。

最后，我們还得把道德上值得重視的人物排除于英雄的概念之外，这并非因为道德判断不适用于历史，而是因为历史上許許多多事情都是坏人做出来的。这里，我們最关切的問題是历史的創造，而不問創造得或好或坏，是福是灾。

所謂历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样一个人：在决定某一問題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而我們有充分理由把这样的影响归因于他，因为如果沒有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行动不象实际那样的話，則这一問題或事件的种种后果将会完全两样。有时，人們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对于任何問題、事件或后果等等的"重要性"，并无普遍一致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究竟印度是否保持自由，究竟战争是胜是敗，或者，究竟将来世界局势是民主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对于他們来說都是不"重要"的。但所有这些意见，对这个問題都是无关实质的。不管你把什么东西看做重要的，这問題总是不可避免的。是否

不管什么人在这个事件当中起着領导作用，而你所认为重要的事件横竖总得发生？还是应該这样說：对于那个重要問題或事件的出现与不出现，某人負着主要責任——而这样說总会是眞的？

这問題就引导到那个关鍵性的区別。那也就是：历史上，作为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①看待的英雄和作为事变創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看待的英雄，二者有所不同。所謂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沒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所謂事变創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这个区別試图正确对待那个一般的信仰，即英雄的伟大不仅要凭他的所做所为如何，而且要凭他这个人本身如何。从这里开始，除非另有說明，我們所謂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創造性人物而言。

历史上仅属事变性的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比做那个以手指堵住潰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兰儿童。我們几乎可以举出任何儿童在那种情况下都能做到同样事情——这样說，并不致于剝夺了这个故事的吸人魅力。所需全部条件不过是：一个儿童、一只手指和恰恰經过这里的幸运机会。不錯，这个事件本身关乎全城人的生命，意义非常重大。正如一个住在珍珠港的荷兰儿童，假如及时报警也可能救出全部舰队一样。不过，为了应付当时局势而需要的种种性质則是頗为平常的类型。打个比方，这里的情况就是某人碰上了成为伟大的机会，正如同某人偶然碰上了可以用来贖回整个城池的宝藏一样。可是，所謂伟大却必須包含着某种非凡的才能，而不仅是某人适逢其会地降生，并置身于某一个恰好的地点和幸运的时刻。

按照英国历史家吉朋(Gibbon)所說，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于313年，把他自己的身份由"护教者"一变而成为教会的"改宗

---

① 我的这个辞儿得自查理海尔先生(Charles Haer)，但本书論点完全由著者負責，与海尔先生无关。

者”。① 前期罗馬对于基督教政策的轉变，以及罗馬帝国的官方首脑公开采用这种政策是西欧发展史上稀有的重大事件。但究竟君士坦丁的哪一种特殊的个性使他会有这个轉变，那还是个大有爭論的問題。而从他的任何一点特殊个性来說，至多也不过是个能抓住主要机会的政治家而已。不管他对宗教怎样虔誠，还是不足以阻止他自己借口莫須有的罪过而杀害了他的亲生儿子。不論几百年之后，基督教是否会轉变成为官方宗教，不論这种轉变是在什么不同的情況下发生，或者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論如果沒有君士坦丁，罗馬帝国是否就不会取得神圣的称号，君士坦丁之为一个事变性人物，那是完全跟这些因素无关的。因此，虽然君士坦丁的行动，对于他那个时代带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非一个英雄。他所以贏得伟大的称号还得感謝那感恩的基督徒少数派对他的推崇。而他后来对于教会事务的干涉，則使得他們对于他的伟大不得不再加以斟酌。

虽然历史上沒有任何証据足以說明罗馬的其他帝王也会援助基督教而使它取得这个新的地位，但这件事的实现却是非常容易的。那就因为基督教的发展成熟，皇帝在罗馬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传統信仰的沒落(試看当时沒有任何人提出强烈的、狂热的反对意见就足以說明这一点)等等因素都会导致基督教的采用成为客观上的可能，但这既不是一个社会上的必然，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必然。而君士坦丁則根据种种帝国的理由而促成了改宗基督教的事业。② 不过我們与其相信他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而利用教会作为实现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还不如相信他是打算嗾使异教和基督教之間发生斗爭以获得漁人之利有更多理由。在君士坦丁以及他的事业之后，并正因为他的事业，企图恢复异端宗教的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敗了。如果有人說朱理安皇帝 (Emperor Julian) 可能在剝夺基督教的特权地位上

① 参看爱德华·吉朋:《罗馬帝国衰亡史》第1卷，现代丛书出版社英文版，第636頁。

② 参看科克蓝:《基督教与古典文化》，1940年牛津英文版，第211頁。

获得成功，那是十分靠不住的，尽管他有卓异的才能和甚至正好遇上了一个成熟的时机。可是，朱理安在作为君士坦丁的一个继承人上——即在把基督教降格为和其他教派平等竞爭的一个教派这件事上——虽然失敗了，但〔假定他生在君士坦丁的同时〕，他还是很容易成为君士坦丁的替身的。因此，必得把君士坦丁看做一个事变性人物，而不是一个事变創造性的人物。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都出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早先的事变方向已經給他們的活动准备下了可能的条件。他們之間的区别是：在事变性人物的场合，条件的准备是在一个很高的阶段。为了做到那决定性的选擇，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比較簡单的行动——一道命令、一个法案、或一个常識上的决定。他也可能把他的任务"错失"，或者被别人中途篡夺了去。但即使他沒有失敗的話，那也不足以証明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他的功过是根据他的行动后果究竟給人們带来幸福还是祸灾而断定的，而不是根据他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

另一方面，那事变創造性人物，虽然也一样在历史路綫上找到了一个交叉点，但他却还可以說帮助創造了这个交叉点。他不但具有种种非常的天才，而且在实现他所选擇的历史路綫上，发揮了他的特异的天才，增加了成功的机会。象愷撒、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等等人物，至少至少也得从他們政敌的手中打开一条出路，而在这样做时，发揮了他們特异的領袖天才。正是那作为事变創造性人物看待的英雄把他們的个性积极的烙印加盖在历史上面——一直到他們从历史舞台上消逝以后，这个烙印还依然明显可见。至于那仅仅是事变性的人物（例如那以手指杜塞潰堤穴隙或发射引起战爭的第一顆枪弹的人）则极少能够了解他所面临的历史选擇路綫是什么性质，或者他的行动所导致的一連串事变是什么性质。

在概念分析上，于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之間做分明的区别是容易的，但很少历史人物能够恰如其分地分别归入两类之中。究竟人类历史上某一特殊的英雄人物，就某些重大事变而言，是应該

算做事变創造性人物，还是仅属幸运的〔事变性人物〕——这种精細的工作必須让給历史学家去做。按照上文对于二者所作的区别来下定义的类别，不是不包含分子的空类，这就事变性人物而言，已表现得很清楚了，就事变創造性人物而言，則以下将来加以确証。至于这些类别究竟是否可以按两类共有的性质的各种組合或按程度来处理，那还是頗为可疑的。不过同一个历史人物，在第一方面应該归入事变性人物，在第二方面应該归入事变創造性人物，而第三方面則两类都归入不了——这却极有可能。

千万不要因此便认为以上方法就是品評个人在历史上重要意义可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因为他們影响的性质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而方式之多，不啻无数細流汇聚起来成为难以分辨的一个洪流，而同时影响的方式又是那么間接又間接，以致难于追索它們的来龙去脉。

湯姆士·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对于美国生活和美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无論把他們归入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类都觉很难确定，而可能不恰当。杰斐逊的希望是当他逝世以后，人們把他紀念成为："独立宣言的撰著者、維基尼阿宗教自由规章的起草人，和維基尼阿大学之父。"可是，不管分开也罢，合起来也罢，这些成就都不足以說明他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或是一个事变創造性人物。誠然，如果不是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則当代民主主义的辞藻也許会是完全两样的，但他的那种巧妙的措辞所表现出来的眼光和信仰却是和他同时代杰出人物所共同的（他只是其中之一）。至于宗教自由的规章，那不过是各州早已酝酿起来的宗教宽容运动的一种正式表现。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前途，在杰斐逊以前老早就已有了一个突出的前兆了，当然很难說是他对此給予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頗为奇特的，从狭义的历史活动的观点来看，我們为了搜寻杰斐逊所以成为事变創造性人物的証据，却須到他自己不那么重視的事件上去找。这就指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贖买事件，而他正是这

方面的鼓动人物。他是在人們的激烈反对声中来推进这个事业的。如果胆量稍小的人也許就被吓住了。而这块地方当时属于法国主权，如果不是从拿破仑手中把它取过来，那末，最晚到維也納会議时，英国也許就要取得这块領土的继承权。而如果沒有路易斯安那州这块地方(連同靠它提供入口的西部各地)，則美国可能至今还是局限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国家。那时，她的政治史和經济史就都会和现有的完全两样了。我們很难保証:除了杰斐逊而外,还能有其他任何在职总統能有那样的眼光与魄力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把异国势力和潜在敌人从边疆上驅逐出去，同时把美国国旗下的領土增加了一倍以上。但不管我們在美国領土的扩张上怎样評价杰斐逊的功劳，而他作为一个人物和思想家，以及作为一个在美国文化上具有历史力量的角色,却都不决定于此。除了那些我們叫做一个民主社会中的历史"英雄"的人而外,别的人在这方面也有施展的余地。①

那末，对于那些享有巨大政治权力而他們統治下的朝代尽管表面上显着平安无事,却以和平与繁荣著称的历史人物,我們又将怎样評价呢？这种类型的局势正是伍德所最为关心，而他又过于輕易将其归功于少数統治人物。究竟何时能够归功于这些統治人物，何时不能？而如果归功于他們的話，得在如何情况下才能把他們看做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人物？这里准备援引罗馬史上可以叫做黃金时代的一个时期作为例証来加以說明。

吉朋认为下面这个判断应該加以深思熟虑：即在奥古斯都王朝之后，所有欧洲各民族的幸福都"决定于某一个人的个性"——也就是說:决定于不論哪个碰巧做了罗馬皇帝的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民能够在国民經济的間隙中找到生活和避难之所，以上情况似乎很难发生。不过我們若是从罗馬皇帝所发揮的那种无限权力来着眼(不問它的結果好坏)，便不难体会到在吉朋的夸张背后确有某些眞理。可是，就历史而論，罗馬帝国史上最为平安无事的时期(是說从

① 参閱本书第十一章。

战争、宫廷革命、蛮族的侵入等等方面来判断的)要算是基督紀元第二世紀两代安东宁、即庇护(Pius)和馬可(Marcus)当政时期的四十二年。吉朋用一种异乎英国人的热情与潇洒叙述了他們的联合統治。他說:“这可能算是历史上唯一的时期——那时政府是以增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幸福为其唯一目的。”而且那不仅是政府的目的，并且还是它治理的結果呢！他用了任何著名的历史学家沒有用过的最最极端的笔調說:“假如有人要我来确定世界史上究竟哪一个时期可算是人民生活情况最为繁荣和幸福的时期，我将毫无犹疑地指出：那是从杜密善(Domitian)逝世到康茂德(Commodus)即位为止的这个期間。”①

这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和平安无事的——时期。乍一看，好象我們的范畴对于这一期間不能适用。当历史上平安无事，或者很少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沒有什么招致产生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人物的原因。可是只要吉朋(关于上举两代安东宁皇帝)所說的話有一点儿是眞的，我們便不得不感觉到:这两个統治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正不下于那扩大罗馬疆土，制定罗馬法典、和改变罗馬宗教的各个皇帝。但如果我們的这种感觉确有道理的話，那一定得以吉朋所暗含的那种信念为根据：就是說，一个时代当中的秩序、平静、和繁荣是那个朝代的专制君主采取的种种政策的后果。也就是說，是他們阻挡了那否則就会发生的悲惨事件。假如象吉朋所做的那样，我們要让罗馬皇帝对于他們朝代当中的罪恶、愚蠢和不幸負責的話，我們也得把当时的和平、明智和福利算在他們的帐上。尽管他們的生活传記讀起来并不象尼祿(Nero)、加利古拉(Caligula)、康茂德等人的历史那样有趣。

---

① 参看《罗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70頁。他那著名的对于历史的評論即是与此有关的。他对于第一代安东宁評論道:“他的朝代的显著特点就是供給我們以极稀少的史料。而这也可說是这个朝代的特殊优越之点，因为所謂历史，不过是人类罪恶、愚蠢和不幸的紀录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吉朋本人并不以这样一个悲观的历史概念当做他躬行实践的标准。也就是說，他的历史所紀录的，远远超乎这些之外。

由于吉朋无意識地沉溺于英雄史观的緣故，究竟罗馬皇帝是否象他想象的那样，对于当时国家的景况应該負責，那还是值得爭論的。后来的历史学家大概都认为：罗馬的历史和当时人民的幸福，与其用罗馬皇帝的个性来解释，还不如用罗馬农业的情况来解释或許更为合理些。但是这一問題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关鍵之点乃是：一个期間的平安无事——亦即它的繁荣——或者是統治人物采取政策的后果；或者是社会經济条件（連同其他因素）导致的結果，而当时的社会經济发展未曾受到这种政策的值得重視的影响。而在第一个场合，对于当时的政策負責的人物，可以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或者是一个事变創造性人物，这决定于对当时情势的分析。而在第二个场合，用不着引进什么英雄人物（不問是上举哪一类）就能正确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只要是政治活动可能对于一个时代的繁荣发生影响的話，那末，正如吉朋所說，那两位安东宁皇帝可能对罗馬史上这一个幸福的插曲阶段負有很大的責任。但一个时代的繁荣，它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充分証据来保証人們可以推論到当时的政治領导。沒有任何历史学家能够合理地主张：战后时期美国的繁荣应該归功于哈定(Harding)和柯立芝(Coolidge)的領导。

我們說：事变性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創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緣凑巧的結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或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問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問題，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有什么影响。例如，法国革命期間，公安委員会的各个成員，作为一个集团来說，就是一些事变性人物。其中只有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St. Just)可算是事变創造性人物。为什么？就因为他俩对于路易十六世废黜后存亡攸关的問題比別人知道得都更透徹。連拿破仑自己也相信：如果罗伯斯庇尔仍然当权的話，法国的社会秩序将会安定下来，共和国政府将照常进行执政，而拿破仑就不可能篡夺政权。但罗伯斯庇尔的行为也为他自己掘了陷阱，而且尽管在政治上也曾动員一切力量来为他恢复名誉，結果还是促成了法兰西共和国

的崩潰。对于那超越了国防和公安上的利益所需范围而推行起来的恐怖政策，他和圣鞠斯特伙同一起是应該对之負責的。①

虽然罗伯斯庇尔对于那不分青紅皂白地判处罪状以及司法上的阴謀等等野蛮的过激行为也是不同意的，但正是他自己的政策为这些过激行为准备了条件。这种恐怖政策（在罗伯斯庇尔同意的范围內）并未能把法国从反革命的火焰中拯救出来，反而不啻火上浇油。正因为这种恐怖气氛籠罩了千百万眞正反对专制主义的法国人，因而拿破仑才得輕易把政权篡夺到手。罗伯斯庇尔的一种附带的特异之点就是爱把罪状妄加于他的反对者，誣之为領受英国津貼的特务，連那絕非特务的丹敦(Danton)和克劳兹（Anarchisis Cloots）也不能幸免——他这举动为后来的俄国革命做了一个便于模仿的榜样。罗伯斯庇尔甚至荒謬地說："共和国对于它的敌人什么也不欠，只欠貸以一死。"当他开始把自己的敌人看成共和国的敌人时，那对于历史是会发生致命作用的。

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影响——这其間是不成比例的。我們如举查士丁尼皇帝的个性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做为說明，那是再恰当也沒有了。在他的朝代当中，种种伟大的軍事成就（那是由貝利撒留〔Belisarius〕贏得的），罗馬法典的編纂，雅典各哲学学校的封閉，他对于神学事务的干涉，他的宏伟的建筑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于欧洲文化給予了深刻影响。但是查士丁尼本人在任何一点上也不会超过一个平庸的人物。尽管他的决定动員了許多比他更有能为的人为他效劳，但他对于自己行为的目的，或者自己的决定对正在进行的事业究竟影响如何，完全沒有清楚认識。

---

① 在法国革命的恐怖当中，被处以斬刑和枪毙的人，十分之七是工人、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級。据最近的研究說明：在大約17,000个牺牲者当中，亦即于审訊后判处的人之中，工人占31$\frac{1}{4}$%，农民占28%，下层中产阶級占10$\frac{1}{2}$%。至于那当场格杀和遭受残酷的监禁待遇的50万政治犯中被杀的还不計算在上述17,000以內。参看格黎尔《法国革命期間恐怖政策的影响范围：統計說明》，1935年剑桥英文版，第166頁。

依照历史学家斐歇尔的意见，查士丁尼的最具事变性的活动就是六世紀中叶他消灭了意大利信奉异端阿里烏斯教的哥特人，其結果使得意大利半島整个儿变成荒无人烟的地区。哥特人的統治者們对于他們领土以内的正統基督教本来采取一种严格的信教宽容政策。当查士丁尼命令他手下的将軍們准备向哥特人进攻时，对方迭次乞求和平，并且情愿永远称臣納貢。但是固执的查士丁尼完全不为所动。至于他那位标致的、有影响的、比他更加聪明的爱妻，提奥都拉(Theodora)，照她平时的习惯，本有可能說服这位皇帝撤回那些将軍，但为了政治上的一些理由，她却宁愿保护其他的异端教派。于是哥特人就被彻底消灭，无有孑遺了。斐歇尔說："消灭哥特人是个极大錯誤。如果哥特人和平地保留在那里，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隆巴底人的入侵，不会有天主教的教皇国家和西方帝国的复兴，而意大利化了那样痛苦的代价才于維克多利亚女王朝代当中取得的政治統一，也許早在厄忒尔柏特(Ethelbert)朝代当中就已經达成了。①

当然，究竟这一事件是不是应該叫做"錯誤"，还要看发言者的宗教偏好如何。那些接受尼西亚会議 (Council of Nicea) 的神学观点的人也許把查士丁尼的十字軍称为幸福。但不管是錯誤也罢，幸福也罢，这一举动对于欧洲历史的确有着决定命运的作用。

* * *

这里須得考虑一下英雄和社会利益之間的关系。人們所以忽視这一問題，表面理由是他們指出了:英雄的活动不是为了迎合一个已当权阶級的需要，便是为了迎合当他的事业成功之后即将当权阶級的需要。却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即使是真的，也排除不了事实上存在的这样一个可能:不管是已当权阶級也好，还是即将当权的阶級也好，其所以需要英雄人物是因为英雄具有盖世无双的种种品质能够为他們服务。但人們往往假定这一可能已被排除掉了，而事实上他們所能确立的全部論点不过是:英雄必須注意社会利益，而且从这些

① 参看斐歇尔《欧洲史》第1卷，第131頁。

利益当中取得支持。

历史上的事变創造性人物显然不能孤立无援地完成任何事业。他必得倚靠两个集团：一个是范围較狹的，属于副官或助理之类的集团，构成英雄的一个“机关”；另外一个是范围較广的，以人民为其基础的，可以称为社会阶級的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得借助于利益的紐带和英雄系在一起，但利益的性质不同。人們往往把利益的作用設想得过于簡单，因而把事变創造性人物表现为社会利益的仆役，而认为社会所以选擇他是因为他有能力促进社会利益；而当他不发生这种作用时，便可将他加以替換。于是，便把事变創造性人物完全化为达成历史目的，或阶級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說，是达到别人目的的工具。至于他自己的目的，有何作用，則被看做无关重要的細节。誠然，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短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确属达到别人目的的工具——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但絕不能认为我們叫做事变創造性的人物也属于这一类工具。下文我們将要考虑一下：(1)英雄和为他后盾的社会阶級之間的关系；(2)英雄和他的“机关”之間的关系。

事变性人物必須倚靠一个社会阶級的支持——这一事实，在这个人物还未掌握政权以前，要比他已掌握政权而能指揮国家的强制力量和教育力量之后，还要明显。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阶級，当它发觉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或是想利用政治力量来破坏其他阶級的特权地位时，往往会做一种安排来使得那英雄人物的候选人能有发揮其所长的机会。但这位英雄也許不能把付托給他的事业完全实现。他的任务可能象是一位布吕宁(Bruening)，一位司萊赫(Schleicher)一位丰·巴本(Von Papen)，一位胡佛，一位克伦斯基，或甚至一位萊昂·勃魯姆(Leon Blum)的任务。但当他已經发揮所长，并且假定他又具有足够才干的話，正是他的成功使他能够脫离原来負責选任他的那个阶級。他也許还在为他們的利益服务，但他这样做，现在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由于他們的决定了。

事变創造性人物所以能脫离他原来服务的（实际上或推測上，因

为其服务而被选的）那个阶級而独立（超乎或反乎那个阶級而独立），是用下面各种不同的方式达成的：第一，他能够背叛选任他的那个阶級而树立其他的社会利益。他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当他准备着取得政权而进行鼓吹活动时，除了那民族的替罪羊而外，还早已就对其他阶級給予了許多諾言。既然，他总是以民族或人民的名义而讲話，他当然就能够正好利用原来支持他的那个阶級帮助传播的神話，好来为脱离这个阶級而独立的行径作辯护。第二，这个事变創造性人物实际上控制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在他掌握政权以前，往往早已享有某些軍事上的威望或权力了。第三，他借助于他的"机关"来攫得和管理种种社会职能，鎮压反对派，并且巩固軍事力量。这个机关势必尽量剪除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并把一切独立的机关拉在自己周围。事实上，正是这个"机关"使他能够利用第一、二两种办法来使他自己得以摆脱对他原来从之获得选任机会的那个阶級的依賴关系。

为了揭露这位英雄的主要靠山，我們須得留意的正是这个机关，而不是那个社会阶級。不管它是一个政党也好，一个耶穌会的宗教团体也好，一个軍事秘密顾問集团也好，这位英雄总得和它取得比鋼索还强固的联系。假如他要扮演应时人物的角色，而打算报答支持他的那个社会阶級，这个机关自然要算一个方便的工具。假如他决意脱离原来那个阶級而另辟途径，这机关的赤胆忠心更是比什么都需要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只有把那个机关变成从属于他自己的机关，然后他才能稳操胜算。那末，这是怎样办到的呢？主要就靠給予这机关的成員們以种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特权，使之能够取得十分特异的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它的成員必須能够自信称得起是元老派，尤其是每当和其他社会团体建立政治同盟的时候。他們或者取代现有的官僚机构，或者与它融和而占据一切机要地位，

但历史英雄人物如果仅仅成为他的机关的工具，就不能长久享受威权地位。因为即使他不得不依靠这个机关，但必須經常保持他自己的主人地位。怎样保持呢？就是要把这种事态显示出来：这个

机关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必須倚靠他本人的地位——他的垮台就是他們的垮台，但他們的垮台不等于他的垮台。他旣利用这个机关来使其他社会集团循規蹈矩，也利用其他社会集团对于被这个机关夺去的特权旣已馴服但又还心怀憤恨的情况来牽制这个机关。历史上的事变創造性人物就是这样巧妙地摆布他所倚靠的各个社会集团，使它們互相牽制，以便取得自由活动的机会。那就是他所以能够超出于一个社会阶級的工具，并且超出于一个土匪头目的緣故。那也就是必要时他所以能够残酷地对待他口称代表其利益的社会阶級的緣故。并且也就是他所以能够使他那个机关如意地听从他的指揮，把它倒轉一个方向而不必征求他們的同意，也不怕他們背叛的緣故。因此，他总得努力保持这个机关的圓滑运用，免致发生背离现象的任何障碍，并且在手边保有大量人才，以便随时加以替換。

于是，我們的結論便是：这位英雄如果不去迎合某些社会利益和集团利益——包括經济的、民族的、心理的等等——他就不能影响历史事变。但他在迎合它們的时候，总得时常設法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好来选擇哪些利益是要促进的，哪些利益是要压制和减弱的。大多数历史人物有关政治問題或社会問題的行动都能借助于他們为其代言的那些集团利益而加以解释。但历史上也有那样的人，对于各种社会利益的固有关系不仅要反唇相譏，而且还要采取激烈的反动行为以期彻底地改变这些固有关系。

任何历史人物所扮演的有关社会利益的特殊角色不是从他的自白中所能观察得出来的。他也許自命为某一阶級的利益服务，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可能是完全另一回事。他也許把自己看作超越于一切社会压力之上，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一特权阶級的仆役，甚至是一个卑鄙的工具。

因此，便引起了个人意識与历史行动的問題。

*　　　*　　　*

許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对于他們自己在历史上的事变性地位几乎意識不到，或者仅有一种謬誤的意識。他們总认为：自己的行动是迫

于当前局势的需要，是通过他們而导致的一种命定的結果，而不是出于志愿的行动和理智的安排，从而，就是沒有他們的行动与安排，事变进程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即使是眞正事变創造性人物如象克伦威尔和列宁也都分別把他們自己看做天意的工具，或者辯証必然性的工具。

翻过来，也有那样的历史人物，他們是降生于事变的浪潮之中，而觉得他們自己是在控制着那浪潮的方向。或自命为对于某种范围以內的事变有所影响，而他們的眞实影响其实是在另一个范围之內。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实例，那就是涅微尔·张伯伦，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决定本世紀命运的风云人物。

当1938年慕尼黑条約刚刚签訂之后，尽管贊成张伯伦政策的，称頌他；反对张伯伦政策的，譴責他，但一般都是把张伯伦看做一位事变創造性人物。贊成他的人同意他本人的信念，——认为他确是从战神口中夺取了"我們时代的和平"。譴責他的人則相信：在慕尼黑之后，沒有任何西方强国能够阻止或者愿意阻止希特勒向东方进軍。至于能对当时局势做更冷靜估計的，却是为数极少极少的。

尽管我們明知慕尼黑条約沒有給我們这个时代带来和平，但它的眞正历史意义却还隐藏在曖昧之中，那要决定于我們对以下問題怎样答复：如果张伯伦和达拉第——他是勉强追随于张伯伦之后的——不是飞赴慕尼黑和希特勒讲和，而是向他送递最后通牒的話，事情将会是怎样的？在这种局面下，希特勒是否会向苏台德区进軍，正如后来他向波兰进軍一样，尽管当时俄国方面还未向他保証不开辟第二战綫？假如他果眞向苏台德区进軍，那末，在紧跟着的战争中，英法两国是否能比战争迟一年爆发时的情况建立更好的防御？当时，捷克的軍事力量是否会比經过一年所贏得的补充軍备具有更大的价值？——甚至到1939年时，那补充軍备也还是不怎么充分的。如果战争爆发在1938年，那末，在当时还广泛地主张和平的美国能加入战争以前，英国是否会遭到侵略？如果战争爆发的話，那末，英美两国的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集团和孤立主义者集团是否能够看穿

希特勒口称为那“可怜的苏台德人”(无疑，那里的德籍居民确是多于捷籍居民)的利益而着想的詭計？

由于我們手边沒有更多的資料，我們不能回答这些問題，但以下这个問題却是能够回答的：张伯伦的有条件投降是否仅仅迫于沒有准备和不可避免的摊牌而促成的一种延緩策略？这件事并不难弄清楚。假使正如张伯伦的拥护者所主张的：他的历史性决断果眞是由此而促成的，那末，他的政治家地位便大大提高了。假如这是眞的，并且假如軸心国家也因此而失敗了，历史学家便不难把张伯伦品評为那一世代中最伟大的事变創造性人物之一。但这并不是眞的。正因张伯伦一再强調和平已得到挽救，他自己就已提供了証据，說明他的决断并非以企图获得喘息时間以求加强准备为其动机。即使由于慕尼黑事件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間为最后胜利所必需，张伯伦事先也沒有做这样的打算或准备。即使借助于有利的結局，他也决非好运道的設計者，而慑于他自己的恐惧心理，和为他的自以为是所遮蔽，他最多也不过是这个好运道当中的一个幸运的偶然因素而已。即使后来自由世界的历史学家目睹1938年获得的一年喘息时間使得英国幸免于遭受法国在1940年所遭的命运，而在他們的著作当中互相道賀这一幸运事件，张伯伦的判断也还是千錯万錯的。因此，我們最多只能把他看做一个事变性人物，而絕非事变創造性人物。

究竟张伯伦的意識上对于他自己的历史作用怎样陷于幻想的錯誤，可由1938年10月6日他向英国众議院所做的令人难忘的讲演中明白地看出来。他率直地宣称：当时，究竟是战是和完全决定于他，而且仅仅决定于他，并且强調是他的决断消灭了当时战争的阴影。

“任何人，只要他象我一样，一天天地和面对面地在头脑中反复寻思：作为最后手段，还得借助于我，而且仅仅借助于我来說出那足以影响我国同胞和他們眷屬千百万人命运的‘是’和‘否’——任何人只要这样寻思，便难忘却……一个人达到我这样的年龄，处于我这样的地位，只要他的良心对于自己所做所为

問心无愧，他便会觉得任何加在他头上的詈駡都无妨置諸度外。回忆所有的那些事变，我頗为自信……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也只能这样做。我指的是：我的行动确曾防止了战爭。”

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竟能堅决自信并且公然宣称：他的祖国的命运决定于他的一句話，对此，我們只好說他是在冷静地思考吧！但比这更重要得多的是：张伯伦的政治上的天真，竟至认真地怀抱这样一种看法：那自从希特勒当权之日起就已在酝酿的战爭，却竟能由他来一手遏止！

一旦法西斯主义业已巩固了它的国内地位，那一群爱好和平的政治家无論如何努力也将制止不了战爭的爆发，因为这时战爭是由：經济需要、盲信的意識形态和强烈的沙文主义三者交織在一起的一种奇特的組合物而产生出来的。希特勒在当政以前就已不再隐瞒他的各种意图，而在他当政以后，他的每一个步驟都在显示：德国正在准备走向全面战爭的装备。这时和他談判的唯一結果，最多不过仅能取得日月历上的胜利——就是說迫使他改变时間表。这一点也可能十分重要，但是仅仅关系到战爭爆发时各国武装力量的鮮明的对比。一位政治家，他幻想借助于一个条約、一件备忘录、或者任何除了全部投降之外的让步就能使那紧张到极点而正待爆发的压力得以松弛，那不过显露出一个小城市政治家的鼠目寸光而已。

世界上往往有种局势不是任何英雄人物所能掌握的。这种局势的来临有如排山倒海的怒潮，任何潜在的事变創造性人物，或者他的徒步的追随者都无法加以遏止，虽然他們可以乘着这波浪前进而使情况有所不同。这种局势一般是发现在那长期危难和压迫之后，譬如象大革命的天翻地复情况。但也发现在两个强国争雄之时。这时，两国的处境是这样的：主要的貿易通路，它們可以通达的市场，以及原料的資源与供应尽都操纵在一个国家之手，以致任何一面或双方面都有不能安全共处的感觉。历史上許多次战爭爆发前夕的情况：由罗馬与迦太基的对立一直到德意志帝国威胁英国海权和日本企图独霸整个太平洋为止，无不如此。总而言之，每当双方面的利害关系

在心理上达到絕对对立的情势，一方面的滿足必得排除另一方面的生存，沒有任何共同利益可以作为妥协、同情和參酌的根据，这时便已到了大难临头无可幸免的局面。这种灾难向社会冲击，有如自然现象中的洪水、大火、地震、山崩将会不分智愚、不分邪正地葬埋一切。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天才人物(不論善惡)遭逢其間，能够給人們和事变带来深厚的影响，这时，他便成为一个事变創造性人物。但这种情况和这种人物究竟是否存在是頗难加以証实的。在下一章里我們将要研究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上文业已概略論述的理論观点的重大检驗。我們将要說明：在我們这个时代中，至少有一位事变創造性人物，确已重新决定了历史进程，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已影响到了地球表面上大多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活。

* * *

在我們进而証明：当今时代至少有一位事变創造性人物以前，应該稍稍談一談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到此为止，我們主要还是討論历史上具有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的男子。那末，妇女的地位又怎样呢？历史上是否无可怀疑地有过任何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的女子呢？她們总是在我們周围的，但在决定世界大势上，她們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

人們公认为最重要的四位女子是：克里奥佩特剌(Cleopatra)、提奥都拉(Theodora)、彭帕杜尔夫人、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Catherine II)。①

在历史上一切事变性的妇女之中，克里奥佩特剌要算是最带传奇式的，但她对于历史局势的影响却被大大夸张了，而她本人則成为浪漫神話的主題，而这些神話尽管不愧为伟大的詩篇，却是蹩脚的历史。自从巴斯噶(Pascal)在他所著的«思想录»(«Pensées»)上給她做了短短的評論之后，她便成为世界历史决定于鸡毛蒜皮等等瑣碎細节的永久例証。“假如克里奥佩特剌的鼻子生得短了一点，世界的

① 我們在批評普列汉諾夫的时候，已經談及彭帕杜尔夫人，这里不再贅述。

整个儿局面将会随着而完全不同。"不錯，巴斯噶的話曾經刺激人們对于历史的性质频频做了重要的思考，但他所采用的例子却是很不幸的。破坏一个动听的故事似乎是一件憾事，但真的故事也許正是同样有趣呢！

如果就我們所知有关克里奥佩特剌的事迹和时代做一个恰如其分的評价，那末，她的鼻子的长短，对于她在那更年輕的庞培、愷撒和安东尼等人身上的影响是不发生什么联系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于他們的影响，就世界历史来說，是作用极小的。不錯，她确曾給予安东尼的生活以很大的影响，但她对于罗馬帝国的历史則作用很小。愷撒无論如何总会对庞培取得胜利；屋大維(Octavian)和安东尼可能必須解决对于愷撒衣鉢的继承問題，可是即使安东尼能够避免克里奥佩特剌的誘惑，胜利的优势似乎还是操在屋大維手里。促使这几个罗馬人来到埃及的动机是由于紧急的政治斗爭以及为了当时严重的农业衰落，有必要把这块天然享有尼罗河灌溉之利的地方保持作为意大利的谷仓。虽然在埃及自然地改进了他們的机会，但即使沒有克里奥佩特剌，罗馬的历史本质上还会是一样的。

正如历史上扮演过某些角色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克里奥佩特剌对于历史的作用也是通过她对于男人的影响而达成的。而正如对于事变性男子曾經发生过影响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克里奥佩特剌所以获得成功，与其說是由于面容生得俊秀，不如說是由于她所具有的聪明、毅力和个性，以及不决定于面容或形象的一些暧昧的吸引力。她似乎是生得娇小玲瓏、标致优雅，但据传記家普卢塔克(Plutarch)告訴我們說：安东尼的妻子奥克塔維亚(Octavia)在年龄和象貌的条件上都比她胜过一筹，但安东尼竟抛弃了奥克塔維亚而热恋着她。根据我們可以利用的史料，即使克里奥佩特剌的鼻子生得更短一些，那也不会减低她的迷人魅力，因为这个变化和她的敏捷任性的脾气是更相和諧些。① 因而，巴斯噶所提出的著名問題就她对男人的影响方面便得到了解答。可是，假如她是个丑八怪的話，世界的历史是否会因之而不同呢？恐怕未必！

克里奥佩特剌并非一个馳名的妓女，而是一个具有狂妄野心的狡猾政客，她为了保持她的帝国独立而打了敗仗。如何保持帝国的势力乃是她一切政策的固定不移的原則，她对此有着至高无上的忠心，远胜于对他的任何恋人。任何能以拯救她的朝廷的人，她都情愿跟他讲恋爱。她曾抛弃了安东尼，并于阿克条姆(Actium)战役之后，哄騙得安东尼落到自杀的下扬。她曾打算勾搭屋大維，如果不是他性情非常冷淡的話，也許勾搭上了。斐累洛(Ferrero)以及其他历史家都曾暗示：她曾鼓励愷撒做那世界帝国的好梦，以便为她自己赢得寰球皇后的尊号，与愷撒并肩来治理天下。但这种說法，不见得合乎史实，因为愷撒早有政治野心，除了等待机会而外，一无所恃。克里奥佩特剌正是愷撒个人的弱点，而不是他的政治指导者。愷撒則是克里奥佩特剌的政治保护者而不是她的浪漫情人。无論如何，刺杀愷撒以及熟悉他的处境和他所受影响的人們，并无心来危害克里奥佩特剌——这是可以断言的。而当愷撒被刺身死时，她正和他同居在罗馬，假如她对于愷撒登位罗馬帝国皇帝的野心确曾有所鼓励的話，他們对于她絕不会全无举动。

正如有关克里奥佩特剌的情形一样，关于提奥都拉的事迹，我們也是得自对他怀有仇恨(或至少不予同情)的史料。不过，即使我們須得把因她触犯正教而对她怀抱恶感的那些宗教狂信者所加于她的誣蔑打个折扣的話，关于她的早期生活的主要事实还是无可怀疑的。她生于一个以表演馬戏为业的家庭，她本人是一个职业舞蹈家和演員。在拜占庭时代，那也就是另外一种职业的标志。由于她表演得下流无耻，和捧角者忒多，因而不到二十岁时，她就已成为台上台下的紅人儿了。在各省巡回表演了一个期間以后，經过一度宗教信仰上的改

① "因为她的实际的美貌，本身并非那样显著，——即是說，她的美貌并不是傾城傾国，沒有人见了她会不动心的，——而是說：如果你和她生活在一起，只要一接触到她，便会感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的风度宜人，談吐嫵媚动人，以及伴随着她的一切言行的那种个性，在在具有迷人魅力。"——引自普卢塔克原著。

变，她又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过着默默无聞的生活。究竟她怎样遇到查士丁尼皇帝，我們不清楚，只知他俩相遇时，他已到了成熟年龄。并且知道：他对她的爱情是非常深厚而純洁的。当紀元后527年，他不顾一切慣例，把她封为皇后。此后，她似乎曾和他过着一种值得作为模范的生活。她并且改邪归正，献身于善举。她所最为关心的就是贖救那些淪落风尘的妇女。据說，她曾把婚姻法和离婚法加以改革，使之有利于女方。她热心于替人做媒，并且鼓励和援助受虐待或婚姻不圓满的女子，使她們从别处寻求补救与安慰。整个儿来說，除了爱慕她的查士丁尼之外，她对于任何男性全无好感。就連查士丁尼，她也把他看做一个傻瓜。

提奥都拉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由于她握有无上威权。查士丁尼对她十分溺爱，几乎言听計从，百依百順。在一个十分残忍的宗教狂热的时代，她竟能照顾严重的异端教派，并为他們热烈地辯护，为反教者的权利而斗爭，罢免了一个教皇，使另一个教皇順从她的意旨——而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不顾查士丁尼的面子而做的，因为他自称信奉正教。她有权頒布軍事命令，干涉附庸国的內政，任免朝中高級官吏，并且平定叛乱，保卫了查士丁尼的皇位。一句話，她表现出她自己是拜占庭一系列統治者当中最为敏銳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女子，她具有迷人魅力，但据她同时代人的想法，都认为她是优雅胜过标致，而且她的胆量、聪明和敏捷給人以最深刻印象。但只有查士丁尼把她看做十全十美。“在十分重大的問題上，查士丁尼喜欢听从他这位爱妻的劝告。他贈予‘上帝配給他的这位最可敬爱的妻子’以‘最甜密的爱恋对象’的爱称。”①

尽管提奥都拉握有无上威权，但我們至多只能把她看做一位有可能成为事变創造性人物的女子。她所維护的异端教派，在她死后几乎沒有什么发展。帝国的国庫由于种种荒唐的揮霍而破产。假使她能把一位家庭主妇的节俭习慣用在皇家經济之上，她的影响可能

① 参看狄尔：《拜占庭画象記》，英譯本，1927年紐約版，第6頁。

更长远些。查士丁尼的帝国在西方崩潰，而且在东方的"蛮族"还未入侵以前，老早就一天天衰敗下去了。以提奥都拉的地位而論，她无疑能够影响查士丁尼使他先推行重新征服西方国家的政策。如果她这样做的話，天主教教皇制度在西欧所发生的作用也許会完全两样。只是根据她本来能够做到、而事实上却沒有做到的事情上，我們才把她看做一个事变創造性人物。所有她的积极成就对以后历史很少有什么影响。

在现代的事变性妇女当中，最为突出的也許要算叶卡特琳娜二世——这位"属于德国血統，而受有法国文化教养的俄国女皇"。由于她和其他事变性的君主(如象腓特烈二世)处于同一时代，而且資产阶級革命的风暴早已在西方发生，所以她的影响是很难估計的。不过不管怎样說吧，应由她主要負責的那种种业績都足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她的努力，俄国才能在西欧政治史上留下了一个羽毛丰滿而为时长久的影响。我們在考虑几个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是不能把她置之度外的。馬克思曾說，俄国对于十九世紀期間西欧的革命发展有着最反动的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叶卡特琳娜政策的继續。在叶卡特琳娜統治之下，俄国大大地扩展了她的国境。她替俄国增加的領土几达 250,000 平方英里。同时，尽管她具有开明的理想，却把农奴的枷鎖牢牢地加在俄国人民的身上，而使得进步社会力量的发展停滞了好几世代。她以伟大的政治敏感把教会財产轉为俗用，并使俄国的教会紧紧地依附皇室，而从此之后根本上成为朝廷統治的工具。

不管我們怎样評价吧，她的成功还是大有可观的。那末，她究竟凭借什么品质而取得这种成就呢？当然不是由于她的美貌以及女性的其他魅力。她的美丽并不足以系住她丈夫的心，結果，为了打开她自己的出路，而把他废黜并加以杀害了。她虽然也不否认她的多情的天性，需要男性的慰藉，但她决不允許她的任何宠幸来改变她的既定政策：即为了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追求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个政策，需要杰出的政治

才能，特别是就她的地位而論：原是一个异国国籍的妇女，来到俄国时，与皇族全无任何亲故关系，而后来竟能夺取皇位，并且須得继續提防一系列自称有权继位而阴謀向她夺位的人。而叶卡特琳娜特富于这种政治才能。她并且选用了若干能人作为她的顾問和官吏，但他們都得完全順从她的意志。她虽然也是个多情女子，但却沒有男性的幸臣侍从她的左右。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具有的事变性，是由于她具有无比聪明的政治天才。

但有一点須得注意的：即就她的国內統治的范围而論，在任何一点上，她也沒敢违背那封建大地主的利益，在她的青年时期，沒有理由怀疑她也曾贊助过孟德斯鳩、貝嘉利亚(Beccaria)、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理想。她之所以放弃这些进步的社会理想，那是由于她觉察到：在俄国并沒有任何强有力的社会阶級来支持反对大地主利益的經济改革。因为她不能改变現状，于是轉而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强化現状。如果沒有她的話，俄国农奴的解放也許会更早地实现。虽然她的活动自由受了局限，但她似乎还是一个事变性的女子，确是“身上每一寸都配称一个‘政治人物’，为现代史上任何女性的杰出人物所不能匹敌的。”①

① 霍渠：«剑桥现代史»第6卷，英文版，第701頁。

第十章 俄国革命：一件用来检驗的事例

本章的主題是：如果不是由于一个人的工作，我們今天就会生活在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里。

这个論点分四层来談。第一、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仅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大的事件。我們說它“最重大”，是因为这场革命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經济史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事件的影响都要大。第二、俄国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三、革命的胜利是由于列宁的直接領导，沒有他，革命就会失敗。第四、要是沒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一部份經济生活就会大不相同。

一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消灭了沙皇制度，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形式前进了一步。这次革命不是有計划的，但是在历史上却不是意外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消灭了政治上的民主，代之以少数派的独裁。这次革命是有計划的，但是在历史上是意外的。

这种好象諄論的现象是容易解释的。日俄战爭爆发之后，除了在宫廷中領年薪的人和一些反动份子以外，所有政治集团都随时期望通过一次“二月”革命，见到君主专制的垮台，可是直到十月革命实现前的十个月，也还沒有人梦想到一次“十月”革命会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后来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这固然不用說了。就連完成了革命，相信无产阶級专政是历史必然性的布尔什維克們，也沒有察觉出来，他們的时机会来得那么快。他們对无产阶級专政的信念是一种理論上的和綱領性的任务，是学說的一部分，这种学說作为一种

国际运动(它的最后目标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不同，不但俄国要照着做，就是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要照着做。即使是党內最激进的理論家們，在他們取得政权的短短十个月以前，都还不认为在俄国取得政权是历史日程上的当务之急。

如果需要举出这一方面的証据，我們可以引用布尔什維克領导者所作的估計，他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发生在西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他們至多希望，俄国的一次民主革命会在西方引起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到时候又会把俄国也带进同样的軌道。而更重要的是，列宁回国以前不久，还在对瑞士的一批青年的社会主义者发表的一篇演說中表明，他并不盼望在他这一輩子会发生一次“十月”革命。如果有什么人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俄国存在下去，就象資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島一样，存在下去，这个想法是会被人当作一个笑談的。

俄国革命的后果是什么呢？关于那些后果是否令人滿意，我們不去評判，我們只限于揭出事件之間的客观联系。

第一个結果就是，由于德国的第二战场的消失，第一次大战的时間延长了。俄国革命的榜样和革命宣传的影响，虽然軟化了德国国內战綫，但是帝国最高司令部求和的决定仍是一个軍事性的决定。1918年春天，德国从东綫抽調了一些部队，举行了春季攻势，这一次进攻潰敗之后，德国就不再有取得武装胜利的可能了。

影响不那么直接，但也許更为深远的是，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从国际經济領域里抽了出去。由于布尔什維克立即实施的对于对外貿易的严格控制，自由竞爭的市场被破坏了。不但商品的輸入禁止了，而且政府的政策以及外国投資者因为先前的賴債，不愿意冒险投資(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两种情况都是自然的)，資本的輸入也切断了。在列宁手里，为了防止資本主义复辟，开始出现的这种傾向，到了斯大林手里，“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已經成为日程上的常务的时候，就更为加强了。俄国脫离世界市场的全部影响，在1929年

到1932年灾难性的危机期間里，是很明显的，那时，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大量的过剩商品和資本由于沒有出路，积压起来，同时失业和貧穷也相应增加了。大有潜力的俄国市场本来能够吸收大量商品和服务性劳动的，它的关門政策加重了危机的严重性。

布尔什維克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們沒有料到，能在西方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之下保持住政权。而却认为：一旦西方发生了革命，由于俄国生产力处于原始状态，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济里又会落后。为了促进“不可避免的”西方革命，共产国际建立起来了。它在当时和以后，跟苏維埃政权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区别，只不过是公文紙上的名銜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并沒有发生。德国、匈牙利、芬兰和中国曾作了几次努力，强行革命，結果都慘遭失敗。布尔什維克們必須保住政权，或者自动放弃政权。事实証明：馬克思的学說所說的，沒有一个統治阶級会自动放弃政权，——对于布尔什維党的专政也同样适用。承继列宁衣鉢的斯大林，不顾列宁的政治遺教，发出了信号，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从那时起，“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在联合干涉的年代里，曾以此团結过西方工人）一变而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进行活动的幕后指导原則。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历史都証明了这一点。例如，法国共产党原是极力反对当前这次战爭的，后来，它不是在希特勒侵略他們祖国的时候，而是在俄国遭受侵略之后，才改变了它的路綫。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有。

现在保卫苏联和稳定布尔什維克政权結为一体了。政权的稳定和跟其他国家維持正常关系有密切联系，特别是跟避免国际冲突有密切联系。如果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一部份物质資源和全部精神鼓励都来自布尔什維克政权）要去夺取政权而遭受失敗的話，那些友好关系就容易受到危害。随之而来的斗爭和反应也許会引起十分可怕的战爭和干涉，那就会打断“社会主义”的建成。因此，苏維埃的統治者有鉴于国防的需要，和扩大国家經济的需要，在保障和平方面，特感兴趣。另外，他們还以維持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內部现状为己

任，因为破坏现状就会引起国际冲突。如果苏維埃政府认为某一个外国的干涉阴謀沒有什么可怕的，或者认为可以用貿易或政治条約来把那些阴謀轉移，它就一定急于和那个国家建立亲密关系，不管它是集权主义的意大利和土耳其，或者是民主的法国和英国。假如有什么差别的話，那不过由于早年的历史，它对英、法比对意、土更具戒心罢了。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已在德国上台之后，尽管希特勒公开宣布了他对俄国的政策，布尔什維克政权在履行它的一切条約、协定和貿易协定上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实际上，它跟希特勒續訂了一些旧的条約，又签訂了一些新的，并非它不怕希特勒的坏心眼，而是为了避免触怒希特勒，他的言行已經表明了他是不愿等人来触怒的。

布尔什維克政权除了习惯于維持外国的现状之外，同时又急于让各国共产党在那些国家中活跃起来。布尔什維克学說有一条原理：資本主义列强任何集团之間的分歧，比起苏联和所有資本主义列强之間的分歧来，算不得一回事。資本主义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間的明显差别被认为是表面现象。法西斯主义本身被描述为金融資本主义时代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和正常的状态。因此，按照布尔什維克学說，不是資本主义国家互相攻击，而是任何一个或所有資本主义国家都会进攻苏联，这是經常存在的一种危险。为了防止終于引起这种可怕的不測事件，为了一旦果真有事时，取得有力的、占有战略地位的同盟者，就必須加强各国共产党，作为基本的保証。象布尔什維克所設想的，这意味着它們必須在一切国家中取得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領导权和控制权，不是为了进行革命，而是根据苏联利益的需要，直接和間接影响那些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們必須消灭或支配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劳工的、甚至民主自由派的团体。

布尔什維克在俄国以外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不是推翻任何資本主义国家，而是破坏一切国家中工人阶級和社会主义者的团結，使属于共产国际的組織能取得立足点。他們有时候，用內部进攻和著

名的特洛伊木馬的策略，有时候用公开分裂和組織平行的政党与工会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双管齐下。实际結果就是削弱了抵抗国內反动派的力量，特别是抵抗受到日益得势的法西斯影响、坚决和苏联为敌的大資本家、地主和失掉財产的中产阶級的力量。

在这方面，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們反映出布尔什維克政权对西方工人阶級影响的两个阶段。

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布尔什維克們就希望强迫那个“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級专政在西方出世。但是要强迫，就必須取得領导权。因此，他們就放弃了那种在他們国內所行的策略的明显灵活性，而在所有其他国家，根据他們自己的历史經驗，另行规定了一套教条主义的行动方案。这就是說要打垮现有的、采取不同政策和方針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正当墨索里尼的信徒們(虽然他們的力量还很弱)，准备向劳工和意大利的民主总攻的时候，强大的、富有战斗性的意大利社会党，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而解体了，分裂了。

列宁的战略，在俄国国內和国外，特别是在对付其他一些工人阶級集团(比起它們来，布尔什維克是少数)的时候，都是从革命党的性质这个概念出发的。他不可能抛弃这个概念，除非是放弃了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原則，即：布尔什維克党对无产阶級的专政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先决条件。①

西方的革命遭受了一連串失败之后，布尔什維克轉过头来在俄国建設社会主义，把共产国际变为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工具。现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一次革命，即使是在非布尔什維党的贊助之下，用和平方式完成的，也会成为一件麻煩的事，因为它会引起內战、反革命和国际冲突的危险。在德国，从1928年起，布尔什維克用一种超級革命的路綫来打扮他們自己，但却集中了他們大部精力打击其他工人阶級党。他們宣称，真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

① 欲知其詳，請参看拙著《理性、社会神話和民主》，1940年紐約版，第7章和第8章。

是德国社会党。他們把德国社会党的領袖和成員叫做“社会——法西斯。”在重要关头，德国共产党和納粹共同行动，反对魏瑪共和国。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宣布共产党非法以后，共产国际还譴責德国社会党是工人阶級的“主要敌人。”①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个路綫改变了，当时希特勒的战爭意图，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也是十分清楚的了。新的轉变开辟了人民陣綫的阶段。人民陣綫是一个和平陣綫，提倡集体安全，要求冻結现有的欧洲各国边界，号召制裁把軍队派出国境的任何国家。人民陣綫打算包罗任何团体，不管它的社会綱領怎样，只要它接受这个綱領就行。在这一时期，在所有的人民陣綫里面，全世界的共产党都站在联合陣营的最右面，反对任何足以危害民族团結的社会变革。在法国，他們跟保守的激进社会党站在一边，反对社会党。在英国，他們要求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自由党和英国工党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在西班牙，他們站在共和党的右面，尽力反对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来的、会侵犯財产私有权的社会改革。过去是超級革命的共产党人，现在却害怕小小的社会改革也会引起国内的反对，造成混乱了。这就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把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推进希特勒的陣营。由于同样原因，这一时期，英、法帝国以内各殖民地的共产党爭取殖民解放的斗爭也削弱了。

1939年，这个路綫又改变了一次，当时，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訂了协定，他认为希特勒会向西进，并且呆在那里。于是“金融寡头的西方民主国家”又成了主要敌人和应該一脚踢开的战爭販子。克里姆林宫称，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趣味問題罢了。

1941年，斯大林不得不又一次倒轉过来，因为希特勒逼得他沒有别的办法。布尔什維克的教条說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他們仍然认为德国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間，比起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跟俄国之間，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种說法証明是破产了。可

① 1933年5月1日的宣言。

是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必須記住，布尔什維克控制国际工人运动及其自由派联盟者的做法，不是列宁和斯大林玩的政治魔术。它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分别闡述的世界革命和苏联的需要与利益为根据的。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他們自己就是那些需要和利益的唯一的代言人。列宁认为，沒有必要的认識和領导（这种本領只有布尔什維克才有），革命是注定要失敗的。斯大林认为，如果属于共产国际的各个組織要有左右他們政府对苏政策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維克对外国群众的領导权是很重要的。布尔什維克的領导在两个阶段中，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引起过爭論，部份是因为它采取的統治方法或破坏方法，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拒絕在国内問題上接受外国代理人的命令——尽管这个外国具有社会主义的称号，实际上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少数党对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布尔什維克虽然在爭取領导权方面沒有成功，但是在分散和削弱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方面，却到处都获得輝煌的成就，只有在奥地利是例外，因为在那里，陶尔夫斯(Dollfuss)和許士尼格(Schüssnig)手下的天主教法西斯分子已經把那份任务承担过去了。

尽管布尔什維克为了保障和平，放弃了世界革命政策，西方国家中大部份保守的有产者集团仍然害怕苏維埃政权。早些年前俄国革命的記忆犹新。随着經济危机的加深，他們看见本国一部份工人当中尤其是知識分子当中，对苏联的好感，逐步增加，而深感不安。几个五年計划期間，大力宣传的生产潜力的增长，对于生活水准越来越低、觉得安全的諾言比自由更好的人們，起了示范性的影响。在国内，随着生产指标日益下降，騷动、示威、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和日益尖銳的冲突吓坏了銀行家、工业家、地主和他們的政客与論客。

在德国和意大利，把法西斯捧上台的就是这些集团。不論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实际上都不是在公开斗爭中贏得政权，这一点是要反复申述的。政权是那些有势力的保守集团奉送給他們的。那些“上流人”在法西斯主义身上看见了代替布尔什維主义的不二法門。这

种情緒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且說明了墨索里尼不仅在英国受到支持，甚至在美国也受到支持的原因。摩根家族的湯瑪斯·拉芒特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搖搖欲墜时給了它一笔貸款，救了它的命。工业家們称贊这种行动是“雪中送炭！”美国教授会的領袖人物伊尔文·白璧德說：“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們会认为我們走运，如果我們能找到一个美国的墨索里尼，我們也許需要他来把我們从一个美国的列宁手里搭救出来。”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公开的有組織的法西斯分子以外，只有这些集团相信共产国际的宣传口号——“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法西斯主义”。

布尔什維克可能会侵入西方，这种可能性即使象神話，却是可怕的。但是，毫无疑問，比这个更有影响的则是資本主义的沒落，以及无法象从前那样，很快就从萧条的深渊中自拔出来。失业和貧困这种明显的事实迫使现存的政府采取措施，那些措施似乎威胁了有产阶級保守集团的传統地位、特权和收入。于是它們就准备让危机“正常地”自流下去，那就是說，拿那些最倒霉的人作牺牲。它們厌恶賦稅，厌恶社会福利的立法，也厌恶并不触动利潤制度的結构、只企图重新分配經济負担的、那种有节制的資本主义的一切折衷措施。

在魏瑪共和国时代就已經开始的、雷厉风行的整頓社会秩序的运动，也許会引导到某种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工业家和容克貴族們的强烈反对，凡尔賽体系的束縛，社会党人的怯懦和目标的模糊不清以及布尔什維克在劳工运动中所进行的越来越剧烈的内部斗爭，这条路被切断了。

就在經济灾难和政治癱瘓交織在一起的形势之下，法西斯主义者，带着送給各阶层人民的礼物和諾言，出场了。喘息在公务和租稅重担之下，給罢工和所有大城市街头上演出的小型内战弄得焦头烂额的胡根堡們、蒂森們和兴登堡們欢迎法西斯主义者，希望他們能“一劳永逸地”恢复秩序。他們见过无数的总理上台下野，所以他們

① 参看《民主与領导》，1924年紐約英文版，第312頁。

心想，等到秩序恢复了之后，法西斯主义者或者会因为身負統治之責，或者因为怕被他們借以取得政权的同一个机构加以撤职而变得清醒一些。等到他們把国家"从布尔什維主义的手里"拯救了出来之后，軍队无論如何总会使得他們就范的。可是法西斯分子一上了台，他們就打碎了使他們当政的那一套机构，把軍队政治化了，把工业家和他們的工厂也变为一种为总体战爭而服务的經济了。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和統治者以后，事情就朝着以武力解决欧洲經济和政治問題的方向飞快前进。正如希特勒的国内政策受到害怕布尔什維主义的保守派的支持一样，他的以消灭俄国为走向世界霸权第一步的国际政策，也受到全世界保守的和反动的集团的支持。互相冲突的民族利益当然起了作用。总的說来，西方保守派对罗馬型的集权主义比对納粹型的集权主义更有好感。但是作为一个集团，他們竭力阻止反对希特勒的有力行动，終至放虎归山。

常常有人认为，法、英統治阶級精心策划的政策，就是存心要牺牲波兰、巴尔干諸国，特别是俄国，鼓励德国东进。这种論調是給苏德协定打掩护的，1939 年的苏德协定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它沒有什么道理。德国軍队在任何地方得胜都絕不会消除法国对德国的猜疑。而到了德国东进抵达俄国边境时，英法两国馬上就对德宣战，这就是个有力的反証。当然，它們宣战并不是为了救波兰和俄国，而是为了自救。为什么它們那么晚才醒悟过来，才懂得希特勒威胁它們，它們必須自救呢？它們对法西斯主义的錯誤估計，它們不愿意阻止希特勒的兴起和德国的重新武装，都可以用恐惧心理来解释。它們认为除了法西斯主义的褐色浪潮之外，就只有布尔什維主义的紅色浪潮，别无其他出路。尽管这种恐惧毫无根据，影响却不小。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恐惧，使它們在 1933 年 1 月，兴登堡出卖魏瑪共和国的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前和以后目瞪口呆，神志不清。直到希特勒操起刀来要去宰割波兰和波兰背后俄国的时候，它們才明白，那把刀子也是对着它們来的。

一旦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

只是时間早迟的問题了。象我們今天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以前，好象是威尔斯式的幻想，现在却成了一种历史现实了。

那末，把論題的第一点总結一下·俄国革命引起三个系列的事件，这三个系列事件結集起来，促成希特勒的胜利：

(1) 俄国从世界經济領域里抽了身，留下一块死地方，不能再从其他国家吸收貨物和劳务。这就加剧了經济危机，这种經济危机无論怎样都会发生的，但是也許不会采取那末猛烈的一种形式。它使得希特勒能够从那些遭受这种危机最严厉打击的人們当中組織他的群众。

(2) 劳工运动的遭受破坏，如果德国劳工运动象在保皇主义者卡普(Kapp)起事时代那么团結一致，它就能立时制止法西斯主义，或者至少进行坚决抵抗，把德国拖得象西班牙那样筋疲力尽。

(3) 害怕布尔什維主义，害怕把布尔什維克的方式强加于西方。这就使得德国的反动集团要求希特勒当政，并且說明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动集团何以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眼光短浅地漠不关心。即使沒有俄国革命，希特勒运动横豎还是要出现的，不过它不会取得胜利。德国最坏的另一前途或許会有一个反动时期，类似历史上几次保守的退轉。但是，到了一个时候，資本主义特有的危机无法克服，一个保守政权可能就不得不为經过几次失敗而受到教訓、得到加强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开辟道路，不然的話，就得被迫去和公开反抗的德国占压倒优势的人民群众作斗爭。

二 和 三

不管我們怎样估計俄国革命作为以后欧洲发展原因的意义，我們总得碰到这样的主张，即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不可避免"这个詞儿的含义是模糊的。甚至使用这个詞儿的人們也不是指的它的本意。他們指的是，假定有了那些社会的和經济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在一切有关的历史可能性中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列宁主义派的正統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又是可以跟

他們的政治綱領分开，单独来加以坚持的，并且当然需要加以研究。

不承认俄国革命就俄国社会和經济发展情况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就蘊涵着相信另外一种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因素，根据我們的假設，就是一个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列宁。贊成不可避免性的人們承认，列宁的出现，就十月革命的日历来說，也許是必要的，但是为了跟他們的一般历史哲学取得一致，他們断言，即使沒有他，“革命迟早是一定要来的。”我們旣然根据以下的理由否认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即一个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决定了問題，而且沒有他，事情就会大不相同，对世界会有深刻的不同影响；那末，我們就把我們論点的第二、第三方面合起来考慮。

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論点依靠两个主要方面的証据。第一方面是材料的累积，这些材料表明，俄国虽然主要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它也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一个有阶級觉悟的无产阶級。俄国农民对于土地的长远需要，战争造成的工业脫节、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緒，政府机构的解体引起了一种革命形势，这种形势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前夕变得越来越尖銳。然而革命形势还不是革命。为了革命还要有一个政党。于是第二方面的証据就被提出来了。这方面的証据在于証明：布尔什維克党，而且只有布尔什維克党，具有适合俄国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正确綱領。革命形势和党加在一起，就使得十月革命成为唯一可能的历史出路。

即使以上的說明沒有什么可以辯駁的地方，結論还是缺乏邏輯根据的。历史上另外的时期也有一些情况，給我們証明，一个革命形势和一个革命的党，再加上观点也“正确”的一个綱領，結果仍是一场失敗，例如，1923年的德国就是如此。要說只有布尔什維克党才有能适应形势的綱領，那也不尽然。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实际上是按照那时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綱領拟訂的。①

① 作为参考材料，請看切尔諾夫：《俄国大革命》，耶魯大学出版社1936年英譯本，特别是第19章第392—402頁。这里应該再說一下，这个党的左派在十月里加入了布尔什維克。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社会革命党的綱領始終只是一紙决議，临时政府和苏維埃里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們一点都不重視它，而布尔什維克党却实行了他們的綱領。

以俄国的形势来說，应該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結果，布尔什維克党是以滿足俄国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为其主要政治目标的。当时的主要問題是列宁跟布尔什維克的关系問題——对党的綱領、战略、策略、行动意志的关系問題。在我們进行研究以前，我們应該看到，在以夺取政权为結局的全部事件中，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导作用，实际上是誰都不否认的。成問題的只是布尔什維克党对于俄国人民群众惶惶不安的情緒，究竟起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典型的右派历史学家米留珂夫(Miliukov)认为，布尔什維克加以巧妙利用的群众情緒主要是由他們的宣传鼓动造成的。典型的左派历史学家托洛茨基則认为布尔什維克始終落在工农情緒的后面。代表中間派說話的克仑斯基断言，那种“根本不相信当局的心理”主要是科尔尼洛夫在米留珂夫的朋友們贊助之下，企图发动的政变在群众当中攪起来的；其余的全是布尔什維克包办的①。不过不管俄国群众的情緒是怎样激发起来的，它并沒有成为革命。造成革命的是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

但是，如果沒有尼古拉·列宁，从1917年四月到十月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凡是熟悉历史內幕的都会发现，那些目标、政策、口号、指导性的战略、每天的策略都是列宁规定的。有时候，他象一位教师教授一个生气勃勃而又慌张困惑的学生那样，煞費苦心地劝导。有时候，他发号施令，象一个沒有耐心的练兵的伍长，向新兵們大嚷大叫。但是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沒有他，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下面就是証据。

(1) 列宁是四月三日回到俄国的，四月四日他提出了他的四月提綱，在这以前，布尔什維克党和它的机关报一直是支持克仑斯基临

① 參看克仑斯基：«布尔什維主义的序曲»，1919年紐約英文版，第277頁。

时政府的。列宁的四月提綱号召用武装起义推翻这个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維埃，这个提綱就象投在他自己的党內的一顆炸弹。

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讲到列宁到达以前，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立场时說过：

> 那种立场是完全錯誤的，因为它帶来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保守主义的磨盘上注水，妨碍对群众进行的革命教育。当时，我也和党內其他一些同志一样抱有那种錯誤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我在列宁的提綱上簽了名时，才彻底放弃了那种立场。①

开头，列宁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他坚决要求立即停止对德战争，他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內战"，这一来激怒了所有的政党。他給了敌人以可乘之机，他們拚命把捏造的"德国奸細"的标簽貼在他身上。② 尽管如此，四月还沒过完，列宁就說服了党的执行委員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在他回来以前，当地的布尔什維克正在郑重其事地考虑跟孟什維克合并的問題。列宁改变了这一切。他在他自己的党和拒絕接受他的綱領的所有其他工人阶級政党之間划了一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綫。

列宁用一套新的目标来武装他的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不难由以下事实来估計：即他的做法本身就含有放弃布尔什維克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学說的意味。直到二月革命为止，所有布尔什維克，包括列宁在内，都相信他們所謂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的任务就是在俄国实现西方民主革命的成就。1917年，列宁改变了他的立场和党的立场。俄国革命一定要成为資本主义世界經济的第一个缺口。它

① 参看斯大林：《論十月革命》，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合作社1934年英文版，第76頁。

② 加罪于他的主要根据就是說，魯登道夫毕竟让他在那著名的密閉火車中通过德国而从瑞士回到俄国了！凡有"信仰的意志"的地方，（而在政治上这永远是有的）对列宁的行动可以造出許許多多让人相信的事情，尽管他的行动是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采取的。要是列宁在1936—1937年期間还活着的話，可能也会有足够的証据在那时的"莫斯科審判案"中判定他有叛国罪。

一定要成为一种"无产阶級专政"，这种专政会在西方引起同样性质的专政，共同促进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的反对者預言列宁的綱領不会緩和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在欧洲无产阶級专政之后出现；内战和混乱会使俄国糜烂；代替沙皇的官僚地主专制制度的，将是一个更残暴的布尔什維克的官僚制度。列宁不顾党内外一切批評，排除困难前进，毫不让步。

（2）一旦列宁說服了他的党采取了以内战和武装起义来反对临时政府的綱領，主要的任务就清楚了。那就是选擇适当的动手时机。直到那时为止，为了进行推翻临时政府的宣传，为了儲备武器，列宁在利用合法地位方面很是小心。从批判的合作突然变为針鋒相对之后，要約束布尔什維克基本队伍、它的外围和同情者，不让他們过早下手，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向一个国王开枪，你就一定要命中。起义一发动起来，失敗就是灭亡。所以列宁不得不严格制止他手下的那些比較浮躁的人，不得不严格制止因为沒有及时滿足工农的迫切需要而引起的周期性的群众騷动。在时机不利于夺取政权，或者不利于在取得政权之后，保持政权的时候，他必須預先阻止夺取政权的企图。

在六月的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七月初，极端主义的情緒，在彼得格勒工人阶級和駐軍的重要部份中很流行。甚至布尔什維克的某些領导者也跃跃欲試，想向克仑斯基的政府发出一个全面进攻的信号。是列宁制止了他們。他警告說，他們不会完成他們所开始的事业，他們会被打垮，而且夺取政权的机会也許就永远失掉了。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工人，不受約束，手里拿着枪出现在大街上。虽然布尔什維克們力求取消这次示威（这主要是他們以前宣传鼓动的結果），在列宁指导之下的布尔什維克党还是領导了示威运动，借以防止它变为公开的武装起义。布尔什維克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因为党公开承担了武装示威的責任，党的机构被迫轉入地下，在对群众的政治影响上，他們受了相当损失。只是在科尔尼洛夫企图从右的

方面对克伦斯基政府发动政变之后，他們才恢复了影响，部份地摆脫了非法状态。

(3) 在列宁掌握布尔什維克党的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就是十月革命的前夕。虽然在隐蔽期間，他跟深怀不满的农民和士兵保持了密切接触。他也非常了解首都內外軍队部署的情况。接受过七月的經驗教訓的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員会傾向于慢慢走。他們接到列宁的指示:“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别动手”的时候，他們最想不到的就是轉入公开的进攻。

最初，列宁是属于少数。他生气，大喊大叫。他威胁他們，要撇开他們，直接找基层党干部去組織这些事情。他写信給有影响的党員們，叫他們对落后的执行委員会施加压力。經过激烈而顽强的辯論，他說服了他們。从他在1917年11月21日写給中央执行委員会，要求在以后的几天里組織武装起义的一封信里，就可以明白，列宁认为他們所处的那个时期，作为以全力夺取政权的时期，是如何紧急。信里說:“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这两三天的斗争。”① 等到他終于以十票对两票贏得了多数，事情才决定了下来。布尔什維克取得了政权。

(4)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們保住了政权，这主要也得力于列宁的指导方針。中央委員会的一部分人想跟霍亨索伦德国继續作战，同时号召德国工人支持布尔什維克。另一部分人提出了“不和不战”的政策。列宁坚决要求签訂和約，让布尔什維克从外国敌人那里暫时取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让他們获得足够时間，巩固自己，来对付內部敌人。这个时期，列宁最初还是属于沒有希望的少数，但是他埋头干下去，直到他們让了步。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約签訂了。

如果列宁沒有回到俄国，或者死在路上，很难假定，当时支配布尔什維克政策的加米涅夫、穆拉諾夫和斯大林会掉轉方向，会把反对临时政府的战争进行到底。如果在六七月里，列宁不在场，沒有在头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1932年紐約英文版，第99頁。

脑发热的布尔什維克們和其他的 enragés① 中間进行說服工作，制止起义，整个組織都会被消灭在血泊里。如果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維克不顾列宁的劝告，躊躇了，克伦斯基就能够調动可靠的軍队，守卫国会会场，从从容容地对付布尔什維克們。如果列宁沒有答应德国人的一切要求，使他們停止下来，他們的軍队就会占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因为軍事抵抗早就无法进行了。列宁和他的同志們就会要么遭受到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魯森堡在德国遭受的命运，要么被赶到广大的俄国的各个角落里去。

当然列宁并不就等于布尔什維克党。但是布尔什維克党却因为列宁，才成它所成为的那种工具。在他以前，有沒有什么人，在一个政党里掌握过那么大的权力，很难說；不过在一个自认为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組織中，肯定是沒有的。

如果列宁当时不在场，沒有哪一个革命領袖能够代替他。斯大林不行，他自己承认了。列宁的最亲密的信徒季諾維也夫不行，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跑开了。加米涅夫不行，列宁是在改变斯大林的思想的同时，改变了他的思想的，可是他和季諾維也夫一样跑开了。托洛茨基也不行。虽然記录証明，在1917年四月以前，俄国的杰出人物，只有托洛茨基的理論立场和实践綱領跟列宁的相一致，但是在列宁成功的地方，他会失敗的。就举一件事来說，他到俄国比列宁晚了一个月。那时列宁已經完成了整頓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自然这种整頓工作，托洛茨基也会作的，不过他不是这个組織的成員。他自己的党，人数不多，沒有什么力量。八月里，他加入了布尔什維克党，由于列宁贊賞他的才干，經常保护他，不让他受到党內二流領袖們的猜忌和反对，他才在布尔什維克党內建立了威信。托洛茨基单枪匹馬是注定要失敗的，因为尽管他在别的方面很有才干，但他缺少組織天才，而这种天才，却是政治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他的高傲专横态度刺激人們，他不善于以自己的长处感化人們。他能煽动听众，但是他不

① 法文，意思也是头脑发热的人們。——譯者

能象列宁那样，爭取党內反对派。他公开鄙薄庸庸碌碌的人，这一点，在他这么一个新来者的身上，是不会得到諒解的。

四

要是十月革命沒有发生，或者，发生了，而沒有成功，历史的后果会怎样呢？要說明不会出现的事，比起以任何較大程度的确定性說明会出现什么事，是要容易些。这里，象闖进太阳系，打乱它的常态的彗星一样，另一系列的事件会涌进我們正在討論的这一系列的事件里来，这种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我們能够根据我們已經知道的，大致推算出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这一点，象我們所见到的，在原则上也还有异議的話，那么，在人事和史事方面，一切有根据的論断的可能性就都得排除了。

要是布尔什維克失去了他們的最有利的时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某些无政府主义集团，也許会有攫取政权的打算。但是他們能够取得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陣吵吵嚷嚷的騷乱。他們沒有組織紀律，也提不出一个統一的控制計划，更不談执行了。即使出乎常情，取得胜利，他們的綱領也会在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开头的地方，就是說把土地交到农民手里——停下来。

无論怎样，俄国的軍事战綫都会崩潰的。实际的情况是，到了1917年底，就根本沒有什么軍事战綫了。德国人能够随时随意前进。不管誰来組織政府，都不能不跟德国休战。在第一次会議上就給布尔什維克用武力打垮了的立宪会議，俄国的議会民主制度，很可能效法英国和法国，把俄国变成为一个立宪共和国。占优势的社会主义的情緒会保証有一种先进的社会立法的制度。銀行，某些基本公共事业和工业大概会社会化，但是不会有工业的集体化。俄国市场会作为一个广大的領域，为欧洲的工业开放。从1928年就开始的灾难性的世界危机大概会推迟，而且即使果眞发生了，它的后果无論如何不会那么严重。各种法西斯党派会作为政治团体存在下去，但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在一个統一的欧洲工人阶級面

前有所发展的。

即使沒有十月革命，战爭的危险也不会消除。因为在缺乏某种計划經济，来巩固世界政治合作的情况之下，为爭夺世界市场而引起的各国間的經济冲突，仍然会继續下去。在东方，特別就日本来說，事态的发展大致会跟过去一样。但是在西方，在沒有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战爭也許会避免，虽然它的危险不会消失。一开头就加入国际联盟的一个民主的俄国会成为魏瑪共和国的天然同盟者，凡尔賽体系的最坏局面就会避免。一个重新組成的社会主义和劳工国际，鉴于它在1914年错过的机会，并且有着足够的力量来防止用武力解决經济問題，也許会从第一次大战的屠杀中出现。

有些历史学家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命定的，也就是說：不是当时形势之下的唯一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他們认为，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或者如果十月革命失敗了，唯一的另一前途就是沙皇制度的复辟："代替沙皇制度的不是立宪君主制或自由主义的共和制，而是布尔什維主义……代替布尔什維主义的（如果它經受不住內战的考驗而失敗的話）……不会是按照最新式的同等投票权和比例代表制选举出来的切尔諾夫，而是一个軍事独裁者，一个高尔查克或者一个邓尼金……"① 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但是我們认为这种看法是錯誤的。

科尼洛夫的反革命运动，在十月以前，就象烈日下的雪一样融解了。使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能够重整旗鼓的是什么呢？外援——如果一个民主政权在俄国继續存在下去的話，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外援。实际上，外国的干涉反而加强了布尔什維克的独裁。有許多敌視布尔什維克的政治統治的人都跟布尔什維克們并肩作战，因为他們把这场內战看成反侵略的民族战爭。在俄国，保皇党实际上得不到社会支持，支持他們的是大地主和依靠大地主的人們。农民們抓住了

① 参看威廉·亨利·张伯伦：《俄国革命》第1卷，1935年紐約英文版，第371頁。关于那个时期，这本书从各方面看，是迄今写得最客观的一本。

土地不放手。当他們有了选擇的机会时，他們宁愿选擇布尔什維克，因为布尔什維克答应让他們保持土地；而不会选擇反革命分子，因为反革命分子夺走他們的土地。如果立宪会議能行使它的合法职权，那么来自右面的新的暴动大概不会发生。即使竟然发生，也不过是曇花一现，因为它会面临实际上团結一致的人民。

为什么俄国在沙皇独裁制和布尔什維主义独裁制之間找不到一个民主的中間道路，通常举出的理由也就是“証明”英法不可能革命的那些理由。

可是，我們所关心的，主要的并不是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特殊面貌。至于它是不是值得欢迎，在这里也跟我們毫不相干。我們所相信的是：不管世界会变得怎样，幸福一些或更为不幸，好些或坏些，无論如何，它会变得大不相同。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們会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轉折点，它在人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幸福和不幸的时代；相信根据已有的証据，他們会把那次革命成就的主要作用归功于尼古拉·列宁的創造事变的性格。

* * *

关于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的創造事变的重大意义，上面的分析仍不完全。如果不能把一个亲自参加过严酷的革命斗爭、相信俄国革命有其必然性的重要人物的論点駁倒，就不能保証这个分析得到人們的承认。列昂·托洛茨基在他的出色的《俄国革命史》中，企图按照馬克思主义原則，証明在沙皇专制政体垮台之后，十月革命是俄国唯一的可能发展的道路。他的著作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十月革命以一种实际的必然性向前迈进。”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然的必然性。”它証明了“伟大革命的有力发展。”①尽管該书有其明显的傾向性（著者也絲毫不想加以掩飾），他的研究是了解1917年二月到十月那个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那是布尔什維克們替他們自己所作的似乎最有道理的說明。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460頁；第3卷，第260頁。

但是那种說明跟他的論点一致嗎？

在他的所有历史作品中，有两种精神在他的內心中交战：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作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得按照一元論的教条来解釋历史；还有經驗主义研究者的精神，作为經驗主义的研究者，他得跟着証据走。事件絕不能駁倒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所以只須把它們解釋得恰当就行了。而科学的历史学家却非向頑强的事实低头不可。我們要来說明，他的教条主义精神所提出的东西跟他的經驗研究所揭露的东西，是互相抵触的。

托洛茨基的經驗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証据确凿的基础上的，这个証据就是沙皇制度无力經受任何大规模的战爭。即使沒有战爭，它也腐朽了，到了崩潰的程度。再来一次內部騷动，大約就会垮台。到了战爭头一年年底，甚至連貴族們都在用抽簽的方法来决定由誰去杀死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左右了。但是从沙皇制度的注定崩潰到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或者占压倒之势的可能性）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托洛茨基企图弥补这个缺口，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不管在什么政权之下，都不能继續作战下去，还有，不解决土地問題，这个国家，不論是和是战，都避免不了混乱。在这里，論点也是得到証据的充分支持的。然而并不因此就可以认为布尔什維克党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必然的。

我們早就知道，早日取得和平和分配土地毕竟是社会革命党綱領的一部份。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无力继續战爭和必須保卫国家，以免一方面遭受科尔尼洛夫党羽，另一方面遭受列宁可能发动的新的暴动的威胁，会迫使立宪会議跟德国妥协。至于滿足农民的要求，社会革命党可跟布尔什維克不同，在主张把土地分給农民时，它沒有什么更深远的想法。社会革命党尽管它的社会成份复杂，主要是个农民党。因为它希望把分配土地正规化，不鼓励立时沒收土地。它等待立宪会議来作这件事。但是农民們等待分地，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士兵們等待和平，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工人們因为食物的缺乏和高涨的物价也感到不耐煩了。

用不着指摘他举的任何事实(而且有些事实是不难指摘的),我們可以說,托洛茨基所証明的一切,无非是客观历史形势使得布尔什維克的胜利成为可能。但是問題是:把可能性变成为现实性的是什么?那种可能性会失掉嗎?为什么那种可能性实际上沒有失掉?

当他是在討論問題,而不是为一种信仰作辯护的时候,带有关鍵性的每一頁上都有他作的答案。沒有失掉那种可能性是因为有列宁的領导。但是这个答案給了列宁这样一个作为事变創造性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它就嘲弄了托洛茨基心爱的馬克思主义的教条。結果,等到托洛茨基迫于他自己的叙述,不得不正視問題的时候,他的回答采取了閃爍其詞的形式。一个"是"接着一个"否"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腔調,甚至使得辯証法的神秘邏輯也落了空,結果只好无可奈何地采用了偷換論題的手段。主要章节的总的結論小心翼翼地承认如果沒有列宁,十月革命也許不会发生。但是在以后的章节里又馬上推翻那个結論,在这里,托洛茨基却又否定了他过去提出的并且試图回答的那个問題的合法性。

还是要問:如果列宁沒有在1917年四月到达俄国,革命会怎样?这不是等閑的問題,虽然問起来比答复起来容易。如果我們的解释有所說明和証明的話,我們希望它証明列宁并不是革命过程的創造者,他只是(!)投身到一串客观历史力量中間而已。但是他是那一串里一个重要的环节。无产阶級专政是从整个局势推断出来的,但是仍然需要确立。沒有一个党就不能把它确立起来。党只有在认識它的使命之后,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因此,就需要有列宁。在列宁到达俄国以前,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領导人敢于給革命下个診断……布尔什維克党的党內斗争是絕对无法避免的。列宁的到来只是(!)加速了斗争过程。他的个人影响縮短了危机。然而,能不能肯定地說,沒有他,党也会找到它的道路呢?我們絕不敢那么說。在这里,时間的因素是有决定作用的,而且在追溯时要把历史上的时間說清楚又很困难。辯証唯物主义无論如何跟宿命論沒有共同之

点。①

如果一定要从这段紆迴曲折的文章中，探索出一点意思，它似乎也是支持我們先前所达到的那个結論的。但是这个印象馬上就給托洛茨基抹去了，他拒絕把列宁和列宁所处的那个局势分开。他告訴我們，把列宁"那个人、那个英雄、那个天才，"跟客观諸条件"群众、党"并列起来，是机械的、片面的。为了保持他的教条主义的虔誠，不受邪說的沾染，他不知不觉地回到斯宾塞的立场上去了。斯宾塞輕輕推开杰出人物及其时代的关系問題，理由是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必須合起来考慮，而且两者都是为先行的文化情况所决定的。

托洛茨基也不承认列宁和他的时代条件(包括群众和党在內)之間的比較，因为两者都是由其他事物来說明的。他向我們保証說，列宁并不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偶然因素，列宁和他的党都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当然是噢！难道他們还能成为别的历史产物嗎？但是这个同語反复对于："如果沒有列宁，布尔什維克党会找到十月革命的道路嗎"这个問題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二月到十月，不管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我們都可以說(而且跟托洛茨基同样有理)，那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因为这个詞句既能够"解释"布尔什維克因为有了列宁而获得的胜利，又能够"解释"他們因为沒有列宁而招致的失敗，所以它跟这个問題毫不相干。只要托洛茨基再肯定一下1917年列宁在俄国的存在是由俄国过去全部历史保証了的，他就会陷入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天道給我們派来上帝的儿子，而那魔鬼的辯証法，der Geist der stets verneint(那永远否定一切的精神)則給我們派来了"人民的儿子"。

可以給"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这个詞儿一个确定的意义。就这个意义来說，凡是根据已有的历史証据，事先就可以或者应該可以作为未来发展之唯一前途而加以預料的任何事件，都是俄国过去历史的"产物"。照这种用法，我們有理由来下結論，最好的証据，包括

① 参看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329—330頁；第3卷，第154頁。

托洛茨基举出的証据在内，都証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不象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倒象是全部历史上一个最富于事变創造性的人物的产物。

* * *

在历史上，起了事变創造性作用的列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的好奇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使得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截然不同的，毕竟是个人的性格。我們特别感到兴趣的就是要发现那一系列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使得列宁在政治上特别突出，压倒了一大群人物，尽管他們作为思想家、作家、演說家，表现了比列宁更为伟大的才能。要作这方面的分析，就象去分析任何形式的天才一样，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在政治这种溶液里，德性和罪恶、理智和愚昧，不象在人事关系和科学活动的清水中一样，那是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比重的），要估計天才的价值就更困难。光是列举各种性格特征并不能說明洞察力的問題，洞察力是在各种特征都在問題、危险和理想目标的錯綜复杂的关系中共同发生作用的时候，才显出它的光芒来的。

政治洞察力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握时机的感觉。沒有这种感觉，再聪明也无用。如果配上坚强的意志，它就能把一个庸才推上高峰。在二月革命以前就知道普列汉諾夫和斯大林的人，誰也料想不到，这一个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得那么快，而另一个会逐渐成为最强大的党的有力人物。但是替布尔什維克赢得天下的，却是列宁的了不起的掌握政治时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以比普列汉諾夫的智慧更实际的一种智慧，比斯大林的意志更百折不挠的一种意志培养起来的。

凡是对列宁，这个政治人物，作过适当分析的，都一定注意到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无比的自信心。如果他曾对事业的最后成功，策略的正确性，以人类的苦难和不幸换来的胜利的高昂代价，抱有什么疑虑，他从来不向任何人表示出来。他不受享乐思想的腐蝕，也不受不切实际的、浮夸思想的感染。他把他的满腔赤誠献給了某种单純

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那些目标尽管很模糊，由于他自觉絕对的眞誠，他总是能够为自己証明他的作为(不管看起来如何)是正确的。

列宁只是在組織的体制之內，才能对人們发生影响。作为个人，他对群众是沒有力量的。他不装腔作势，他缺少以閃閃发光的同情心来抓住群众的那种手腕；虽然他跟群众总有話談，但是他不会发出火花，使他們燃烧起来，进入行动。

列宁是个党的人。对他来說，党的生活就是他的精神食粮和本质。正象某些人的性格受到教会的培养，另外一些人的性格因为苦难危险的磨炼和爱情、家庭、知識的种种問題而得到丰富，同样，列宁的性格則受到党的培养并在党內得到发展。他总是靠近他所参加的那个組織的中心。在他的思想里，他在哪里，党就在哪里。他的痛苦、問題、判断都反映他对党的高度专心致志，这种专心致志由于他在潜意識里就是党的化身，而更显得大公无私。不管他考虑的是国家大事，还是艺术、哲学問題，他总是全神貫注的。实际上，一切問題，就連听听音乐和下下棋，对他来說，都是政治問題。

列宁不仅仅是个党的人。他把党提高到一种政治原則的水平。他背离了馬克思的本质上是民主的观点，其根源就在这里。对馬克思来說，政党是介乎工人阶級国际教育机构和压力集团之間的一种东西，是可以时有时无，可以在历史事件的进程中重新組成的一种东西。但是对于列宁来說，政党是职业革命家的一支队伍。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职业革命家的組織最为重要。对組織的鉄甲般的控制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这个理想的組織，一定要跟列宁本人一样，对于群众的情緒，十分敏感。它要有一种准确的时間感。尤其重要的，它要有那种不可动搖的信念，相信它知道群众的眞正利益是什么，比群众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由于这种认識，为了让他們行动起来，对他們許下任何諾言，还有巧妙地操纵他們，使他們有所行动，这些手段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即使他們注定要失敗，也会教育他們，把他們的认識提高到布尔什維克的水平。职业革命家，按其定义来說，就是一个毫不自私，实际上，一点也不关心物质利益的人，所以他眞心相信，

他是不会受絕对权力的引誘和腐蝕的。

按照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級专政”是針对資本主义社会狹隘的民主提出来的工人阶級的更广泛的民主。列宁是个馬克思主义者，他拿共产党对无产阶級的直接专政調換了“无产阶級专政”。列宁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于工人阶級为消灭資本主义，乃至一切經济上的阶級而进行的斗爭。但是他更相信，这个斗爭只有在他自己的党（不管它的名字叫什么）領导之下，才能成功。他毫不犹豫地得出这个不可动搖的結論：因此，任何个人或团体，凡反对这个党的，客观上都是“人类的敌人。”

这一来，所有其他工人阶級政党都被推到壁壘的另一面去了。列宁不但用这种“合并”的方法反对它們，而且深信不疑。这种合并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为了爭取苏維埃的民主、反对党的专政而斗爭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跟黑色百人团联系起来，把一个在革命以前监獄里呻吟了多年的批評了布尔什維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跟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党羽等同起来。在列宁去世之前，任何一个要求苏維埃民主、反对党的专政的人，都立刻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这看来好象有諷刺意味，因为列宁反对克伦斯基的主要口号就是“一切政权归苏維埃。”但是在那种形势之下，列宁看不出有什么諷刺的意思。口号，和人民一样，必須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或者用列宁自己的話来說，必須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运用，那就是說，要用来推进当时的政治任务。解决政治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布尔什維克取得政权。因此，当为了党的胜利看来有必要的时候，列宁就宣布了“一切政权归苏維埃。”到了七月，看来布尔什維克是不能夺取苏維埃了，列宁就攻击那个口号，寻找别的可以贏得政权的办法。后来，形势一度又有利于布尔什維克夺取苏維埃了，列宁又回到老口号上来。可是等到十月，政权已經到手之后，苏維埃的民主就意味着布尔什維克有失去政权的可能。在列宁看来，再提那个口号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了。

如果列宁是始終一致的，那末他也会得出結論，在他的党內，凡是反对他的政策的，客观上也就是人类的敌人。但是他并不跟着他

的理論邏輯走，而是跟着成功的組織工作的需要走，在这方面，他显示了他的天才。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利用和爭取自己队伍中具有不同意见的人們这方面，他也表现了伟大的才能。他能够跟那些沒有他就彼此不能共事的人們合作。这个邏輯結論后来由斯大林作了，并且給任何問題上的任何反对者都定下人类公敌的罪名。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列宁的党已經不需要進行革命了。

从二月到十月，在这个时期里，列宁跟他的全部对手相反，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政权。跟他們相反，他知道一支政治队伍是多么重要，以及如何有效地把它疏散开去，去获得政权。跟他們相反，他敢于以他的綱領和他个人对付一切。象他那样作为好的辯証唯物主义者，他的信念是毫不缺少那种包举宇宙的性质的。列宁深信他自己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工具，跟列宁相比，那个內心里深怕灵魂不能得救的克伦威尔，就象是革命前俄国小說里的一个成天作內心反省的人物。

卡尔·考茨基有一次把列宁比作俄国的俾士麦。这个比較在引起人們注意列宁所表现的高明的革命现实政治手腕方面，是合适的。不过俾士麦是容克貴族，他的性格不是統一的。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比拿破仑的多一点，他把他自己想象为古代挪威神話中的英雄，从阴险的命运女神那里搶夺帝国。列宁的性格是完整的。他創造了一个帝国，就好象那个帝国是写在定貨单上似的。他老老实实地装作他只不过按照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馬克思和恩格斯定下的方案行事罢了。列宁死后，布尔什維克們中間流传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使得他的一片虔敬之心感到高兴的。故事說，列宁到了圣彼得把守的天堂門口，敲門求进。“你是什么人？”圣彼得問道。列宁答話的时候，沒有說出他的名字，却恭恭敬敬地說：“我是馬克思的‘資本’的利息。”①

① 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中間也流传过这个故事，不过有了一些改变。不管这些改变值得什么，我也把它放在这里。列宁回答圣彼得說：“我是馬克思的‘資本’的利息。馬克思就在下面，并且当着我的面把地獄的大門关上了。”

列宁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在修訂他的路綫，或者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从这个立场轉变到另一个立场的时候，不感到慚愧、窘迫和懊悔。他承担实践上的責任，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历史解除了他的一切道德上的責任。在一个沒有多大信仰的人心中，会显得完全是伪善的事情，在他身上，都成为危急关头用以輔助高度原則性的灵活智慧了。那些在革命斗爭中，跟他斗得最厉害、拳打脚踢，无所不来的人，全都承认他的絕对真誠和慑人的道义力量。尽管他們非常憎恶他，他們却給他迷住。他除了为人类決定命运以外，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他的判断是不能用女人、朋友或者享受来动摇的，也不能用仁慈或怜惘来軟化的。柏克曼(Berkman)和高尔德曼(Goldman)請求他释放几个批評过布尔什維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率直地說："真正的、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同意我們的意见的：只有那些冒充无政府主义者的土匪，才被关在监獄里。"① 这当然是荒唐无稽之談，但是毫无疑問，列宁是信以为真的。当他劝告外国的共产党人，隐瞞他們的信仰和組織关系，打入各种民主組織的时候，他坚決相信，这就是忠实于"更高一級的"真理。当奥托·鮑威尔(Otto Bauer)把列宁提出的新經济政策解释作部份的向資本主义退却的时候，列宁真生气了，他憤憤然地說："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宣传这种事情，当我們說，我們要枪斃那些說这种話的人他們才大吃一惊。"② 在这里，正如在别的地方，值得重視的是列宁的态度，他认为在他不当权的时候，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他当权时，别人提出来，那就完全不对了。

直到目前为止，描繪列宁形象的书或传記，写得好的，并不多见。我們看到的，主要的都是在列宁去世之后，为了激烈的党爭而写的东西。要想了解他給同事們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要找一点这一方面的可靠材料，我們就得請教列宁还在世时，人們写下的少数特写。所以，列宁的同事，一个銳敏的观察家，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写

① 参看爱瑪·高尔德曼：«我的生活»，1931年紐約英文版，第764頁。

② «列宁选集»第9卷，英文版，第342頁。

的如下的几句話是非常有力的。“列宁拚命作他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权力可爱，而是因为他确信他的正确。他不能允許別人糟蹋他的工作。他对权力的爱是出于他的坚持原則和正确性，如果你愿意这么說的話，也由于一种不能从对方的观点来观察事物(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領袖是很有用的)的〔性格〕。”①

一个具有这样“伟大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魄力、組織天才、对群众心理的敏銳感觉的人，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久战疲憊之后、民气沮丧的大好时机里，究竟誰会統治誰的問題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間就可以见出分晓的。

* * *

法国的大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談到机会和历史的时候，告訴我們說：“最大的机会就是一个伟人的誕生。”这从两种意义上来說都是正确的。一个英雄的生物学上的潛在可能性从社会行为法則里推究不出来。从遺传法則里也推究不出来，因为遺传法則只是一种一般化的、統計学上的形式，而能够給我們产生个別英雄人物的則是細胞的特殊結构。但是一旦这个潛在的伟人誕生下来，而且只要他还在场，他对事物的影响就不是一个机会問題了。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影响是可以广泛地估計的(虽然沒有必要去估計)，正象我們能够預料軍事領导、工业領导和政治領导上英明或愚蠢的效果一样。一旦英雄上了台，我們应該控制他到什么程度，又能够控制他到什么程度？这个問題对于明智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有关系。

① 参看《革命的側影》，1923年莫斯科版。麦克司·伊思特曼給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英譯本作的序言里(第1卷，第15頁)也引用过这一段。

第十一章　英雄和民主

假如我們給英雄下这样一个定义：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創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那末，紧跟着下一步的推論应該是：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須永远加以提防。

这个簡单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說是不受欢迎的結論，正好包含在民主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之中。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領袖人物不能自己冒称具有英雄的能力。根据法律上规定的一定期限，政府必須取得被統治者的核准，而这种核准系采取自由給予同意的方式。既然，同意是自由給予的，也就是說，是在听取了反对者意见之后才同意的，因而，大家一致同意的政策或措施就体现着社会全体对之負責的意义，尽管它是由領袖人物倡議出来的。①

民主社会之中的領袖問題是个高度复杂的問題。正由于它的重要性，我們有充分理由来把它进一步地加以澄清。本章中，我們所要考虑的問題和其他各章不同，它是带有规范性的。其中包括着有关民主和民主的优点之若干价值判断。

中国的一句諺語告訴我們："一将功成万骨枯"。②这句諺語中含有的情感适切地道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經驗与智慧。如果那些为了英雄的光荣而受害的牺牲者們情愿表达意见的話，他們一定会带着悲叹、哀泣和咒駡来摹拟这句朴实的言語，不仅中国是这

---

① 关于"自由給予同意"的意义的詳細說明，可参看拙著《理性、社会神話与民主》，1941年紐約版，第13章；并参考1942年4月号《伦理学杂志》所載論文《民主底哲学前提》。

② 按照原文直譯应为："伟大人物是公众的灾难。"——譯者

样，而是世界到处如此。因为，总的来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以能赢得伟大的尊号，无不是凭着战爭、征服、革命和神圣的十字軍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可是这句中国諺語仅仅是描写过去的历史，而且并不是过去历史的全部。一个伟人有时也能够为大众造福。而伟人的缺少也决不就意味着大不幸就可因此而避免。其实，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人們往往还祈祷救星的降临。在他們所祈求免除的灾难之中，有时可能也包括着那早期的救星所遺留下来的統治。如果我們根据某些伟人所做的坏事，就来断定他們的伟大正是他們的罪行的泉源，那末，我們就只有把一切的天才和能力都得加以貶低了，因为天才和能力时常会被濫用的。

那末，伟人也可能是个好人吧。可是，一个民主社会还得猜疑他們！因为民主的精义就是被統治者要求参預有关自己福利的决定事項。而这种参預是和以下的希望相符合的：就是說：被統治者必須明智地来选擇和选举自己的統治者。——而其目标是为了达到：在当前条件允許的范围之內，要尽量滿足人們的欲望和需要。但还有比这个希望更加重要的，那就是以下这个信念：宁可要人們各自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之手——但不幸的是这个信念往往和事实相左。

民主社会的英雄（即指潛在的事变創造性人物）可能眞摯地相信自己能够接受民主社会据以为根据的那种哲学。但迟早他会觉得民主方式的两个特征是他所难以忍受的。第一，就是多数决原理，特别是当他坚信在某种重大問題上，多数是錯誤的时候。第二，纵然他相信多数是正确时，他也会认为它的作用过于迟緩。

沒有人会相信多数决的原理也能合理地适用于幼儿园、罪犯监獄，或者专为精神病者而設立的机构。我們所以承认多数决为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因为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整个儿地說，人們并不都是幼儿、白痴或罪犯。可是尽管人們能够服从理性，但人間事务当中的道理，大多数跟利益的衡量有关，而人們之間的利害关系又往

往是互有分歧的，因而，多数人认为合理的事也許会成为少数人的不幸。这就足以証明：对于民主来說，光靠多数决是不够的，但并非不必要的。而上述情况也絕非証明某些权利是不可放弃的和絕对的，因为沒有絕对不受限制的权利，而在某种情况之下，为了其他权利的綠故，总得把某种权利加以限制。

除了多数决之外，民主社会还必須加上另外一个条件：即只要某一团体承认把自由探討和民主表决当做調解利益冲突的原则，那末，任何其他团体都得承认这一团体主张本团体的利益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多数还可能是錯誤和不公正的，正如同那服从証据指导的人有时也还会发生錯誤，而那盲目行动的人反而会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为少数提供了可能性，使少数通过公开提出反面意见以教育公民，而能有变成多数的机会；这种作法实际上甚至已达到在政治上容許听取合法控訴的程度。在这样条件下，享有宣传鼓动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必須遵守大多数的决議，尽管他相信这个决議是錯誤的。

但是，如果有一派少数，他們的实际綱領是要用武力推翻民主政治制度，那末，他們絕不能援用上述論点作为在原則上应受寬容的根据。可是，任何特殊的少数也可能由于审愼和方便的理由而受到寬容，例如，在某一少数派反对在当时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另一少数派的场合，或者是，在压制这一少数派会成为一个不利于民主的先例，而这个先例的适用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其他眞正愿为民主服务的少数派身上的场合，就可能如此。

* * *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这种“潜在的英雄”，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的认識。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責任感迫使他必須为他自己的见識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誠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见識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数人一味頑强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有丧失了英雄活动的机会。这英雄就作为一个“乡村隐士”而湮沒于历史

之中了。

但是，卓絕的才能和堅定的識见一定会要求表现。只要这位英雄不拒絕把政治作为他的一个活动范围，他的任务便是如何取得多数的承认。因为，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絕不会冒失地承认自己愿意离开多数，或者让别人知道他有这样打算。而为了追求多数的承认，广泛地說他可能会利用一种耐心的教育方法来說服他們，并且倚仗着他自己的識见本来的合理性来打开一条出路。

只要他的活动到此为止，而且仅仅到此为止的話，英雄对于民主社会是无害的。这意味着：他得甘心自愿招致失敗。但这位英雄也可以学会煽动技术，而利用民主政治的工具本身来敗坏民主的品质。不过只要民主政治上的种种控制性措施还沒消除的話，英雄即使利用煽动手段也得倚靠多数，引誘多数和迎合多数。而由于他也往往利用种种手段来腐化他所領导的集团，他就会給他們带来一种輕蔑心理。在这过程中，如果他自己的意志也为之动搖，而见識也变得模糊的話，他将仅仅成为另外一个政客而已。他成了一个丧失机会的英雄。但是，如果他的意志和见識仍然是坚强和清楚的，他为了贏得多数的承认，必得利用煽动手段来"愚弄"他的附和者。他还得开辟一个公开的鼓吹讲坛，以此为基础而取得人們的信任，并且利用贏得的信任来酝釀一个秘密的政綱。这时，他便成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了。他的自信越强，他的企图越是大公无私，他的英雄理想越是迫使他坚持要达到目的，那末，对于民主的整个儿理論基础来說，就越会成为一种暗害性的威胁。特别如果这位英雄或潛在的事变創造性人物相信他自己是他的識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时，就更是如此。

不过到此为止，我們都是在假定：这位英雄的见解不能借助于自由討論和明智的研究来向各方面推荐它自己；并且假定即使他的见解被采納的話，也得仅仅借助于狡猾手段和煽惑的詭計。现在我們再来假定多数被这位英雄的见解正确地說服了，相信他是对的。这时，这位英雄还是会觉得民主政治的种种程序是束縛他的手脚的枷鎖。因为这些程序未免研磨得过于緩慢了，而許多事情是来不及等

待的。如果他自信他充分认識到社会的眞正福利，并且相信那是正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那末，英雄便很容易造成既成事实来对付它。一切足以牽制和阻碍他的见解的善意反面意见，他都会把它看做客观上的背离，而很容易把它作为这种背离来当众加以嘲笑譴責。并且，他知道如果他日后成功的話，他的举动是会大大受到各方原諒的。

但是，民主政治是否必得行动迟緩呢？絕不，因为它也可以利用一种把权力委派于領袖或英雄的办法来加速它的步調。不过，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这也只能减輕迟滞的危险，而不能把它完全排除。因为一种民主政治絕不可能把一切权力于事先尽行委派出去，而仍不失其为民主政治。而紧要关头的形势永远是和那尚未委派出去的权力有关的。既然，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能把权力永久地委派出去，所以，每当权力的委派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当儿，便会发生严重情形。此外，权力委派的需要，永远是发生在那危机或非常事变迫切燃眉的时候。可是，这个时机何时到来，又該由誰来决定呢？

英雄永远急于攬取更大的权力。就他的天职来說，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他急于获取新的权力，正如他不情愿放弃那已經得到手的权力一样。而在一个扰攘不宁的世界里，除非它把种种大权委派在領袖人物的手里，沒有哪个民主社会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同时，社会不情愿給予的权力，在收回时，也必然显得十分急切的。全部問题就在于如何抓住时机，——至于究竟什么时候才恰合时机，英雄和社会对此很难有一致的意见。

一个領袖，是否会滥用委派給他的权力，来达成他的英雄的事变創造性的事业，那是沒有任何保証的。不过，一个民主社会，每当时机紧迫，必須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时，如果为了担心以上的情况而拒絕把权力委派出去，那是十分愚蠢的。另一方面，委派出去的权力也可能并无被滥用的危险，但由于它永远会成为滥用和篡夺的誘惑，所以，每当非常时期业已渡过之后，民主社会就应該准备着随时把权力收回，不这样做也是愚蠢的。

一个民主社会不仅会受到它的英雄人物的危害（尽管为了社会

的生存，这些英雄人物有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会受到任何公民集团的危害，只要这些公民集团对于它們所已經享受到（或是希望能够享受）的利益和特权是更加热衷，而对于取得这些利益和特权的民主程序却不那么关心的話。这就因为这些集团宁可更加珍惜那旣得的和平、繁荣或社会状况，而不那么重視足以維护（或改变）这些事物的民主方法，这样一些集团就会觉得为了爱护这些旣得福利而不得不招来英雄人物，即使牺牲民主也是理所当然的。試看那西欧的各个保守阶級，因为相信民主的立法机关无理地剥夺了私有財产权，而竟致不惜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扫清了道路——就是一个生动的教訓。誠然，他們也口口声声自称效忠于民主，但那不过是为了打开局面的口头禅而已。至于那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的大多数中产阶級或甚至一般劳动者，就不是那样。对于他們，安全、物价稳定和就业机会比民主来得更有重大意义。他們应該学着懂得：如果一旦失掉民主，那末，为之而牺牲了民主的那些福利，不是更加把稳了，而是会更加降低的。

*　　　*　　　*

如果我們把历史上一切事变創造性人物列入英雄的队伍，那末，我們就会发觉：在所有民主社会的历史上，这种英雄人物是非常稀少的。这种现象頗为符合民主社会的精神。事情应該是如此的。

民主社会往往非到英雄人物已經逝世以后，不会輕易給他們以贊頌的。这似乎可以說是民主社会政治上的忘恩負义，但这种恶名昭著的现象确乎包含着一种很大的明智。在民主社会里，尊敬这些領袖人物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他們不受权力的誘惑，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明知自己是正确的，而大多数是錯誤的，他們也随时准备着放弃他們旣得的威权地位。

伟人的降生并不期待别人的允許。当然，也不会期待民主社会来接受他們的領导。他們只是为了完成自己认为应該完成的任务而自寻出路的，除非是被一种敌对的环境压得粉碎，或是由于事变的波折而受到孤立。因此，当民主社会需要領袖人物时，用不着专去寻訪

这些英雄。因为只要他們存在世間，自然会自求表现的。一个民主社会，即使是在利用这些英雄人物时，也得时常加以提防，免得受害，不可信赖他們的意图，尽管这种意图一般是可敬的，而其中也往往含有救世主的成份。民主社会所应該信賴的乃是：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結构，权力和利益中心由大多数来掌握的原则，教育和道义精神等等。

民主社会中教育所树立的英雄的理想目标，必須跟事变創造性的个人有所不同。他所需要的英雄，应該是供养在思想的万神庙中的伟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的人物。因为正是得由这些人物来負責塑造公民的种种明智的理想与社会态度，而一般公民要是沒有学問，缺乏敏銳感觉，和教育素养，就不能实现民主的諾言。假如我們对于民主果然有眞摯的信仰，便必得承认：正是那些受着基本政策影响的人，必須直接間接地对此（指基本政策）加以批評。而他們如果要能够作到明智的批評，要知道何时委派权力，何时收回权力，并且要亲自参預政治，以便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他們就必須：培养一种分别事情輕重的敏感，对于雄辯的大話要不为所动，而对于隐藏在这些大話背后的东西则有着一种强烈的兴趣，对于互有联系的問題，要具有分析能力，并且能够愼重考虑可以利用的証据。

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就是凭着政策的建議来行使他們的領袖职权的。至于这些政策是否被采用以及采用与否的理由如何则决定于民主社会的代表。这些代表是由一些本身也可能当代表的个人选举出来的。所以，一个成功的民主社会可能会尊敬他們的政治家；但对于那些导师则必然是更加尊重——不管他們是牧师、科学家、詩人、法学家或哲学家等等。因而，眞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領袖，而是象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給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識的人。

现代語言学上的习惯所反映出来的有关英雄与群众或平常人的那种强分畛域而不公平的区别是应該坚决打破的——这是民主社会的一項任务。要达成这个任务，須得把"英雄"这个辞儿的意义重新

加以解释;并且应該知道:"英雄人物"是能够創造出来的,只要我們把社会机会巧为安排,使之更适合于有专門才能的人的发展。我們叫作"平常人"的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人們之間的种种能力上的歧异是比我們的社会安排所能注意得到的远为复杂得多。

如果我們把社会机会加以限制,只承认少数典型的杰出人物,那末,与此比較起来,那广大的群众纵然千差万别,却都显得是迟鈍的凡愚了。反之,如果我們把社会机会加以扩大,好让每一个有着才干的人都能得到发展和表现的刺激,那末,具有独特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范围便为之增加了。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人只要他能把工作做好,对于公众的福利有着独特的貢献,他便是一位英雄。如果认为跟英雄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崇高和荣誉只能到那不顾人的流血和苦难的事业中去寻找,那便是十足的偏见了。任何阶层的日常劳作,都有它自己的奋斗、胜利和安靜的死亡等等机会。一个民主社会应該那样来設計它的事业,即絕不是只让少数人有机会取得英雄的地位,而宁可把那句"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口号作为规范的理想。所以称之为"规范的理想",因为如果认为它永远能够照字面意义确实得到体现,那便是一种空想。作为一种规范的理想,它替各种政策指示了方向,以便使得社会能够最好地发挥人們可以利用的任何力量。

人們可以利用的任何力量究竟是指的什么呢?理論上那是有限制的,而实际上那是无限制的。如果沒有一个对于这些力量的表现予以鼓励的环境,就沒有一个人能够独断地說出这些力量的性质和具体形式到底是什么。同时,也沒有人能够确实說出这种力量的明确限制,而必得承认:人类意志不断的向上努力能够冲破任何迄今未能冲破的藩篱。

一个民主社会应該鼓励人們怀抱以下这种信念:即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召喚,和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选上。其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选上,是因为通过人們所具有的能力和潜力的自发性的变化,自然界本身呈现了丰富多采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一个設計得很明智

的社会当可把它尽量发揮，以便作为挑选的出发点。这种千差万别的变化乃是人格和价值发生新的萌芽的泉源和希望。在一个合作互助的环境里，把这种信念（即指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选的信念）奉行起来，便能鼓励人們继續不断地努力，而其結果往往会把希望变为成就。

* * *

意大利的一派著名的理論家莫斯加(Mosca)、帕雷塔(Pareto)和米雪尔斯(Michels)等，对于民主給予了一种貌似有理而根本上錯誤的批評，[①] 我們这里的不具备事变創造性人物的民主概念和他們的看法刚刚相反。以上諸人都以不同方式試图証实民主政治的不可能。而他們的主要論証是：一切政治統治都包含着組織，而一切組織，不管它的神話說得如何如何民主，迟早总会落在少数中坚人物的实力控制之下。各种社会的历史，虽然表面上代表不同的政治形式之継續，实质上无非是不同的政治中坚人物的继續。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其中隐藏着以下两点事实：(1)統治的中坚人物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2)这些矛盾解决的方式总是不符合民主精神，而有利于統治者一方的。就这些中坚人物也在創造历史的范围內来說，甚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他們的杰出的領袖人物也都是英雄，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事变創造性人物。

这种論証的全部力量是以：不理解各种理想（包括政治理想）的特质为其基础的。同时，以上評論还忽視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問題永远是特殊的問題；而且这些問題容許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之間能有选擇的余地，这些行为过程有的足以加强或扩充，有的足以减弱或縮小特殊的政治理想。最后，它还低估了各种社会之間的重大差异（尽管这些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沒能达到一定民主理想的标准），以及在那为了实现种种理想而永无休止的过程之中，各种制度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事物和人的性质，沒有哪种理想是能够十足地体现出来的。

---

① 以前我曾对这派理論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加以詳細說明和批判，参看《理性、社会神話与民主》，1940年紐約版，第119以下各頁。

世間并沒有什么絕对的健康，絕对的聪明，絕对的民主，一个絕对誠实的人，——或一个絕对的胖子。可是，我們如果能明智地利用这些理想，便不难把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按照他們的强弱、智愚、胖瘦的不同程度而加以排列。对于国家也是一样。絕沒有絕对的民主国家，但我們却不难說出哪些国家民主更多些，哪些国家民主更少些。一句話，理想都是随情况而变的。也就是說，乃是建立組織或改进組織的各种原則，而不能等同于任何时間和地点的任何特殊的組織。

我們如果替民主社会下这样一个定义：民主社会的政府建基于被統治者的自由同意之上，① 那末，显然沒有哪个社会是一个十足的民主社会，即使这个社会的成員人数极少，甚至少到不必把权力委派給代表就能在一个地方开会碰头的話。因为我們永远无法担保这种同意是自由給予的——也就是說：是一点儿也不受无知、雄辯、或感情的束縛。而且由于社会分工的关系，各种决議总得交給各个个人去执行，而不能交給全体大会去执行。因此，也就不能担保这些决議以及它們所賦予的裁夺权一定会按照决議当时的精神来执行。

那末，結果怎样呢？是否民主就是不可能的呢？决不，正如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享受十足的健康，就断定他不能是健康的一样。当我們承认了缺点之后，問題就变成：怎样糾正这些缺点——亦即怎样利用行动、制度、抑制或拘束的办法来糾正它。而这些行动、制度、抑制或拘束办法等等本身都是由民主原則或民主理想当中引申出来的。当然，所有这些糾正办法也都不够完美，可能会失敗，而且难以保証的。但我們决不因此就来否认它。假如我們是民主主义者，我們一定要継續来改进它。我們还要用这个过程的各种結果来检驗那沒有得到实现的民主原則（那是我們作为随情况而变的指导方針的东西）是否正确。

莫斯加、帕雷塔和米雪尔斯都强调以下这个事实——即每当一个民主国家把权力委派出去，而政治組織已經建立起来的时候（在一

① 关于这个定义的詳細分析，可参看同上书第285頁。

个充分复杂的社会里，必得这样做），則政府的种种决議将会是更多地反映統治者的利益，而更少地反映被統治者的利益。这一点是千眞万确，无可怀疑的。

那末，結果怎样呢？决不能因此就說民主是不可能的，只能說它是困难的。在某种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之下，民主是会有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多的困难。但只要我們堅持民主的种种原則，那末，糾正办法还是会有的。这些糾正办法就是要：想出种种特殊的机构、措施和抑制办法以便：（1）增加被統治者参預政府的机会；（2）减少各項权力——包括教育权、宗教权、經济权、政治权等等——在統治者手中集中的程度；（3）給被統治者以重新委派或收回委派权力的命令发布权。这里也一样，种种糾正办法还会有缺点的，但只要我們相信：凡是其利益能够受到政策影响的人們都应該享有发言权（不問是直接还是間接地控制政策的决定），那末，方向总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謂方向即指那永无休止地把社会程序加以民主化的方向。究竟是否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們自己。

誠然，我們总得有一个統治中枢来管理政府，——这是眞的。正如我們总得有一个医务中枢来管理卫生一样。而且，不論是好是坏，一个統治中枢总得比那医务中枢掌握更多的权力。但是，統治中枢并不一定要比那医务中枢更长久；或者甚至不一定須得一样的长久。只要那統治中枢的作用不越出民主范圍的話，我們便能对于这个中枢有所选择。当这个中枢里面的人物须得和外面的优秀人物展开竞爭的时候，那优胜者为了取得优胜地位必須向被統治者付出一定代价。至于这笔代价究竟多高，則至少部分地决定于被統治者所提出的要求。①

---

① “对于工人群众来說，他們的胜利的領袖們所宣布的每一次‘最后的胜利’，即使是眞正向前跨了一步的話，也不过是他們那个为了更多的〔收获〕和总是为了更多的〔收获〕的永无止境的奋斗当中的另外一个起点而已。”参看卡尔渥頓（V. F. Calverton）主編的《社会底創造》，第892頁，麦克司·諾麻德（Max Nomad）所作的《主人們——老的和新的》。

摩斯加，帕雷塔和米雪尔斯等人的思想，其巨大的局限性乃由于他們沒有重視：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有着种种可以利用的特殊制度能够使我們对于中枢里面的人物来加以选擇和牵制——而各种特殊制度各具特异的优长之点。他們忽視了被統治者能够通过种种具体办法(包括：压力集团、罢工、公开辯論、审訊委員会、广播討論会、向新聞机关及其代表投书和通电話、請愿、群众大会、預选会和选举等等）来实际干预一个民主社会里的政府基本政策的制定和决定大政方針。①

有人提出这样的难題，說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力必得由一个有組織的少数集团来操纵——为了对付这个难題，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以下几个問題：一个民主社会能否罢免它的統治中枢？一个民主社会在罢免它的統治中枢这一点上是否比非民主社会来得更容易？或所出代价更少？关于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几乎毫无怀疑余地的。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証据，在在証明：民主社会能够罢免它的統治中枢，而且一般地要比非民主社会来得更容易。結果，政治中枢的不断更换正是一个复杂社会政治程序上应有的特征，而这点决不应看作对于民主的控訴罪状，或者是民主不可能的証明。今日了却今日事就够了，不必管明日的問題！

在摩斯加、帕雷塔、米雪尔斯等人著作表面的邏輯論証背后有着以下两个重要假設：第一，人性是固定而不可移的，因此，我們也就能据此預料：民主在实践上一定要失敗的。而其失敗并不是指那种天眞的意义：即十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含有这样的意义：即一种在实行着的民主制度由它原有理想的角度上来說，就是不可能搞得更好的。第二，一个社会里面，自由和民主总量的多少，决定于一个已知的规律。这两个假設都是謬誤的。

既然这几位社会哲学家的主张是以人性的恒常不变为其根据，

---

① 可参看1942年4月号《伦理学杂志》第299頁以下：格林·毛洛(Glenn Morrow)所写的簡短而出色的評論。并参考阿塞尔·本特来(Arthur Bentley)的重要而被人忽視的著作：《政府程序》，1908年芝加哥英文版。

他們的全部政治智慧就不过是替人們拟出这样一种单純的选擇：要么是統治别人，要么是被别人統治。但我們却不妨主张：人性当中絕沒有任何东西把我們局限在这样一个单純的选擇之上，而我們这样主张絕非空想。就因为在以上的单純选擇之外，必須配合以其他的选擇。誰是統治者？对誰来統治？統治多久？在什么样的条件和限制下来統治？而这些問題正是理智、实驗、批判的适应、以及政治上的发现等等的用武之地。

一个社会里面，自由与民主的数量多少，质量如何，决定于很多的条件——經济組織、教育、宗教、传統等等——这里不过略举一二。但这一問題也决定于我們愿为它而奋斗的决心，而这一因素的决定作用絲毫也不弱于其他因素。民主本来就是困难的，而正由于許多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人，实际上乃是极权主义者的假冒，就弄得民主更加困难。道义所在应該是加强斗爭，而决不是放弃斗爭。

第十二章 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

对于历史的理解，如同人类評价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具有种种风格的。这里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看法，从那把人看作环境或局势的产物这一极端，到那把人看作无所不能的另一极端。这两种极端看法都不能靠証据来証实。事实上，这些看法的本身結构就使我們难以知道它們究竟以什么为証据。尽管这样，对于特殊問題的如何处理，它們却有着重大的关系。

认为人类的前途早已决定，事物的未来形式，如今就已确定而不可变异——这种态度自然会对于那到处都遇到的可加选擇的具体問題怀着一种藐視的心情。反过来，认为在任何历史时期，人們都能够翻天复地，而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或坚强的意志——这种态度自然会导致对于理智活动的限制条件加以忽視。今天，在西方世界的輿論界里，第一种态度是頗为占居上风的。未来的波动被他們描繪成一种注定的命运，那不仅会改变我們的經济制度，而且也会破坏民主文化的任何最后逃避所①。他們把走向极权主义政治統治的趋势，看作經济发展的一个自然后果，和总体战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承认下来或加以悲叹。那些在資本主义全盛时期对于經济决定論加以輕蔑的人們，如今却改信了这种理論的主要教条，即认为一定的經济制度能够决定一种、而且仅只一种政治和文化形式。尽

① “我們被那不可預见的和不可抗拒的社会——文化潮流所驅使，正如同尼加拉瀑布边上的一块大木头，无可奈何地从一次危机和灾难向另一次危机和灾难漂流。”参看索罗金(Sorokin)：«我們这个时代的危机»，1941年紐約英文版，第130頁。并参考他的«文化与社会动力学»第4卷，第768頁。在斯宾格勒和湯因比的影响更大的著作中也表現出社会宿命論的一种同样神秘的看法。

管他們能够設想資本主义会有許多不同的政治变形，但却把社会主义簡单地看作只能象希特勒或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那样。这一类广泛传布的态度和信仰植根于这个时代的种种客观条件里。不过我們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这些关于历史的思想究竟起因于什么，而是它們是否站得住，以及它們包含什么样的假設和这些假設是否眞实。

*　　　*　　　*

首先，我們得注意一下：那些相信人类社会前途决定于已知的规律的人，十分重視我們对于这些規律的认識。他們强調：究竟我們是认識这些規律还是对它們完全无知，其后果是十分不同的。为什么？因为我們如果认識这些規律，就能有力量引导我們的前途。但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相当范围（即那受人类认識或无知的影响的范围）并不是决定于原来的那一套規律，而是决定于另一套規律——那是作为人类的认識、評价和活动的后果而发生作用的。而只要我們相信：人类的认識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們便不能再相信：前途是如此固定不移，以致不容許任何选擇余地。

那末，我們究竟怎样理解那些被假定为具有鉄一般的威力，能够决定我們的前途的历史規律呢？粗略地說，历史上的規律就是存在于各組事件之間的一种决定性关系，我們发现了这种关系，就能倚靠它来解决問題、克服障碍、和預測将来。可是，这其中也包括着物理規律和生物規律。而历史規律的特异之点乃是：它們所关涉到的各組事件是特指：人們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s）而言，而这些人們是作为有組織的社会团体的成員来看待的。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員来看，人們的行为是以理想、习慣、传統以及与"文化"这个人类学名詞相联系的其他行为方式作为标志的。

从而，历史規律的主題总是包含着：有关作为社会成員的人們的协同的和相互的行为或文化的东西。甚至当我們打算参考那些本身受物理規律控制的环境或事变来解释历史活动时，这一点还会是眞的。所說的受物理規律控制的东西，就如同土壤中有无貴金屬和石

油的矿藏，或者象旱灾、水灾、地震的出现等等。这些物理条件和事变在历史和社会事务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并非作为物理因素来看待的。它們之取得这种意义，仅只当它們和人的行为或利益发生关系时为限。因而，美洲大陆蕴藏着煤矿、鉄矿、和石油矿等等事实并不足以解释美洲印地安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而对于外来的美洲移民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来說，則很多可以此来解释。正如本特来所說："当我們对于地下的金矿沒有什么作为，或者不打算有什么作为的时候，它对于社会研究毫无作用。可是，当我們喧嚷着要探勘金矿的时候，地下有无金矿就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了。"①

既然历史规律的主题牵涉到人們組成的社会集团之間的关系，那就意味着須得参考那些常常可以用心理规律来描述的人类行为。可是，光靠这些心理规律永远不能解释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因为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决定于人类和环境的物理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每当我們要认識历史和社会之前，必須先对自然有个认識。当我們說刺杀愷撒的是勃魯吐斯(Brutus)，在这之先須得了解一些死亡的生物学意义和杀人工具的物理学意义。尽管是受同样心理学规律支配的人們，他們的历史活动和社会行为却会有着千差万别的变化，这就說明心理规律不能解释人們的历史和社会行为。这些心理规律，只有当其和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和历史发生关系。"任令人們的欲望、技巧、目的、信仰是怎样的，事情的发生还得是物理条件（如同土壤、海洋、山岳、气候、工具、机器等等千差万别的东西）和人的因素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②

当我們有把握将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看作具有相对的自发性以后，还須进而追問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它們是人类行为的条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們会被人类行为所改变。让我們考虑几个典型情况。我們介紹这些情况，純粹是为了作为例証說明以下即将展开的

① 本特来：《政府程序》，第193頁。

② 杜威：《邏輯：探求的理論》，1939年紐約英文版，第492頁。

論点：

1. 假使有人向某一政治团体提出这样一个建議案，要推荐某一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充任美国总統的候选人。这建議遭到了反对，理由是：纵然宪法上沒有任何条文阻拦他們的被选，但美国历史上却表現出来美国人政治活动的一种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这个候选人是“注定”要失敗的，尽管事实上，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这个规律就是：“在美国的最高級官吏的竞选中，天主教徒或犹太人絕无获胜的可能。”这规律是由經驗当中归納出来的，而为美国公民的其他方面的行为通則所証实，——这些行为通則是指社会学上或心理学上的一些概括，例如宗教传統和社会成见等。

那末，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特征究竟怎样呢？须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它并非把选举一个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做为切切实实的“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它所断定的不是这样选举的不可能，而是“靠不住”。第二，这个规律并非断定：每个新教徒都会对这个候选人投反对票，或者是，每个非新教徒都会投贊成票；也不是說：任何特殊的个人将会这样投票而不是那样投票。它仅仅是說明：相当数目的新教徒将会光是根据这位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就投反对票，以致能断定他的竞选一定失敗。第三，这个规律告訴我們：在一系列人們的选擇和决定之中，有着某种的分配的模式。而我們是知道的：人們的选擇和决定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影响”的；而只要我們改变了它們在其中发展的那些条件，就能改变或变革它們。第四，这个规律的有效性限于某些历史領域。我們如果将它适用到其他一些象英国那样的国家的总統或內閣总理的选举上，那就是錯誤的；尽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是信奉新教的。

我們这里所談的规律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实踐家都得加以考虑的。尽管如此，如果某些負責选举提名的人竟把这个规律看作是具有拘束力的，或者看做带有决定性的任何场合的行动指南，那就未免太愚蠢了。这位候选人可能是一位軍事方面的民族英雄。他的提名也許由于另外一个规律的强制作用，即：美国人民对于成功的軍

事英雄人物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他們所以选举他做官就是为了向他表示謝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相信：发生作用的是后面这个规律，而不是前面那个规律。不管是哪个规律吧，如果我們的決定单純以它为根据，那我們就是在假設：选举的前途決定于过去曾經发生作用的某些固定的行为模式。同时，也是在假設：我們的決定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对于选举結果不会有什么值得重視的影响。前途是单純地決定于过去，而不是決定于过去再加上插进来的如今。当然，在我們所考虑的情况当中，这些假設都显然是錯誤的。所說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不能当选国家的最高官吏"这个规律也許会由于我們积极要求选举这样一个人物的結果，而不再发生实际效力。我們越是熟悉养成人民种种态度的条件，我們越能够明智地改变这些条件。假如，某个国家为了爭取維护民主信仰的生存而卷入战爭之中，这时，我們便能够去到这个国家而向該国人民要求他們表示对于他們所信仰的种种原則的忠誠。我們这样做是倚靠其他的各种规律。但給予这些规律以发生作用的机会的，仍然是我們。因为我們的行动改变了当时当地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背景**。

假如这时我們的努力很好地組織起来，而我們的政治运动是为了坚決发动一次具有眞正教育意义的民主十字軍，那末，我們便会发现：所謂"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不能选任美国总統"这个规律的作用，并不会超过以前被人們看做同样公平和同样正确的另一规律："任何連选連任的总統不得超过两任。"我們并沒有废除这个规律，但由于我們行动的結果改变了条件，以致使得这个规律失效了。目前我們的干涉行动，对于前途的結果究竟能够給予多少影响，如果单純作为从过去經驗上归納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将是一个程度問題。在某些事务上，前途是能够准确預測的，很少牵涉到我們的努力究竟达到怎样。在其他一些事务上，我們的努力或不努力比起其他的已知因素来都可能更有决定性意义。

2. 試来考虑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假定我們打算預測罗馬教廷下一任教皇是誰。我們应該多少注意以下几条"规律"：(a)任何新教

徒或犹太人不能充任教皇；(b) 任何信奉天主教的妇女不能充任教皇；(c) 不問是誰充任教皇，他总会是一个意大利的紅衣主教。所有这几条规律都不是必然性的，不过，当我們作以上預測时，第一条规律的束縛力大于第二条规律，而第二条规律的束縛力又大于第三条规律。这意味着：一个非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男教徒当选的机会多于一个天主教女教徒；而后者当选的机会又多于一个新教徒或犹太教徒。理由是很显然的。因为第一条规律的被违反或失去作用，实际上須得把教廷組織的性质完全改变，并且須得放弃基本的神学教义。而实际上这将等于解散教廷。可是，事实上目前教廷組織的威权正在日益增加。过去它須得与之斗爭的各种压力逐日在减低，而它自己对于公共事业的影响却逐日在增高。其次，只要沒有任何怀有敌意的压力或反对力量，那些控制了一种成功的組織而有效地为它們各自的利益服务的人，决不会来消灭这个組織，或甚至也不会深刻地来改变过去有利于它的教义。

第二条规律的束縛力所以小于第一条是因为：如果第二条规律失去效力，其結果至多不过是初步改变了神学教义，而用不着根本改变教廷組織。关于妇女是神圣秩序的一个消极因素的教义，今天已經不再是能接受的了。而正如教廷史上所雄辯地显示出来的，神学教义上的改革总比組織上的革命要容易些。但至少就可以预测的将来情况而論，第一、二两条规律对于我們的預測还是有着束縛力的。以目前所能做到的事情而言，这两条规律的废除，可能性还是极少的。

仅以改革的可能性而論，第三条规律情况略有不同。以前也曾有过非意大利籍的教皇。而过去几百年当中历任教皇所以大都是意大利籍，主要由于意大利神职人員的压力。由于教皇对意大利內政有干涉的实权，設想一个异邦人，或一个在国外有着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籍公民如果占居教皇地位，其結果将会引起何等糾紛？这是很容易看到的。尽管这样，如果天主教徒的义憤感情被組織起来以反对意大利現存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失敗以后，继之而

起的是一种进步的和民主的制度，则下一任教皇也很可能是非意大利国籍。

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天主教神职人員可能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并且由于受了他們本国政府的鼓动，而对紅衣主教团发生影响。另外，再加以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天主教徒对于該国紅衣主教們施加的压力，汇合一起，其結果也可能是竟然选出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即使向这个方向活动的結果如何，还十分可疑，但也不应把成功的机会完全抹煞。

以下一种情况是更加复杂的。

3. 当世界上的杀人机器越来越变为毁灭性的时候，为了保卫现代文明，不让它淪为人类的屠宰场，我們必須解决如何防止战爭問題。很少有人会公然宣称喜欢战爭，而每一个人都会悲叹战爭的代价之大。纵令战爭的双方損失不必一样，但任何持久性的战爭对于任何人会不会在經济上有利，这一点是极为可疑的。那末，为什么大家不来一致承认象托尔斯泰那样的絕对和平主义作为解决这个問題的手段呢？让我們姑且假定：如果每一个人、或者几乎每一个人事实上采納了托尔斯泰或甘地的主张，则战爭将会成为不可能发生的。我們将仅从这种主张对于带来有利結果其效力究竟如何这一方面来考虑这个建議。

将来很可能有相当数目的人們轉变为和平主义者，好来防止战爭的发生，这在邏輯上并非不可設想的。但为了传播和平主义的学說，有許多关于社会行动方面的"规律"都得暫时被擱置起来才行。因此，人們才把采納和平主义的远景看做一种空想而加以抛弃。有些人也許为了一种理想的內在价值，或者为了某一种学說含有眞理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但絕大多数的人(不問是过去，还是现在)，其所以肯为理想而奋斗还是为了增进比較具体的利益：譬如安全、长寿、或者物质上較好的生活。托尔斯泰的主张，——做神圣的人比仅仅活着好，宽恕敌人比懲罰敌人好——到了一个相当时期，可能会赢得絕大多数人的首肯：这一点是不能絕对加以排除的。但在相当的

人数会得轉变成为这种态度以前，局势总是有利于那些非和平主义者，他們利用那些身体力行絕对和平主义的人們的不抵抗行为而增进他們自己的现有利益。絕对和平主义者不肯为他們自己的生命和財产而战斗。同时，也不肯为他們的朋友、子女和同胞的生命、財产而战斗。在这种场合，就会有其他的人（可能是来自那些国家或地区，在那里，和平主义的理想是会受人嘲弄的）发现到：成为一个侵略性的好战分子来打倒和奴役那些和平主义者，确是对于己方有利的。这时，和平主义者所抱的防止战爭对于人人有利的主张就会遇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事实：在一个其他的人都是主张和平主义的世界里，某些人利用这种局势向和平主义进攻竟会是有利的。結果，为了使得和平主义者的主张能够确实发生效力，絕大多数的人們应該立即采納和平主义，以便实现和平主义的普遍利益。因为，在每个人都成为和平主义者以前，那些非和平主义者还是可以用反对和平主义为手段来达到自利的目的。唯一的經常有利可图的战爭就是反对和平主义者的战爭。

那末，要使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立刻采納和平主义的主張，其可能实现的机会如何呢？机会未免太少了。我們若是专专靠它来防止战爭，那不免是个大傻瓜了。世界上貧困的人越多，討厌的事越多，恐怖的心理越大，則这种机会也就越少。因此，我們必須宣布：除非今天社会里人們的种种特性来一个奇迹式的变化，要想把絕对和平主义当做防止战爭的实际手段是注定要失敗的。每一个絕对和平主义者，纵然希望着和平主义哲学的宣扬可以防止战爭，但即使事实証明他的这个希望沒有成功可能，他也决不放弃他的和平主义哲学，这是很有意义的。換句話說，他坚持和平主义哲学的最后根据是跟把它当做防止战爭的手段的效力如何完全无关的。

那末，这是否意味着：我們必得承认一个规律：即世界上，国与国之間，阶級与阶級之間，总得互相砍杀呢？如果我們把种种重要制度，不管是經济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还是伦理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一切迄今存在于历史上的制度作为社会背景的永恒不变的特征而接

受下来，这个問題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我們相信：我們能够利用关于人类行为的其他规律来改变这些制度，实驗和設計新的制度，并按照其实践的結果来矫正这些制度，則这个問題的答案就是否定的。世界上，战爭的頻度与强度确是可以减少的，只要人們通过各种和平的社会程序就确实能够以更低的代价来取得他們认为（这个认为往往是錯誤的）战爭能替他們贏得的东西。人与人之間的战爭并非命定而不可移的。但如果基本利益上的冲突不能通过战爭以外的方法来取得互相滿意的解决，人們还是逃脫不了战爭的命运。

4. 现代民主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資本主义的生长而发展起来的。自从資本主义經济通过工业資本阶段到金融資本和垄断資本阶段而达成熟的境地，許多伴随着民主哲学而来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了。經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限制来自資本主义之下的大规模工业組織发展的結果。政治方面的限制則由于国家出面积极干涉工业，并且有时是和种种垄断措施合作，有时則加以遏止。机会均等——这个民主哲学的理論与实践的中心——在杰斐逊的农业經济时代，是比在巨大的公司、托辣斯、加迭尔和种种垄断組織的二十世紀时代更为明显得多的。

許多忠实于杰斐逊的民主哲学的人相信这种民主哲学在今天的資本主义世界里已到垂死的关头，并且相信到了明天的集体主义世界上，那就是它寿終正寢的时刻了。由于他們不能自信自己的哲学能够加以改变，以重整现代工业主义世界的旗鼓和重新来引导它的方向，他們就急于要返回到早期的农业經济去，返回到昨天的那种更为簡单的資本主义方式去，把它来作为民主生活的哲学得到捍卫与恢复的唯一物质基础！

对于这种建議的唯一答复只有：在經济上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所謂經济上的不可能包含着一个与經济上的必然性相反的概念。那末，所謂經济上的必然性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答复对于农业上的民主主义者来說是个有效的答复？所有各种的早期經济制度，它們的理想和价值，我們都将保存下来作为我們自己的民主

哲学的完整而不可缺少的因素；但若是作为一种行动綱領而提出来建議我們走回头路，那末，我們这里所說的話都可以作为反駁他們的充分理由。

那末，我們为什么不能回到一种早期經济去呢？一种經济制度毕竟是用来規范人們行为的一套社会关系。那是出于人們的計划安排，而不是什么上帝給予的，或自然賦予的事实，而是历史上人們的行动所产生的結果。誠然，作为一种邏輯上的可能性，我們不妨設想在任何时期实行任何的經济制度，但恰好因为一种經济制度既是一种人类的經济，也是一种历史的經济，它的基本关系是不能随意更改的。

除非是破坏了我們的大都市，解散了我們的大規模工业生产，改变了我們的銀行和运輸制度，并且不怕产生灾难性的失业，把巨大的工厂和种种技术漸漸归于废弃，使现有的农业人口失去他們的市场——这里仅略举几件事情——我們是无法回到农业經济去的。設使这一变动是可能的話，则全国任何一个集团的既得权益都会馬上受到損害，而仅以一种农业烏托邦的空虛諾言来安慰自己。即使这种空虛諾言具有一种催眠作用，任何打算实现这样一个綱領的努力必然伴随着种种不可避免的灾难，使得暫时被催眠的群众从出神状态中回醒过来。因此，为得实现这个綱領，必得把人类现有的种种动机、評价态度、生活水平和嗜好等等加以最彻底的改变，——而所有这些动机等等都是历史上习得的，而现已坚牢地深深扎根在人們的习惯或第二天性中了。人們的习惯是可能改变的，但一下子要改变这么多的习惯却是不可能的。只要人类还沒有丧失他們的記忆力的話，是否一次地震或者一次战爭所造成的破坏会使他們倒退到过去的經济社会去，那还是非常可疑的。他們势必在废墟上把地震前或战爭前的社会状况重新建設起来，因为这样做，对他們来說是要容易些，而且要更加“自然”一些。他們将会选擇他們认为发生地震危险較少的地方，或者把他們的城市加以坚固可靠的防空設备。

在这个回到早期經济去的計划当中，由于各种各样不象会有的事情未免太多了，因此，我們把它叫做“經济上的不可能性”。

但即使这个經济上"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种农业經济又怎样能够稳定下来呢？自由市场势必还是存在的。小型的商业企业也势必还是有的。人类的創造精神势必不会老是睡觉的。种种新的需求势必由现有的手工业中逐漸涌现出来，而且促成制造业的逐漸扩大。工資劳动者势必还会有的，而且在法律上也还是自由的。对于工資劳动者的需求也会自然觉察得出来，因为这些劳动者掙的錢会多于农业劳动者。对于工业制品的买卖势必建立起来一个逐漸扩大的市场。工业革命势必从头来起。小城市逐漸会发展成为大城市。一句話，农业經济势必仍然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而重新走向工业資本主义。

任其自然，则人間的社会关系将会重新取得原来的特征，和开始号召回到农业經济去的时候差不多（纵然不是完全一样）。这也就是我們所謂"历史的——經济的必然性"的一个說明。

但制度不会总是任其自然的！我們不是承认过嗎？——一种历史的-經济的必然性并非絕对的。誠然如此，可是在那个场合，对于农业經济当中的光荣的自由所加上的各种控制和限制都得是出于强制的。过去在資本主义成熟时期深深恐惧他們的种种自由会被国家加以侵犯的那些人們，这时，为了防止农业經济仍然走历史的老路，便也得对于农业社会当中存在的自由加以同样严重的侵犯。人們牺牲了民主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其結果不过是取得了比现有的生活水平更低一級的生活水平，而且如果跟还沒有丧失民主主义的工业文明可能发展到的生活水平比較起来，那就更加不知道要低了多少。

5．现在我們就要把話題轉到当前形势上来。处于当前形势之下，問題就是：在一种走向集体主义的工业經济当中，如何才能保持我們的民主主义生活方式（所謂民主主义生活方式的意义已见前章）。这一例証更多地具有当前的話題的味道。假如象现代几个极权主义国家所实行那样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种种恐怖乃是集体主义不可避免的伴随物，那末，我們返回到农业經济社会去的那种无效的企图也还比这好些。因为这个努力的結果，最多不过是一死，而还不

致于陷于半死不活的惨状。

重要的事是要确定集体主义这个辭儿到底是什么意思。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义可能是这样下的，以致从这定义邏輯上推論下来就非得有一套关于文化統治和政治統治的极权主义的技术不可。但我們却认为集体主义的定义不一定非这样下不可。这会变成一个經驗上的問題，即：事实上，为了使得社会主义制度順利地发生作用，是否非得这一套极权主义的技术不可？

要打算在很少的篇幅之內解决这样一个大問題，无論就問題来說，还是就作者来說，都是不适当的。但我們既然把它純然当做一个例子来說明我們关于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的见解，希望我們的評論表面上带有的独断色彩能够得到讀者的原諒。

我們所謂集体主义制度意味着：一切基本的生产工具——大工业、矿山、鉄路、公用事业等等——都归社会所有，用于公众的福利，而不是为了私人謀利。这样的集体主义制度势必要采取一种作了計划并继續不断地作計划的社会的形式，以便保証：充分就业，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和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国家或社会既然成了屋主，它对于一般公民的生活便操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它能够拒絕他們使用生产工具。可是国家并非一个抽象体，而是一群人們，包括：官吏、政治家、政客、职員、哲学家等等，——不管你把他們叫做什么。如果政治、經济、教育各方面的权力統統集中在他們手里，那又怎能防止他們不变成社会的独裁者呢？如果这种集中果然成为事实，那是毫无办法的。事实上，任何一群人，只要他們握有这种权力，势必会成为独裁者，不管他們是怎样的仁人君子。

有一些人說：一旦我們引进了这样意义的一种集体主义，那就不再是什么眞正的“如果”問題，而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結論了。为了避免这个結論，我們就势必要放弃集体主义。但我們的意见和这相反。我們认为：工业的集体管理确是无可逃避的結論，——也就是說，尽管我們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的“或然性还是极高”的。而那个“如果”問題，——即把全部权力集中垄断在經济計划者手里，——

則几乎完全决定于我們对民主主义的信仰，以及愿为它而战斗与牺牲的决心如何。这里所謂战斗，不仅是在战爭中，而且也是在和平环境中的战斗。

世界各国資本主义經济的走向集体主义乃是不断追求利潤的結果，而不断追求利潤正是資本主义經济的基础。追求利潤的結果是巨量資本的积累，而資本的积累就增加了社会生产力。同时，由于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各个阶級之間，收入的高低有着极端的不平等，使得群众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力大大地为之縮减。而这种不均衡现象愈来愈严重，其結果，一方面是有利可图的投資范围越来越窄，另一方面是失业现象越来越扩大。于是，国家越来越插足进来，作为工业的合营者，有时也作为独立的生产者，以便保持生产的进行，引入新的投資，并解除失业的越来越重的負担和政治危机。如果听任資本主义經济的各种程序自发地进行，就无法保証：利潤的获得、充分就业的实现、以及相应于现代工业的种种技术上潜在能力的生活水平。不仅如此，周期性的震蕩还要轉变成經济危机，而这种危机要支付日益增加的社会代价才能取得部分的解决。

走向集体主义的趋势以及国家对經济的干涉都是“不可避免”的。呼吁回到自由企业时代去，正如呼吁回到农业經济去是一样地徒劳无益，不过其为絕望掙扎的程度不如那么严重而已。尽管我們不妨試做这种努力，但压倒一切的可能性是会遭到惨敗的。我們的明智的选擇并不在于和那似乎不可抗拒的社会趋势相搏斗，而在于决定：国家由誰来負責？国家怎样进行干涉？以及生产的集体化究竟要做到如何程度？我們的自由就在这里。究竟在那集体主义經济之中，是否还得保留一些自由企业的范围，那是将由国家来决定的。假如負責管理国家的人們对于保持民主主义的传統自由不感兴趣，則在自由企业范围內工作的公民沒有任何不受迫害的保証，正和在集体企业范围內工作的公民一样。这就如同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私立大学教授也沒有任何研究自由，正和公立大学的教授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在一个民主的集体主义社会里，也能够在它的“权利

法案"当中规定下：每个公民享有就业的权利，而工会、合作社、法院、报館、教堂、以及某些高等教育机关的組織，永远不受国家的干涉，有了这样规定之后，也便能防止异端分子在經济上的不法行为。① 但宪法上所规定的条文是否具有强制作用，那还得决定于我們自己。沒有任何自发性的保証可言。那也就是为什么自由永远不会是安全的理由，而我們的理智永远不要睡觉才行！

* * *

上文考虑的几个例証說明了我們对于社会事务和历史事务当中的规律跟人类自由之間的相互作用抱什么看法。在任何时期里，对于某些发展途径永远沒有任何现实的选擇，就因为有許多"規律"以及这些"規律"的越来越大的力量拦在我們面前，阻挡我們为了走向新的方向而筹思新的計划。理論上，尽管我們能够开辟出对这条途径来說是另外的一条理想的途径，但〔实际上〕不得不悲叹：除非冒着毁灭性的危险就不能朝着这理想的途径走。但是，在一个我們选擇继續活下去的世界里，試图就在这条途径上开辟出一些可供选擇的途径，还是一个比較聪明的办法，因为正是在这些途径的面前，我們才不仅有能力来希望，而且有能力来行动。不管我們选擇的是什么途径，到时候我們总还会发现其他的許多途径。这些途径也許不如我們以前放弃不走的那样寬广和野心勃勃，但也不一定是更不痛快，或意义更小的。不用說私人生活，就連历史和政治也同样是天天会遭遇到种种可供选擇的途径，而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命运就靠在这些途径中来鑄造，因此，我們也得对此負起一部分責任。每个人都明知自己是要死的；可是人們活过这一生的方式会有多么不同啊！

人們在創造历史当中可能犯的錯誤是千差万别的，要想替它开个齐全的目录是办不到的。但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我們也能够把这些錯誤当中最常见的枚举出来。这些錯誤就是：(1)尽管可供选擇的

① 在《理性、社会神話与民主》一书，第125頁以下，我曾扼要地討論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采用的防止办法。



道路已在面前，但人們竟会視而不见；(2)事实上可供选擇的道路本在两条以上，但人們却定要把它簡化而当做只有非此即彼的两条；(3)对于这些道路的相对可靠性做了錯誤的估价；(4)最后，做为(3)項的特殊情况，忽視了我們自己的行动也会影响到道路的选擇。所有这些錯誤加在一起不过是：对于人們控制自己前途的力量有系統地加以低估而已。

不問是不同的社会，还是不同的个人，其所以循一定的路綫向前发展，有时是由于宇宙的或地球的偶然事件之結果。即如一次旱灾，或者一次水灾可能把几百年間的計划劳作一扫而光；疯狂的病态可能象烏云遮日一般，遮蔽了那深受教养的心灵，而阻碍它达于成熟的境地，以获取黄金般的丰收。社会控制和理智能够冲淡这些偶然事件的种种作用，而防止其中許多作用的发生，但这些偶然事件是不能全部鏟除的。这就因为人是有限的，而他所不能控制的世界范围永远大于他所能控制的范围。我們这样說并非劝导人們采取消极隐退的办法；那显然也就因为这些事变都是偶然的。只有面对那定而不可移的事件时，消极隐退才是聪明的办法。而依据定义，这些事件都不是定而不可移的。

一切真正可加以选擇的机会都是特殊的。而每一个选擇的决心都包含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的、社会的和世界的改造。任何一种明智的改造都是一种实驗，是要以已知的規律为指导，而以达到能掌握具体問题为目标的。我們既然断然委身于民主主义哲学，便不能再把现存于我們面前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道路的选擇完全付托給一位事变創造性人物，或者付托給一个不受控制的政治中枢。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不管是什么計划都得以自由社会〔的締造〕为計划的总目标。而在这个自由社会当中，每个公民都能参預集体政策的决定，以导向解放各种各样的有才能的人物为目标的明智的計划政策，同时，也能够捍卫私生活領域，而使它得以持續保存下来，在这个私生活領域之中，人人都有自做决定的自由。